




总第52期

10

1956



中國語文　1956年10月号(总第52期)目录

社　論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鼓舞我們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准备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是我們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历史道路上的光輝的里程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中的中央委員会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議总結了我国人民在党的領导下于最近的十一年間取得的兩次有世界意义的偉大胜利，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爭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党的第八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和决議激动着和鼓舞着我国六亿人民为奔赴新的更大的胜利目标的心灵，鼓舞着我們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設成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国家。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断引导我国人民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指針，是不断鼓舞我国人民奔向更大幸福的号角。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洶涌澎湃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里而自豪，每一个中国人都認为把自己的能力貢献給这样一个偉大的事業而感到無比的光荣。

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議中对科学事業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工業化的需要，必須大力發展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特别是科学事業、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業。……在科学事業方面，党和政府必須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業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現科学發展的十二年規划，爭取許多重要科学和技术部門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一指示对我国語言科学工作者，同对其他科学工作者一样，提出了巨大的光荣任务，無疑地將促进我国語言科学的更巨大的發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語言科学事業有了空前的發展。我們現在已經有由有关机構共同組織了約七百人的七个少数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队，他們在中国科学院和民族事务委員会共同領导下和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籌备处指导下，正在西藏、广西、广东、云南、貴州、四川、甘肃、青海、湖南、湖北、黑龙江、內蒙古、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等地大力地普遍調查少数民族語言。已为僮、傣(西双版納、德宏)、彝、傈僳等語言設計了文字方案并已进行試驗推行的工作。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不断地培养少数民族語言工作的干部。在汉語研究工作方面，各个領域我們都有程度不同的进展，都涌現出成批的新生力量。这些成績的获得是与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是和苏联同志的帮助分不开的。但是这些成績比之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进展的需要，距离还是很远的，我們的成績还不是很大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要求語言科学尽快地解决如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汉語規范化、方言調查、汉語史、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字創制或改革等一系列的重大問題。

为了保証我国語言科学的繁荣，必須在語言学界堅决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眞理不怕反駁，怕反駁的也難以成为眞理。眞理不怕質疑，对于質疑的回答愈多愈明晰，也就是对眞理的闡述愈精微。所以眞理是愈辯愈明的。有的同志顧虑百家爭鳴会發生乱鳴的情况，会有人借百家爭鳴来無理取鬧，糾纏不清，这种設想是多余的。因为“由于我們党做了長期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国知識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經同工人农民結成了亲密的联盟”，爱国的科学工作者热誠地願望在科学事業上做出有效的成果。在科学工作上是欺蒙不了人的。如果借百家爭鳴的政策来爭名，来無理取鬧，那除了出丑以外，是不会有别的結果的。如果不是持之有故与言之成理，广大的讀者是不会乐意讓这种人平白浪費人力物力的。因此那种顧虑是不必要的。为

了尽可能达到迅速地把我国建設成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一个共同目的，在公認的实事求是的科学鑽研的基础上来展开广泛的自由的学术討論，对科学事業的發展只有好处沒有坏处。

我国語言学界曾經在什么是詞的問題上、詞类問題上和主語宾語等問題上展开討論，这是可喜的現象。但是討論还不够充分，还有人沒有暢所欲言，参与討論的还不够广泛。爭論过程中扣帽子現象还不少。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問，科学理論的服人是靠符合实际的思想成果和謙虛誠恳的切磋态度；只求助于空洞的大帽子压人这件事本身就說明理論的貧弱，科学鑽研的缺乏。百家爭鳴是拿研究成果来比智力劳动的高低的；不是靠佶屈聱牙，晦澀难懂的冗長的使人难以卒讀的文章来难倒人的。尤其是語言科学的爭論文章更应該是文字明暢，条理井然，否則，那种文章对于一个語言科学工作者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諷刺。《中国語文》杂志社为在編輯工作上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曾經邀請各地語法学者于七月二十七至八月一日在青島举行語法座談会。座談会証明，聚集一堂傾听各方的不同意見是互有啓發的，是互相推动进一步思考問題的。《中国語文》决計在編輯工作上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欢迎讀者同志在《中国語文》上展开語言科学上各种必要的爭論。过去《中国語文》对展开爭論是不够积極的，对新生力量的重視和关怀也是不够的，希望讀者同志对《中国語文》过去的工作多加批評。

为了順利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給語言学界的任务，我們必須动員和团結語言学界的一切积極因素。語言学界有成就的老科学家虽然为数不多，他們却是語言科学研究工作上的領导力量。他們必然会在研究工作上起典范作用，会在培干工作上滿腔热情地傳授他們宝貴的知識，介紹他們在研究工作上的經驗，积極地爱护幼苗，帮助他們指导他們加速成長。年青語言科学工作者必然会虛心地热誠地向老科学家学習。科学工作是創造性的腦力工作，但是創造和繼承是不能分割的，不批判地繼承历史上优秀的研究成果，而要有所創造是不可能的。語言研究机構和高等院校的語言敎学部門必須在研究工作上在統一規划下分工合作，互相支援，及时地充分地交流研究經驗。中学語文敎員以及小学語文敎員是一批很大的力量，他們每天接触無数的实际問題。他們对語言研究工作提出各种現实的要求。为了使我們的語言研究工作密切联系实际，我們必須傾听中小学語文敎师的宝貴意見，并积極地帮助和指导他們进行适当的研究工作。在中小学語文敎师中，特别是在中学語文敎师中是有不少研究人材的，我們不能忽視这一支力量。《中国語文》最大多数的稿件是来自中学和社会其他方面，关鍵是在加强对这些方面的联系和帮助。社会上还有一批熟悉古代汉語的力量，他們分散在各地文史館及其他方面。他們很可以做資料整理工作。恰当地运用他們，給他們以明确的任务和有力的帮助，那会發生很大的作用。汉語研究工作上的困难之一，是無比的丰富的資料还沒有經过系統的整理，因此表現在研究工作上占有的資料不足，缺乏系統的論証。資料整理工作对研究工作質量的提高有很大关系，語言科学工作在这方面的基本建設是很薄弱的，我們需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們有愈来愈多的高等院校的語文系学生，我們也应該在高等院校师生方面設法适当地把研究工作和敎学工作結合起来，这一方面符合充实敎材、改进敎学計划、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原則，从而提高敎学質量，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部分的研究工作。高等院校的畢業論文应該是檢驗敎学成果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是檢驗畢業生的工作能力的重要依据之一。把語言学界一切积極因素团結起来，运用一切有利条件，在党和政府的領导下，我国語言科学必然会出現光輝燦爛的气象。我們衷心祝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圓滿閉幕，我們語言学界一定堅决努力完成党和政府所給予的光荣的重大任务。

語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

王　力

中国語文杂志社在青島召开的語法座談会的小組上，丁声树先生提出了兩个問題：(一)各种語言的語法有沒有它們的特点？(二)古今語法是否可以不分？他提出了問題之后，自己不願意表示意見，并且要我表示意見。等到我表示了意見之后，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見。这种小組討論是很新穎的。后来我把我的小組發言略加补充，在全会上又作了一次發言。这一篇文章就是基本上根据当时的發言写下来的。

这兩个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讀者会奇怪：丁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兩个不成問題的問題？我为什么要談这兩个不成問題的問題？不难理解：这兩个問題，在中国語法学界中，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

这兩个問題可以合并为一个問題，就是語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問題。問題的中心在于具体語言的語法是否由于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表現出它的特点。現在我想分为三部分来談：第一是民族特点問題；第二是时代特点問題；第三是特点的認識对語法研究工作所起的作用。

(一)

各种具体語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有着共同性；因此，世界上各种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思維是人类所共同的。这样才使翻譯成为可能。这样才有可能吸收外語来丰富自己。各种語言的語法的共同点主要是建筑在邏輯思維的基礎上。

但是，語言和思維不是同一的东西。把語言和思維割裂开来固然是錯誤的，把語言和思維等同起来，同样也是錯誤的。前者是唯心主义，后者是庸俗唯物主义，是机械主义，是行为主义。思維沒有民族特点，而語言有民族特点。具体語言是以特定的民族形式(部族形式，部落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一种交际工具。正如語音、詞彙一样，語言之表达思想在各种語言中采取异途同归的进行方式。同归，是归到思想感情的表达上；异途，是运用不同的語音、詞彙和語法。

語言和思維是有机的統一体，但是語言的形式不等于思維的形式。語言和思維各有各的性質特点和發展特点。因此我們可以說，語法和邏輯也是各有各的性質特点和發展特点。

思維是反映客观現实的，語言也可以說是反映客观現实的。但是，如果說語法的反映客观現实和思維的反映客观現实是采取同一方式的，那就錯了。我們說"我吃飯"，有些民族說"我飯吃"。我們不能說哪一种詞序更眞实地反映客观現实，更不能說有兩种客观現实。如果要說語法反映客观現实的話，我們只能說这种客观現实不是別的，而是借以形成这种語法結構的历史条件。各种語言的語法之所以有它的特点，正是历史条件所形成的。

在这里，我們应該把邏輯和語法区别开来。就汉語来說，我們平常所謂主謂不合，动宾不合，往往只是邏輯上的問題。我們不过是借語法上的术語(其实主語和謂語也是邏輯上的术

語，只有动詞和宾語是語法上的术語)来說明邏輯思維上的錯誤。例如"恢复疲劳"这一个詞組是被某些人認为动宾不合的。合与不合，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假定是不合，那只是邏輯思維的問題。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說"恢复疲劳"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現实，因为在客观現实中"疲劳"是不可以或不应該"恢复"的。但是，就汉語来說，这个詞組并沒有語法上的錯誤，因为这种詞序是合于汉語的語法規則的。至于西洋語法中所謂主謂不合和动宾不合(如果有这种說法的話)，那就往往不是邏輯問題而是語法問題。譬如說，动詞所支配的名詞变錯了格，我們就不能說，客观現实要求非改成某种变格不可。

就一种具体語言的語法来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沒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我們知道，語言有一般的內部發展規律和特殊的內部發展規律。語法是語言的本質特征之一，具体語言的語法自然也有它的特殊的內部發展規律。就語法的發展情况来說，除了各种語言的語法的特殊的內部發展規律以外，几乎是沒有什么發展規律可談了。

共同語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正是由于各种具体語言有它的特点，然后可以作为民族的特征。語法構造既然是語言的本質特征之一，自然也就是構成民族特征的主要因素。

世界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正是靠着語法的特点把世界語言分为若干語系和語族的。从共同的特点上把許多語言归为一类，以别于其他各类的語言。假使語法沒有特点，那么形态学的分类就成为不可能。正如梅耶(Meillet)所說的，一般詞彙是不能作为語言分类的根据的。

語言对异族同化的强烈抵抗性，說明了語言的語法構造的特点。許多語言的詞彙被异族語言所同化了，剩下語法構造屹然不动，这样它們就沒有丧失語言的本質特征，我們就可以認为这些語言并沒有灭亡。如果說語言沒有特点的話，当詞彙被同化了一大半之后，語言也就可以算是死去了。

大家知道，語法有它的不可滲透性。五四以后，汉語語法受西洋語法的影响很大。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汉語語法是有特点的，否則無所謂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必須汉語語法本身有这种發展的可能性，然后才接受外語的語法形式来丰富自己。这是吸收，而不是同化。因此，汉語語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西洋語法是和語法的不可滲透性沒有矛盾的。

我們中国的語法学家早就注意到汉語語法的特点。馬建忠虽然模仿西洋語法，但是他也知道为汉語分出助字一类。陈承澤著《国文法草創》，刘复著《中国文法通論》，金兆梓著《国文法研究》，都努力于揭露汉語語法的特点。这是我国語法学的优良傳統。解放以来，青年語法学家們在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在汉語語法特点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在这次座談会上，大多数同志的發言都体現了發掘汉語語法特点的精神。举例来說，那公畹先生很深入地闡述了汉語名詞的形态，这是一篇很好的發言。如果說汉語語法沒有特点的話，那先生就沒有什么可說的。他之所以有話說，而且說得很深入，正是因为世界上沒有什么語言的名詞形态和汉語的名詞形态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地，有許多語言的名詞形态和汉語的名詞形态是大不相同的。

这种情况是非常可喜的。这几年来，人家說我們的爭論是多的，步驟是乱的。爭論多，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这并不可悲，而是可喜。过去我們的先輩如陈承澤等人虽也注意到汉語的特点，但是研究的人太少，也就不够全面，不够深入。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領导下，社会上一般人才知道有語法是一門学問，研究語法的人漸漸多起来。有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大家注意語言的特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爭論，因为我們做的是墾荒工作，不能希望一帆風順。如果大家像陈承澤所指責的，"以西洋文法为楦"，就会很快地趋于一致。爭論是沒有

了，但是成績也沒有了。

至于人家說我們的步驟是乱的，人家說我們，我們也原諒人家，因为人家不知道我們發掘汉語特点的垦荒工作必須經历一段艰苦的过程。如果我們自己也承認步驟乱了，那么我們就沒有自知之明。我們的步驟幷不乱，我們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方向，就是全面深入地發掘汉語語法的特点。

（二）

在座談会上，有些同志談到古今語法要不要分开来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也想發表一些粗淺的意見。

語法是富于穩固性的。但是，語法虽然在語言諸要素中变化得最慢，它畢竟是發展的，变化的。变化得慢幷不等于不变。我們說它穩固，同时說發展，这兩种說法是沒有矛盾的。

同志們知道，我是研究汉語史的，因此同志們可以相信我不至于主張割断历史。

由于我們不能割断历史，所以我們应該重視語法的历史繼承性；同时，也正是由于我們不能割断历史，所以我們重視語法的历史發展。重視語法的历史繼承性，因为語法是穩固的；重視語法的历史發展，因为語法是变化的。我們必須研究汉語的历史，然后知道現代汉語是怎样形成的，幷且知道它將来朝着什么方向發展。

如果我們知道某一語法形式是自古已然的，固然有助于現代汉語的了解；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某一語法形式是某一时期才开始形成的，就更可以帮助我們了解祖国語言怎样逐漸改进自己的語法，走向完全的道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是辨別古今語法細微的分別，因为語法是漸变的，不是突变的。

我們也談新兴的語法形式。然而新兴的語法形式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們仍旧是历史發展的結果，它們是屬于历史范疇的。这幷不是反历史主义。相反地，这正是历史主义。

古今語法杂糅来做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对的。如果那样做，許多問題都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因为有些語法形式古今是有矛盾的。例如"不我欺"、"不己知"是上古語法，"不欺騙我"（"沒有欺騙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古到現代的語法，除了仿古的形式不算，我們很难設想兩种語法形式同时存在于汉語里。活生生的口語是語法的主要根据，文学語言也必須以口語为源泉，而口語經常是不容許相矛盾的兩种結構形式同时存在的。就現代汉語的研究来說，在承認古代語法有殘留的形式的同时，必須以現代語法的結構形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語法的分期研究，在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的任务上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正如不能設想有不研究現代汉語的汉語史專家一样，我們很难設想有不知道历史發展的現代汉語專家。国家科学規划委員会的十二年远景計划中有語法的分期研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三）

在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有一条研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研究对象的时間、地点和条件。就語法的研究来說，时間就是所研究的語言的时代特点，地点就是所研究的語言的民族特点，条件就是所研究的語言所受的社会發展的影响。我們不可能脫离具体語言来研究語法，而具体語言正是为时間、地点和条件所制約着的。

上面說过，解放以后，汉語語法的研究是有成績的。依我个人的粗淺的看法，这正是由于同志們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合于这一条的。但是，恐怕还不能說就沒有問題了。我这里提出三点意見。說得对不对，还請同志們批評指教。

第一，我觉得有些同志在研究工作中不知道区别本質的特点和非本質的特点。凡是汉語里所有的語法形式，不管它是本質的特点或非本質的特点，一視同仁，沒有区別对待。一个規則建立起来，按本質的特点来說，应該是站得住脚的，偏偏有人煞費苦心地去搜罗一些例外，說这个規則不能照顧全面。我的意思不是說不要研究例外，相反地，深入的和全面的科学研究正是应該照顧到例外，并且尽可能找出例外产生的原因。但是区別一般和特殊还是必要的，否則讓非本質的特点和本質的特点分庭抗禮，恐怕沒有一条規則能够建立起来，而我們的語法規范工作也就很难做了。这是强調汉語特点所帶来的一种偏向，我認为必須糾正。我們应該以文学語言为根据。文学語言中不見或很少看見的，也就不屬于本質的特点之列。文学語言是同方言俚語对立的（自然方言俚語也可以轉化为文学語言），方言有它的語法特点，固然不可以和全民語言混淆起来，俚語也有它的語法特点，也不能和文学語言混淆起来。現在有一种偏向是强調俚語，拿俚語去反对文学語言的語法規則，依我看来，这就是把本質的特点和非本質的特点混为一談了。潘梓年同志在会議的第一天指示我們說："历史越久，語言的發展越大，語法的变化也越多，口語更加灵活，和文学語言不一致，例外更多。我們要把变化多的撇开，首先抓住基本的东西。有了几条，有了立脚点，使教的人和学的人容易掌握。把这个肯定下来，然后去找灵活性。先分別对待，万变不离其宗，更容易研究出結果来（大意如此）。"依我个人的体会，这就是教我們抓住汉語語法的本質特点。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建議大家遵守这一个重要的指示。

第二，我觉得有些同志沒有經过調查研究，就忙于做审判官。每逢杂志上爭論某一問題，总有一些人單憑讀过那些已經發表过的爭論文章，就忙于給他們做总結。某人对了，某人錯了，某人在某一点上对了，在某一点上錯了。除了审判誰是誰非之外，自己并沒有做过充分占有材料的工作，甚至例子也是人家的。听說《中国語文》和《語文学習》就收到不少这一类的稿子。这种作風是不值得鼓励的。百家爭鳴如果是这么个鳴法，就丧失了百家爭鳴的意义，而我們也只能对百家爭鳴抱悲观了。《人民日报》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个字来，我認为是完全正确的。要充分占有材料，然后审判官不至于审錯了案。

第三，我觉得有些同志忙于建立新的体系，而不忙于做基層研究工作。基層研究工作在汉語規范化会議中就由罗常培、呂叔湘兩位先生提出来了，当时还听見一些不同的意見，以为語法体系也是重要的，因为不先建立了理論基础，研究就無从下手。这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鷄的問題。我个人認为应該先有鷄，后有蛋。所謂理論基础，应該是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应該是从沙灘上建立起来的語法体系。我們也同意罗、呂兩位先生所建議的，先建立一个暫时可以同意的語法体系。那种暫时可以同意的語法体系是不难建立的，現在中学的汉語課本就是一个起点。至于基層研究工作，就比一切都更需要，因为只有發現了汉語的語法特点，發現汉語本身的結構規律，然后眞正够得上建立語法新体系的資格。否則匆匆地建立了，將来也必然是匆匆地推翻了。

目前我們对于汉語的語法特点的研究，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是好的，因为这是研究汉語語法特点的初步工作，但是如果不更进一步求其所以然，那么对于汉語語法的特点就只算知道了一半，而且是次要的一半。張志公先生說我分析了紧縮句而沒有說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者必須紧縮。他对我的批評是完全正确的，我誠恳地接受这个批評。

求其所以然，是科学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困难的，但这是重要的。大約不困难的工作也就不重要了。求其所以然，然后眞正能使理論和实踐密切地結合起来。

汉語語法特点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們建立汉語自己的語法体系。不要害怕現在迁就

了暂时同意的語法体系，將来就不好变更了。只要研究得好，适合于汉語的語法特点，將来一定可以变更。在俄語語法中，起初是沒有分出数詞一类的，后来發現有分出的必要，現在大家都承認俄語詞类中有数詞了。俄語語法有印歐語語法的历史傳統，尙且可以变更，何况汉語語法体系还在草創的阶段，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

有些研究外語的朋友反对我們建立汉語自己的語法体系，以为看不懂，看不慣。这是善意的批評，但是我們也誠懇地告訴这些朋友們，五亿五千万汉族人民完全有权利建立自己的語法体系，而不依傍任何語言的語法体系。有些人說我們标新立异。沒有事实根据的标新立异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是根据汉語語法特点而建立自己的語法体系，那应該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也誠懇地告訴他們，我們还要繼續标新立异下去。新，就是我們所要建立的新的語法体系；异，就是我們將来这个語法体系的汉語語法特点。这个新体系建立了之后，將無往而不利。不像現在我們天天談汉語特点，天天还是在西洋語法的范圍內兜圈子。必須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然后不至于被压在五行山下。我們現在講汉語語法，特別是講古代汉語的語法，常常感覚到西洋的語法体系用不上。不从具体材料出發而从抽象的体系出發，这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們并不是主張摒弃西洋語法研究的成果，也不是企圖抹杀世界語法的共同点；我們只是說，自己的語法体系是必須建立的。

新的、切合于汉語語法特点的語法体系建立了之后，对于普通語言学可以增加一些新頁。对于东方語言的語法来說，可以作为一个藍本，正如梵語語法作为印歐語系的語法的藍本一样，因为东方語言的語法一般还是抄襲西洋語法的。依我个人看来，唯有这样做語法研究工作，才能赶上世界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

从前研究汉語語法的人是一手包攬，用力多而成功少，旣不全面，更不深入。現在我們的队伍壯大起来了。在国家十二年远景規划中，語言学方面的人才要培养出好几百个来，到那时，人力更加雄厚。青年同志們有朝气，有旺盛充沛的精力，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比起前人一定能后来居上，青出于藍。

我这个發言实在膚淺得很。如果其中有可采的地方，那是学習得来的，并非我的創見。如果其中有錯誤的地方，那只能是我个人的錯誤，不可能是別人的錯誤。敬請同志們不吝教誨。

給周有光同志的信

周有光同志：你的大作《汉語盲文的音素化和系統化》，我請人讀过，并且用盲字記录了所有的要点。我認为你作了極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將語音学运用到盲字字母的創制中来了，这是一个很聰明的嘗試。就字母表的本身来說，是很有系統、很有內在的連系了，不过还要看看这套字母連写成詞，实际运用的时候，对盲人是不是容易。据我的經驗，在手指的感覚上，点数太少而字形結構松懈或包含有同形异位的符号的詞，对于初学者是極难辨認的。

音素化和国际化，二者不能兼得。采用哪一个原則，需要大家討論，更需要文改会或科学院之类的机关向国务院提出建議才好决定。这次出国，我在莫斯科敎一个同車的苏联盲人学中文新盲字字母，由于新盲字有27个字母和俄文盲字字母相同，或發近似的音，她只化了不到十分鐘功夫就学会了，能够讀出中文盲字的音来。我个人主張偏于采用国际化的原則。苏联东干族（从中国移过去的回族，講的是汉語西北方言）的文字以前采用拉丁化新文字，1952年起就改用斯拉夫字母，理由是便于学習俄文，免得兒童記兩套字母。

当汉語拼音文字的創制快要实現的今天，对盲文的改革也就要求和明眼人的拼音字母取得一致。由于汉語拼音字母已决定采用拉丁化的原則，所以中国盲字字母也应当和盲字拉丁字母一致。这样，中国盲人在学習上和生活上才会有更多的便利。

拉丁化以后，如何創制盲字的縮写符号体系以縮短詞形，这就是我們研究盲字改革的任务之一。在制定縮写符号的时候，我想，你所提倡的音素化的原則，也許可能局部地运用。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了适应汉語拼音文字，無論如何，中文盲字总得再来一次变革，希望也是最后的变革。在作这次决定性的、一劳永逸的变革之前，多方的嘗試、实驗都会有利無弊，我們希望和你經常連系，希望你帮助盲人創制合理的文字！

敬礼

黄乃（教育部盲教处）1956年6月5日

汉語的字調、停頓与語調的交互关系

齐声乔

首先应該說明的是本文的范圍仅以現在的北京話为限，本文所論及的也仅仅是一些比較突出的現象。

汉語的語調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問題，但由于傳統的字典都是把汉字一字一調地标了出来，并由于汉語有語气詞这一特点，有些学者，尤其是誤以汉語为孤立語的西洋学者，以为只要按照字典上所标出来的字調把一篇文章或者一段話一个字一个字地讀出来或者說出来就够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害的看法。照着这个办法讀或說，即使每个字都念对了，其結果也不过像讀字典而不像說話，这是肯定的。理由是很簡單的：第一，輕声字是具有音位作用的，而傳統的字典以及誤以汉語为孤立語的学者把这一点忽略了；第二，在一句話里各字的字調并不是孤立不相关的，而是互相影响的；第三，語气詞的音高也并非都是一样的，如果执行的职务不同，音高也会因而不同的；第四，重讀有时是非常必要的，而重讀不仅使音高会有变化，而且使音長也会有变化；第五，在連續的一段話里，不仅句与句之間应有停頓，即在一句之內，为了明确各种語法关系，也应該有長短不同的頓逗。本文打算就这五点作一个簡略的闡述。

輕声的規律

輕声是具有音位作用的，应該同陰平、陽平、上声、去声同样看待。这里可以先举几个例子来談談："大方"一詞的后一字如果讀陰平，是一种茶叶的名字；要讀輕声，則为慷慨的意思。"本事"一詞的后一字讀去声，是指一个故事的本末；而讀輕声則为本領的意思。"等等"一詞的后一字讀上声，是諸如此类的意思；讀輕声則为等一下的意思。"大意"一詞的后一字讀去声，有总的意向的意思；而讀輕声則为不小心的意思。"地道"一詞的"道"字讀去声，是地下道的意思；而讀輕声則为眞牌的意思。这类的例子太多了，可以說不胜枚举。再举几个整个的句子来看：咱們如果把"我想起来了"这句話里头的五个字摆起来一个一个地念，这几个字的語法和意义就很难捉摸。可是如果把"起来了"讀成輕声，"起来"就很明显地是"想"的补語，这句話是說"我剛才忘了，現在已經知道了"。如果只把"来了"讀成輕声，那么，"来"字就是"起"的补語，这句話的意思是"我不想再躺下去了"。在"請你，你不来；不請你，你又不高兴"这句話里，"又"字只能讀輕声，意思和"可是"相像；在"你又来了"这句話里，"又"字只能讀去声，暗含的意思是"你从前来过一次了"；在"他把書都弄亂了"这句話里，如果讀"都"字为陰平，意思是他把所有的書都弄乱了；可是把"都"字讀为輕声，同时重讀"書"字，这句話的意思就变了，是說弄乱了的东西很多，甚至把書也弄乱了。

以上这些例子，充分証明輕声是具有音位作用的，但是輕声的音高并非都是一样的，如果把北京話的音高分为五度，那么上声后的輕声的音高是四度，陽平后的輕声是三度，陰平后的輕声是二度，去声后的輕声最低，是一度。例如："女的"，"男的"，"輕的"，"重的"。如果后面是两个輕声字，那么，这些輕声字的音高大概是这样的：

跑‖进去(42)
拿‖上来(31)
听‖下来(21)
放‖出来(11)

假如后面的輕声字比較多，比方說是三个或四个，而且是用肯定語气說的，那么最后一个或兩个音节是一度。例如：

跑‖出去了哇(4211)。
拿‖上来了哇(3111)。
听‖下去了哇(2111)。
放‖出来了哇(1111)。

輕声的出現，在許多場合是不規律的，因此編字典的人对于輕声字应該像对于其他調类的字一样，把輕声字一个一个地列进去。下面可以举出几条例外較少的規律：

（1）重叠字用为动詞或名詞时，后一字讀輕声。例如：

用为动詞的：試試，看看，查查，送送等。
用为名詞的：爸爸，媽媽，哥哥，弟弟，伯伯，叔叔等。

（2）以重叠字为反复問句，則中間加"不"字，"不"与第二个重叠字都讀輕声。例如：

高不高？来不来？走不走？亮不亮？

如果不是問話，則后一重叠字不讀輕声。例如：

紅不紅，紫不紫，这个顏色太难看了。

（3）兩兩重叠的四字詞，不管后面帶"的"（地）帶"兒"，与不帶"的"（地）不帶"兒"，第二字一定讀輕声。例如：

老老实实(兒)的，規規矩矩(兒)的，

和和气气的，匆匆忙忙的。

(4) 詞尾都讀輕声。例如：

桌子，椅子，黑的，白的；这么，那么，虽然，不然；可是，但是，老是，要是；你們，他們；石头，木头…等。

(5) 單位詞讀輕声。例如：

三枝笔，四本書。

(6) 語气詞都讀輕声。例如：

天吶！来呀！他呢？你去嗎？走吧？去罷！

(7) 直陈語中的趋向补語讀輕声。例如：

回{来/去}　出{来/去}　进{来/去}　上{来/去}　下{来/去}

拿{回来/回去}　拿{出来/出去}　拿{进来/进去}　拿{过来/过去}　拿{上来/上去}　拿{下来/下去}

(8) 代詞作宾語时，如果沒有对照之意，則讀輕声。例如：

赶紧去看看他。赶紧来看看我。很想去看看您。

字調对字調的影响

(1) 重叠詞加“兒”或“的”(地)，或者又加“兒”又加“的”(地)，不論用为形容詞还是用为副詞，最后一个音节总是陰平(重叠之后表示“每一”之意則除外)。如果这类重叠詞是由陰平字組成的，則后一个陰平比前一个陰平一定高一点。例如：

輕輕兒(地)放下来，　　常常兒这样，

好好兒(地)說，　　慢慢兒(地)走。

(2) 上声字在陰、陽、去、輕各声之前变为半上，也就是說后面轉弯的尾巴去掉了。例如：

講書[1]，打魚[2]，演戏[4]，暖和[*]。①

(3) 兩个上声字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上声字变为陽平。例如：

总[2]統[3]，北[2]海[3]，很[2]好[3]。

即使第二个上声字是輕声，这个規律也依然有效。例如：

手[2]里[*]，水[2]里[*]；所[2]以[*]，可[2]以[*]；整[2]理[*]，管[2]理[*]；孔[2]子[*]，老[2]子[*](道家)。

但这里有个例外：亲屬称呼里的上声重叠字如“奶奶”、“姥姥”、“姐姐”等的第一字变为半上而不是变为陽平；帶“子”字尾的上声詞也变为半上。例如，“嫂子，老子(父亲)，毯子，椅子”。应該注意的是这些作为詞尾的“子”字跟孔子、老子的“子”字，在意义上是絕然不同的。

(4) 四个上声字在一起时，往往可以按照意义，兩字一組地分为兩組，而后照第三条規律来念。例如：

豈[2]有[3]此[2]理[3]；　　舍[2]此[3]取[2]彼[3]。

(5) 三个上声字在一起的时候，用通常說話的速度来念，中間一个字总是讀陽平的。例如：

总[3]統[2]府[3]，很[3]可[2]取[3]，我[3]很[2]好[3]。

(6) 五个以上的上声字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按照語法关系分成若干組，而后照以上的規律来念。例如：在“你懂 ‖ 我也懂”这一句話里可以分为兩組，用通常的速度来念，“你”和“也”都讀陽平。“我想 ‖ 你总可以 ‖ 打草稿吧？”这一句話可以分为三組，按通常的速度念，“我、你、可、草”都讀陽平(“以”和“吧”都讀輕声)。

(7) 兩个去声字在一起的时候，如果第二个字不是輕声，那么，第一个字比第二个字短，也就是說下降的程度并沒有第二个去声字那么低。为了方便，我們可以称之为半去。例如：

再見，办事，万岁。

(8) 四个去声字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可以兩兩成組，那么，这条規律依然有效。例如：

世界大勢，就事論事。

三个去声字在一起的时候，第二个字或者第三个字往往是輕声，第一个去声字也是半去。例如：

第二个去声字是輕声的：大戏院；教育部。

第三个去声字是輕声的：定制度；看热鬧。

(9) 三字相連，第一字为陰平或陽平，中間一字为陽平，第三字不論是陰，是陽，是上，还是去，則中間一字在談話的語言里都可以讀陰平(虽然有时也可以讀輕声)。

(A) 黑龙江[1]，东柏林[2]，中南海[3]，科学院[4]。

(B) 南長街[1]，頤和园[2]，龙头井[3]，紅楼夢[4]。

語气詞的音高

語气詞的音高是因其作用不同而不同的：

(1) 問句里的語气詞不論前一字是什么声調，都是比較高的。“呢”字在問句尾差不多是四度。例如：

書呢(4)？　茶呢(4)？　紙呢(4)？　墨呢(4)？

“嗎”和“吧”在問句尾比“呢”字高，差不多是五度。把上面的例子跟下面的例子比較一下，問題就明确了：

酸嗎(5)？甜嗎(5)？苦嗎(5)？辣嗎(5)？

說吧(5)？談吧(5)？走吧(5)？去吧(5)？

我們如果把第一节表示肯定語气的“哇”字换成問話式的“嗎”字，那么不仅“嗎”字是高的，“嗎”字前面的輕声也变高了。結果是这样的：

跑 ‖ 出去了嗎(4445)？

拿 ‖ 上来了嗎(4445)？

听 ‖ 下去了嗎(4445)？

放 ‖ 出来了嗎(4445)？

(2) 在选擇問句里第二个“呢”字比第一个“呢”字低，差不多是三度的样子。例如：

他找你呢，还是找我呢？

我們如果把“呢”换成“呀”，結果还是一样的。其实这

---

① 1表陰平，2表陽平，3表上声，4表去声，*表輕声；下同。

个变化并不限于語气詞，非語气詞在这个地位上也是一样的。比方我們去掉上例的兩个“呢”字，而說成：

他找你，还是找我？

“你”和“我”虽然同属上声，但“我”字在这里比“你”字就低得多了。

(3) “吧”字表示犹豫的时候讀半高調即四度。例如：

去吧(4)，怕他来；不去吧(4)，又怕他不来。

(4) “啊”字表示列举时也是四度。例如：

他的杂志很多：世界知識啊，語文学習呀，

中国語文呐，文艺报哇，他都有。

(5) 表示肯定語气的“的”、“了”、“呢”、“罢”、“么”和“啊”，都可以按照第一节念輕声的念法念。例如：

他来的(3)。

他来了(3)。

他才不肯来呢(3)！

来罢(3)。

他說他来么(3)。

赶紧来啊(3)。

这些語气詞之所以都讀为三度，是因为前一音节是陽平。关于語气詞的音高，本文只談到这里。

重讀

每一汉字都有一定的調子，每一个字調又有一定的音高，遇到一个詞兒有輕声字的时候，輕声字的音高又按照前一字的音高起一定的变化，看起来好像在汉語里并無重讀的問題存在。其实不然，比方，在“我們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句話里，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一样輕重的；这里面最突出、最显著的一个詞，恐怕是“一定”，也就是說“一定”一詞在这句話里念起来比其他各詞都重。这是汉語語法关系所固定下来的。又如在“他能打字”这句話里，如果說的时候不帶任何感情，那么最后一个字是比較显著的。这也是汉語語法关系固定下来的。但听話的人如果有所誤会，那么說話的人再說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有加重的可能：重讀“他”，是說不是別人，重讀“能”，是說并不是“要(打字)”，重讀“打”，是說不是“写字、刻字”，如果特別重讀“字”，那是說不是打別的。这样重讀之后，音量变大了，音高也不同了。陰平“他”由 55 变为 56，陽平“能”由 35 变为 36，半上“打”和去声“字”原为 21 和 51，現在也变得更低了，差不多低到不能再低的样子。这是說明眞相表示对比的重讀。

表示惊訝或怀疑时也往往要重讀的。例如：

要請他？　要找您？　要請我？　要找事？

假如說話的人所注意的是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那么陰平“他”仍然由 55 变为 56，陽平“您”也仍然由 35 变为 36，但上声“我”却由 214（因为在句尾）变为 216，去声“事”也由 51 变为 513 了。（請参看《中国語文》1954 年 10 月号 41 頁或《史語集刊》第 4 本第 2 分 123 頁。）这是帶有感情色彩的重讀。

上面的例子已經可以証明一点，那就是在重讀的时候，或者音高增加，或者音長增加，或者音高音長都增加。关于重讀，我們只談到这里。

停頓的作用

一段話不可能一口气說完，因此，咱們把一段話分成若干句。当咱們說一句比較長的話甚至說一个比較長的詞兒的时候，也不可能把字与字之間的时間距离匀匀整整地摆得一样。比方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吧，在“党”字后面毫無問題是应該停頓一下的。在“周恩来总理招待蒙軍歌舞团”这一标題里（人民日报 7 月 11 日），“理”字和“待”字后面都应該頓一下，只是“理”字后面頓的比較長，“待”字后面頓的比較短而已。在“他問了許多問題”这句話里，“許”字前面很显然要停頓一下。引用別人的話的时候我們常用“說”字。例如：“毛主席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說”字后面的停頓也是很显然的（“民”字后面当然也有停頓）。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規律来，那就是：主語比較長的时候，主語后面应有停頓；宾語比較長的时候，宾語前面应有停頓；主語之后宾語之前都有停頓的时候，前一个停頓比后一个停頓長。如果主語謂語比較短，尤其是当主語是代名詞的时候，停頓現象就不很明显了。比方說“我喜欢詩”，“喜欢”的前后就听不出来有什么显著的停頓。在“我主張开会”这句話里，“开”字前的停頓也不很明显；但咱們如果說“我們全体人員主張赶紧开会”，那么“員”字后面和“赶”字前面的停頓就比較明显了。这只是通常的現象，不同的情形是有的。重讀会改变整个句子的意义，也会改变句子的速度和节奏；反过来說，等意义改变了，語言現象（包括語法在內）当然也要改变的。我們举几个例子来說：在“那样你就說不出去！”这句話里，我們如果在“說”字后面停頓一下，同时重讀“不”字，很显然“不出去”就是“說”的宾語；但如我們去了“說”字后面的停頓，重讀“出去”，同时把“不”字讀成輕声，那么，“不出去”就是“說”的可能补語（意思是沒法說得有道理）。在“我怕大家說不好”这句話里，我們如果在“不”的前面停頓一下，同时把“不好”兩字念得一样重，毫無問題，“不好”是“說”的宾語；但如果去了“說”字后面的停頓，重讀“好”字，同时把“不”字讀成輕声，那么“不好”就又是“說”的可能补語了。“跟”、“和”、“同”三个字有时用做連詞，有时用做副动詞，一般地說都不重讀，但是在停頓問題上就不同了。咱們举兩个例子看：在“你不应該跟（和、同）他發火兒”这句

話里，"跟"（"和"，"同"）是副动詞，"他"字后面沒有停頓；但在"你跟（和，同）他都有錯兒"这句話里，"跟"（"和"，"同"）是連詞，"他"字后面就一定有停頓。以上这些例子可以充分說明語言現象是互相关联的，不是彼此孤立的。

停頓对于音高是不是也有影响呢？我認为是有的。停頓表現得最明显的地方是一句之末，因此，当我們不在一个句子的別的詞兒上强調、重讀以及攙杂感情的时候，音高变化最大的地方也是句末。关于語气詞、輕声字的音高变化，前面已經談了一个大概，这里不打算再談；現在只談談句尾的陰平、陽平、上声和去声的音高变化。

一般地說，直陈句的句尾，不論是陰平、陽平、上声、去声，都是比較低的，如果直陈句里含有一个未完句，那么这个未完句的句尾就比較高。如果拿停頓的道理来解釋，我們就可以說未完句句尾的停頓比較短，已完句句尾的停頓比較長。比方說，在下面的四句里：

要說就赶紧說。　要走就赶紧走。

要来就赶紧来。　要念就赶紧念。

最后一个字的音高比第二个字的音高显然低得多。在第一句里，第一个"說"字如果是55，第二个"說"字差不多是33；在第二句里，第一个"来"字如果是35，第二个"来"字差不多是23；在第三句里，第二个"走"字由214差不多变为212；在第四句里，第二个"念"字差不多由51降为31的样子。

这是在不攙杂任何感情时的情形。如果帶着不耐煩的情緒来催促人，那么，第二个"說"字就可能变为551，第二个"来"字就可都变为351，第二个"走"字就可能变为2141，第二个"念"字就可能变为5121。（見《史語集刊》第4本第2分133頁或《中国語文》1954年10月号41頁。）

在問話里，我們如果只用單音节的疑問代詞作句尾，那么，这个疑問代詞的音高就跟原来的字調差不多。例如：

你找誰（35）？

你到哪兒（214）？

但是如果用疑問代詞做形容詞，情形就不同了。例如在以下四句里：

你念的什么書？

你念的什么文？

你用的什么笔？

你談的什么事？

这里的"書"、"文"、"笔"、"事"等字都是念得非常輕的。"什么"的"什"是重讀的，"什"是陽平，"么"是輕声；因此"什"后面兩个音节的音高差不多是31。我們把"什么文"，"什么事"和"拿上来""拿下去"一比，問題就更明显了。这是不帶感情时的情形，如果听的人沒听懂"書"字、"文"字等，問的人心不耐煩地又說第二遍，而且把問題說成"我是問你念的什么書！"等等，那么"書"、"文"、"笔"、"事"就又可能变为551、351、2141、5121了。

汉語的語調确实是很复杂的。上面談的这五个問題是互相联系的，但是在这样一篇短文里不可能把彼此間的錯綜关系討論得很詳細，本文打算就談到这里，請各位先生指教。

（接39頁）

魯迅主張"从活人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来"，他的語言同人民群众的語言保持着深刻的联系。虽然因为在国民党統治下，有时不得不采用比較隐晦曲折的表达方法，如他自己所說是"帶着枷鎖的跳舞"，但是人民群众的語言仍然是魯迅的語言的主要源泉，魯迅的語言是接近人民群众的語言的。这当然不是說魯迅就不吸收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了；相反地，魯迅常常吸收这些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語言。我們可以拿《阿Q正傳》的一段做例子：

> 据阿Q說，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
>
> 据阿Q說，……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將"，城里却連小烏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烏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見閻王"。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
>
> "你們可看見过杀头么？"阿Q說，"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搖搖头，將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臉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伸長脖子听得出神的王鬍的后項窩上直劈下去道，"嚓！"
>
> 王鬍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縮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

这是阿Q从城里回来以后向未庄的人們誇耀自己的"中兴"的一个場面。阿Q有不少听众，这些听众听了阿Q的話以后有种种反应，并且随着阿Q的故事的發展，他們的情緒也是有發展的。作者只用了"肃然、赧然、凛然、悚然、欣然"这几个字就把他們的反应概括地表达出来，而且把他們的情緒的起伏發展很好地貫串起来了。这五个古汉語形容詞用在这里，讓我們感觉到这个場面不是靜止的，而是躍动的。魯迅的語言能够达到簡鍊、生动的地步，这跟他善于吸取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成分不能說沒有关系。

个变化并不限于語气詞，非語气詞在这个地位上也是一样的。比方我們去掉上例的兩个“呢”字，而說成：

他找你，还是找我？

“你”和“我”虽然同屬上声，但“我”字在这里比“你”字就低得多了。

(3) “吧”字表示犹豫的时候讀半高調即四度。例如：

去吧(4)，怕他来；不去吧(4)，又怕他不来。

(4) “啊”字表示列举时也是四度。例如：

他的杂志很多：世界知識啊，語文学習呀，
中国語文吶，文艺报哇，他都有。

(5) 表示肯定語气的“的”、“了”、“呢”、“罢”、“么”和“啊”，都可以按照第一节念輕声的念法念。例如：

他来的(3)。
他来了(3)。
他才不肯来呢(3)！
来罢(3)。
他說他来么(3)。
赶紧来啊(3)。

这些語气詞之所以都讀为三度，是因为前一音节是陽平。关于語气詞的音高，本文只談到这里。

重讀

每一汉字都有一定的調子，每一个字調又有一定的音高，遇到一个詞兒有輕声字的时候，輕声字的音高又按照前一字的音高起一定的变化，看起来好像在汉語里并無重讀的問題存在。其实不然，比方，在“我們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句話里，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一样輕重的；这里面最突出、最显著的一个詞，恐怕是“一定”，也就是說“一定”一詞在这句話里念起来比其他各詞都重。这是汉語語法关系所固定下来的。又如在“他能打字”这句話里，如果說的时候不帶任何感情，那么最后一个字是比較显著的。这也是汉語語法关系固定下来的。但听話的人如果有所誤会，那么說話的人再說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有加重的可能；重讀“他”，是說不是别人，重讀“能”，是說并不是“要(打字)”，重讀“打”，是說不是“写字、刻字”，如果特别重讀“字”，那是說不是打别的。这样重讀之后，音量变大了，音高也不同了。陰平“他”由 55 变为 56，陽平“能”由 35 变为 36，半上“打”和去声“字”原为 21 和 51，現在也变得更低了，差不多低到不能再低的样子。这是說明眞相表示对比的重讀。

表示惊訝或怀疑时也往往要重讀的。例如：

要請他？ 要找您？ 要請我？ 要找事？

假如說話的人所注意的是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那么陰平“他”仍然由 55 变为 56，陽平“您”也仍然由 35 变为 36，但上声“我”却由 214 (因为在句尾)变为 216，去声“事”也由 51 变为 513 了。(請参看《中国語文》1954 年 10 月号 41 頁或《史語集刊》第 4 本第 2 分 123 頁。)这是帶有感情色彩的重讀。

上面的例子已經可以証明一点，那就是在重讀的时候，或者音高增加，或者音長增加，或者音高音長都增加。关于重讀，我們只談到这里。

停頓的作用

一段話不可能一口气說完，因此，咱們把一段話分成若干句。当咱們說一句比較長的話甚至說一个比較長的詞兒的时候，也不可能把字与字之間的时間距离匀匀整整地摆得一样。比方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吧，在“党”字后面毫無問題是应該停頓一下的。在“周恩来总理招待蒙軍歌舞团”这一标題里(人民日报 7 月 11 日)，“理”字和“待”字后面都应該頓一下，只是“理”字后面頓的比較長，“待”字后面頓的比較短而已。在“他問了許多問題”这句話里，“許”字前面很显然要停頓一下。引用别人的話的时候我們常用“說”字。例如：“毛主席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說”字后面的停頓也是很显然的(“民”字后面当然也有停頓)。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規律来，那就是：主語比較長的时候，主語后面应有停頓；宾語比較長的时候，宾語前面应有停頓；主語之后宾語之前都有停頓的时候，前一个停頓比后一个停頓長。如果主語謂語比較短，尤其是当主語是代名詞的时候，停頓現象就不很明显了。比方說“我喜欢詩”，“喜欢”的前后就听不出来有什么显著的停頓。在“我主張开会”这句話里，“开”字前的停頓也不很明显；但咱們如果說“我們全体人員主張赶紧开会”，那么“員”字后面和“赶”字前面的停頓就比較明显了。这只是通常的現象，不同的情形是有的。重讀会改变整个句子的意义，也会改变句子的速度和节奏；反过来說，等意义改变了，語言現象(包括語法在内)当然也要改变的。我們举几个例子来說：在“那样你就說不出去！”这句話里，我們如果在“說”字后面停頓一下，同时重讀“不”字，很显然“不出去”就是“說”的宾語；但如我們去了“說”字后面的停頓，重讀“出去”，同时把“不”字讀成輕声，那么，“不出去”就是“說”的可能补語(意思是沒法說得有道理)。在“我怕大家說不好”这句話里，我們如果在“不”的前面停頓一下，同时把“不好”兩字念得一样重，毫無問題，“不好”是“說”的宾語；但如果去了“說”字后面的停頓，重讀“好”字，同时把“不”字讀成輕声，那么“不好”就又是“說”的可能补語了。“跟”、“和”、“同”三个字有时用做連詞，有时用做副动詞，一般地說都不重讀，但是在停頓問題上就不同了。咱們举兩个例子看：在“你不应該跟(和、同)他發火兒”这句

話里，“跟”（“和”，“同”）是副动詞，“他”字后面沒有停頓；但在“你跟（和，同）他都有錯兒”这句話里，“跟”（“和”，“同”）是連詞，“他”字后面就一定有停頓。以上这些例子可以充分說明語言現象是互相关联的，不是彼此孤立的。

停頓对于音高是不是也有影响呢？我認为是有的。停頓表現得最明显的地方是一句之末，因此，当我們不在一个句子的別的詞兒上强調、重讀以及攙杂感情的时候，音高变化最大的地方也是句末。关于語气詞、輕声字的音高变化，前面已經談了一个大概，这里不打算再談；現在只談談句尾的陰平、陽平、上声和去声的音高变化。

一般地說，直陈句的句尾，不論是陰平、陽平、上声、去声，都是比較低的，如果直陈句里含有一个未完句，那么这个未完句的句尾就比較高。如果拿停頓的道理来解釋，我們就可以說未完句句尾的停頓比較短，已完句句尾的停頓比較長。比方說，在下面的四句里：

要說就赶紧說。　要走就赶紧走。
要来就赶紧来。　要念就赶紧念。

最后一个字的音高比第二个字的音高显然低得多。在第一句里，第一个“說”字如果是55，第二个“說”字差不多是33；在第二句里，第一个“来”字如果是35，第二个“来”字差不多是23；在第三句里，第二个“走”字由214差不多变为212；在第四句里，第二个“念”字差不多由51降为31的样子。

这是在不攙杂任何感情时的情形。如果帶着不耐煩的情緒来催促人，那么，第二个“說”字就可能变为551，第二个“来”字就可都变为351，第二个“走”字就可能变为2141，第二个“念”字就可能变为5121。（見《史語集刊》第4本第2分133頁或《中国語文》1954年10月号41頁。）

在問話里，我們如果只用單音节的疑問代詞作句尾，那么，这个疑問代詞的音高就跟原来的字調差不多。例如：

你找誰（35）？
你到哪兒（214）？

但是如果用疑問代詞做形容詞，情形就不同了。例如在以下四句里：

你念的什么書？
你念的什么文？
你用的什么笔？
你談的什么事？

这里的“書”、“文”、“笔”、“事”等字都是念得非常輕的。“什么”的“什”是重讀的，“什”是陽平，“么”是輕声；因此“什”后面兩个音节的音高差不多是31。我們把“什么文”，“什么事”和“拿上来”“拿下去”一比，問題就更明显了。这是不帶感情时的情形，如果听的人沒听懂“書”字、“文”字等，問的人心不耐煩地又說第二遍，而且把問題說成“我是問你念的什么書！”等等，那么“書”、“文”、“笔”、“事”就又可能变为551、351、2141、5121了。

汉語的語調确实是很复杂的。上面談的这五个問題是互相联系的，但是在这样一篇短文里不可能把彼此間的錯綜关系討論得很詳細，本文打算就談到这里，請各位先生指教。

（接39頁）

魯迅主張“从活人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来”，他的語言同人民群众的語言保持着深刻的联系。虽然因为在国民党統治下，有时不得不采用比較隐晦曲折的表达方法，如他自己所說是“帶着枷鎖的跳舞”，但是人民群众的語言仍然是魯迅的語言的主要源泉，魯迅的語言是接近人民群众的語言的。这当然不是說魯迅就不吸收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了；相反地，魯迅常常吸收这些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語言。我們可以拿《阿Q正傳》的一段做例子：

据阿Q說，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

据阿Q說，……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醬”，城里却連小烏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烏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見閻王”。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

“你們可看見过杀头么？”阿Q說，“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將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臉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伸長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項窩上直劈下去道，“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縮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

这是阿Q从城里回来以后向未庄的人們誇耀自己的“中兴”的一个場面。阿Q有不少听众，这些听众听了阿Q的話以后有种种反应，并且随着阿Q的故事的發展，他們的情緒也是有發展的。作者只用了“肃然、赧然、凛然、悚然、欣然”这几个字就把他們的反应概括地表达出来，而且把他們的情緒的起伏發展很好地貫串起来了。这五个古汉語形容詞用在这里，讓我們感覺到这个場面不是靜止的，而是躍动的。魯迅的語言能够达到簡鍊、生动的地步，这跟他善于吸取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成分不能說沒有关系。

論所謂从屬連詞的詞性和它們在复合句中可用可不用的問題

宋 祚 胤

本文要討論的所謂从屬連詞，指的是偏正复合句中用于偏句的关系虛詞，如“因为”“虽然”“如果”“旣然”“与其”“不但”等等。“从屬連詞”这个名称是暫时借用的，因为它是这些虛詞的專名。

要正确决定这些虛詞的詞性，得先解决汉語关联虛詞到底应該憑哪些不同的句法功能（这是主要根据）并結合哪些不同的句法特点来进行分类的問題。① 这一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这些虛詞就可能被認定是連詞或从屬連詞或关系副詞，就可能被認定是“可用可不用”的。这些又都会影响到汉語偏正复合句的句法構成問題和确定并表达偏句正句之間邏輯关系的問題的正确解决。

現在先把兩个常用的关联虛詞“將”和“对于”来考察一下。

> 照直說，說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却了。（魯迅：为了忘却的記念）
>
> 談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終于很隔膜。（同上）

从这兩个例句可以看出，“將”“对于”有把名詞或代詞或名詞性詞組規定为修飾成分的句法功能。还可以看出，“將”“对于”有如下的句法特点：1）不是可用可不用的。如果不用“將”“对于”，不但“他們”或“她”無法修飾謂語主要部分，而且还不成句。② 2）前面可以有修飾成分（如前一句的“倒要”）。3）用在規定为修飾成分的名詞或代詞或名詞性詞組之前。

关联虛詞中，凡句法功能同“將”“对于”相同而句法特点又基本一致的，我們拿来同“將”“对于”划成一类，叫介詞。

再把“和”“并”这兩个关联虛詞考察一下。

> 不論建社工作和鞏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幹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責成他們去做。（毛澤东：关于农業合作化問題）
>
> 这种思想，無論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長的历史时期內是屬于唯心論的宇宙观，并在人們思想上占了統治地位。（毛泽东：矛盾論）

从这兩个例句可以看出，“和”“并”的句法功能是把具备并列关系的詞語联結起来。还可以看出，“和”“并”有如下的句法特点：1）一般說来，可用可不用，因为所联結的詞語的并列关系經常同时由别的句法手段来表达。③ 2）前面不能有任何修飾成分。3）一定用在所联結的詞語之間。

关联虛詞中，凡句法功能同“和”“并”相同而句法特点又基本一致的，我們拿来同“和”“并”划成一类，叫連詞。

汉語关联虛詞还能划出一类关系副詞；如：

>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样从实践發生，而又服务于实踐呢？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过程就会明了。（毛澤东：实踐論）
>
> 他的江漸漸的改变过来，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有三四尺的。（魯迅：为了忘却的記念）

可以看出，“又”“就”“也”“却”的句法功能是修飾所在的句子的謂語，使之同前置的句子关联。还可以看出，“又”“就”“也”“却”的句法特点是前面可以有修飾成分，用在主謂之間。

关联虛詞中，凡句法功能同“又”“就”“也”“却”相同而句法特点又基本一致的，我們都叫关系副詞。

以上主要憑句法功能的不同，結合某些句法特点的不同，把关联虛詞分成了三点。斯特罗果維契教授指出：“作为分类的根据的却不应当是任何一个本質屬性，而是最主要的本質屬性，即被分类的对象和現象的其它一切屬性所依存、所从之推出来的那一屬性。”④ “然后划分才会是科学的，才会有实踐的价值。”⑤ 那么，以上那三种句法功能，是否分别为介詞連詞关系副詞的最主要的句法功能呢？这就还得从兩方面来分析：1）介詞連詞关系副詞的一切句法特点是

---

① B. B.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認为划分詞类除了应注意“足以决定詞的分屬于不同的基本語法范疇的各种差別”之外，更应注意的是“各种范疇的詞在連續語言里，在句子的結構里，所显示的句法上的功能”。參看A. A. 龙果夫教授《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国語文》1955年1月号，13頁。

② 句法功能同“將”“对于”相同的“在”“从”“到”，如果用在时地詞前面一起修飾謂語主要部分时，便是可用可不用的；这是因为时地詞有充当修飾成分的功能。

③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詞語的并列关系，为别的句法手段所难以表达，才不能任意不用；例如：“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魯迅：祝福）

④ 斯特罗果維契《邏輯》，人民出版社版，125頁。

⑤ 同上，117頁。

否依存于以上据以分类的句法功能；2)根据以上的句法功能来划分介詞連詞关系副詞是否有实踐的价值。

先来看看介詞的句法特点是否依存于据以分类的句法功能。

(一)介詞的句法特点之一就是一般不是可用可不用的，只有在特殊条件之下才可以不用。这或是由于必須用介詞，某些詞語才能同介詞一起成为修飾成分，或是由于不用介詞，某些詞語就可能变成主要成分。因此，介詞規定所介的詞語必然是同介詞一起充当修飾成分的这一句法功能，就决定了介詞一般不是可用可不用的。

(二)介詞的另一句法特点是介詞結構前面可以有修飾成分，但情形却是这样：“我倒要將他們忘却了”說成“我倒要忘却了”成話，說成“我倒要將他們”不成話；“你暫且把心用在这几本書上”，也可以說成“你把心暫且用在这几本書上”。可見修飾成分主要是修飾中心成分的，介詞結構是附屬于中心成分而随着被修飾，不單受修飾。这一句法特点也是由介詞規定所介的詞語只能同介詞一起充当修飾成分而不能是中心成分这一句法功能决定的。

(三)介詞的又一句法特点是用在所介的詞語之前。这也是由于介詞对于所介的詞語有規定为修飾成分的作用。汉語的詞序是：有規定作用的詞語通常在前，被規定的詞語通常在后。

再来看看連詞的句法特点是否依存于据以分类的功能。

(一)連詞的句法特点之一是所联結的詞語的并列关系如果同时还能由别的句法手段表达，便可用可不用，如果为别的句法手段所难以表达，便不能任意不用。这都决定于連詞的句法功能：把本来具备并列关系的詞語联結起来从而把并列关系表达得更清楚。并列关系旣然清楚了，自然用也好，不用也好。①

(二)連詞的另一句法特点是前面不能有任何修飾成分。这正可以看出，連詞不能用于有偏正关系的句法結構之中；也正足以說明，連詞只能用于有并列关系的句法結構之中。

(三)連詞还有一个句法特点是用在并列成分之間。这是由于并列成分有对称关系，用在中間才無所偏倚，从而更好地表达并列关系。

关系副詞的句法特点同样依存于据以分类的句法功能。它們主要是修飾所在句子的謂語，使所在句子同前面句子关联是由此而派生的作用，因而只能用于主謂之間。因为是修飾謂語的，因而前面还可以有修飾成分。这同介詞結構前面可以有修飾成分的道理一样。

可以看出，以上的分类是还合乎分类原則的。但是，是否有实踐的价值呢？

关联虛詞是語法成分，分类的实踐价值就在于有助于說明不同的句法結構关系。像以上那样划分的介詞連詞和关系副詞，根据的是表达汉語句法結構的不同关系的句法功能，因而划分出来的詞类也就有助于說明汉語句法結構的不同关系。这对于汉語的句法分析应該还是有些用处的。

現在可以看看所謂从屬連詞的句法功能和句法特点。

> 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員二百万，群众便有約一千万。（毛澤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 鄰近的紳士因为不肯繳鴉片槍，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同上）
>
> 虽結果不見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据双方全局，仔細地切实地想明白。（毛澤东：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
>
> 买办阶級和地主阶級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毛澤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 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指旧中国——宋注）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狀态之下。（毛澤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兩种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这兩种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澤东：矛盾論）

有“因为”“虽然”（包括“虽”）“如果”的句子都不能独立运用，必須同后面的句子配合起来，才能表达一个复杂而完整的意义。但是，如果把“因为”“虽然”（包括“虽”）“如果”去掉，这些句子就都可以独立成句，而不一定必須同后面的句子配合起来了。由此可見，“因为”“虽然”（包括“虽”）“如果”的句法功能是規定并表明所在的句子一定是偏句而必須依附于正句，从而構成偏正复合句。

这些虛詞有如下的句法特点：1)必須構成偏正复合句而又不运用別的可以运用的句法手段，这些虛詞非用不可。2)所在的偏句之前还可以有修飾語，主要是修飾正句的。偏句因依附于正句而随着被修飾，不單独受修飾。这在前举末一例句中可以看出。3)用在所在偏句主語之前或主謂之間。

現在有条件来討論所謂从屬連詞的詞性問題了。

这些虛詞王力先生在《中国語法理論》里認为关系

---

① 这是專从語法着眼的。

副詞①，理由是"它們常居于末品地位"，而又"和普通的副詞不同，因为一个句子形式里如果加上了这种的詞，这句子形式就丧失了它的独立性"。② 这种看法还可以商榷。

首先，从句法功能看，这些虚詞同"也""又""倒""反""却""就"完全不同。王先生也看到："一个句子形式里如果加上了这种的詞，这句子形式就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可是，任何句子加上"也""又""倒""反""却""就"之一都不会丧失独立性。③ 因此，这些虚詞詞性同"也""又""倒""反""却""就"根本不同。"也""又""倒""反""却""就"是关系副詞，这些虚詞不是关系副詞。

其次，从句法特点看，这些虚詞同"也""又""倒""反""却""就"也不相同。

(一)这些虚詞虽然可以用在主謂之間，似乎"常居于末品的地位"，但又常用在主語之前，这就决不是"末品"所能居的地位了。这些虚詞同副詞还有区别，因此也不能是关系副詞。

(二)"也""又""倒""反""却""就"作为关系副詞用，都居于后置句子的主謂之間，同前置句子关联。这些虚詞即使居于主謂之間，也总在前置句子中，同后置句子关联。欧化句式顚倒了这种句序，但这些虚詞却又在主語前了。从这一点看，这些虚詞同关系副詞也有不同。

这些虚詞是否可以划入"和""并"一类都叫連詞呢？这也得从句法功能并結合句法特点来比較观察。

"和""并"的句法功能是联結并列成分，表达并列关系：并列关系不明确的，用上"和""并"就明确了。这些虚詞的句法功能是規定可能独立运用的句子为偏句，使之依附于正句，从而表达偏正关系：本来是并列复合句，如果一个分句可以用上这些虚詞之一，就变成偏正复合句了。二者句法功能根本不同。

这些虚詞的句法特点是：

(一)"和""并"一般可用可不用：只有詞語的并列关系为别的句法手段所难以表达时，才不能任意不用。这些虚詞一般都不能任意不用；只有"如果"(包括"倘若""要是"等)，句法功能往往能由别的句法手段代替，才可用可不用(这些情况下文都要加以分析說明)。这一点二者是异多于同。

(二)"和""并"前面不能有任何修飾成分，不受任何修飾。这些虚詞的情况是：除了"因为""由于""为了"这一小部分以外，其余的也不能受沒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但是，所在的偏句都能受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这些虚詞是偏句的句法成分之一，当然也隨着受修飾。因此就能否受沒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来看，二者大异而小同；就能否受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来看，二者完全不同。总的来看，还是异多于同。

(三)"和""并"用在并列成分之間。这些虚詞却用在偏句主語之前或主謂之間。二者在句法結構中的位置不同。欧化句式这些虚詞用在分句之間了，但是，一方面得看到这只是特殊情况，另一方面更得考虑到仍然是在偏句之前。

根据以上分析，要把这些虚詞划入"和""并"一类都叫連詞是不合乎詞类划分原則的。

这些虚詞是否可以划入"將""对于""在""从""到"一类都叫介詞呢？这也还得从句法功能并結合句法特点来比較观察。

"將""对于"等的句法功能是把本来能充当主要成分的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組規定为修飾成分一起去修飾中心成分，从而表达偏正关系。这些虚詞的句法功能是把本来能独立运用的动詞謂語句(包括所謂判断句在內)形容詞謂語句規定为偏句一起去修飾正句，从而表达偏正关系。如果認为"將""对于"等規定的是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組，用于簡單句，这些虚詞規定的是动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用于复合句，不能算是有相同的句法功能，那么为什么又都承認連詞旣可以联結名詞，又可以联結动詞形容詞，旣可以联結單詞和詞組，又可以联結句子呢？从"基本共同之点"着眼来認識連詞是合乎"文法"的"抽象化"原則的。这些虚詞同"將""对于"等有"基本共同之点"是無可怀疑的。二者有相同的句法功能。

还可以看看句法特点：

(一)"將""对于"等一般不是可用可不用的；这些虚詞一般也不是可用可不用的。但要指出的是，有时不用"將""对于"就不成句；不用这类虚詞，又沒有别的句法手段，只能使分句之間的偏正关系丧失，偏正复句無法構成，至于原来的偏句是还成句的。从这一句法特点看，二者是大同而小异。

(二)"將""对于"等旣可以受沒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也可以受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例如："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政治工作机关隶屬于軍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毛澤东：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美国在实际行动中，对于許多拒絕参加軍事集团的国家，还在施行各种粗暴的压力"。(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这些虚詞除了"因为"等一小部分

---

① 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上册，中华書局版，354頁。

② 同上，353頁。

③ 王先生把"饒""旣"同"也""又"等放在一起也不大妥当，因为一个"句子形式"加上"饒"或"旣"也会失去独立性。参看《中国語法理論》上册，354頁。

外，一般不受沒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却都能受有語音停頓的修飾成分修飾。从这一点看，三者是同稍多于异。

(三)"將""对于"等用在所規定的詞語之前。这些虛詞有时用在所規定的偏句之前，有时用在所規定的偏句的主謂之間。后者有兩种情况：一种是偏正句同一主語，这些虛詞还是用在所規定的偏句之前，这在主語后出現的句子看得更明白。試比較："他因为努力，有了进步"。"因为努力，他有了进步"。一种是偏正句主語不同，那就不是用在所規定的偏句之前了。从这一点看，二者还是同多于异。

根据以上分析，从句法功能看，这些虛詞同"將""对于"等相同，从句法特点看，有同有异，但同多于异。根据詞类划分原則，把这些虛詞划入"將""对于"等一类都叫介詞是比較合适的。汉語名詞动詞形容詞不也是不能有全部相同的句法特点嗎？

这些虛詞旣难以划入連詞，却能够划入介詞，那么，說成从屬連詞，不但是有語法理論上的問題，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了。

以上从詞性分析中明确了"因为""虽然""如果"等虛詞有規定偏句的句法功能，是構成偏正复合句的重要句法手段。这些虛詞还經常同連詞"所以""但是"等，同关系副詞"就""却"等配合起来确定并表达偏句正句之間的邏輯关系。像上文引毛主席的那六句話：一二兩句如果去掉"因为"，原因关系就不明确突出；三四兩句如果去掉"虽""虽然"，讓步关系就完全丧失；只有五六兩句，去掉"如果"条件关系还可以由別的句法手段表达，但却不及用上"如果"那样明显。所有这些，都說明了这些虛詞在汉語复合句中的巨大作用。

但是，語法学界目前仍流行着这些虛詞在复合句中"可用可不用"的說法。若从語法角度理解，这就意味着：

(一)有別的句法手段可以用来代替所有的这些虛詞，一样地構成偏正复合句；

(二)有另外的什么手段可以用来代替所有的这些虛詞，一样地确定并表达偏句正句之間的邏輯关系。

王力先生的意見是："在中国語里連詞①可用可不用"②是"由于主从句次序的固定"③，因此"中国語文里兩个句子形式相联結，虽然沒有連詞，我們还知道上一个句子形式含有'虽''縱''若''如''倘''旣''因'等意义，这是因为从屬部分必須居前的緣故"。④王先生是認为：这些虛詞構成偏正复合句的句法功能，以及确定并表达偏句正句之間邏輯关系的作用，都可以为另一句法手段——句序所代替。現在，把王先生的理論同实踐对照起来看看。

王先生認为轉折式和容許式，按斷式和理由式，性質都很相近，然而有"等立"和"主从"的分別。轉折式的例句是："他發財了，但是他仍旧不快乐"。容許式的例句是，"他虽然發了財，仍旧不快乐"。按斷式的例句是："这人对朋友不忠实，你应該同他少来往"。理由式的例句是："这人旣然对朋友不忠实，你就应該同他少来往"。⑤"他發財了"同"他虽然發了財"，"这人对朋友不忠实"同"这人旣然对朋友不忠实"，都是"居前"的"句子形式。"根据王先生的理論，"他發財了"就含有"虽然"，"这人对朋友不忠实"就含有"旣然"，無从区別轉折式和容許式，按斷式和理由式，而应該一律是容許式或理由式；更無从判定轉折式和按斷式是"等立"复合句，而应該一律是"主从"复合句。在这里，王先生憑什么区分轉折式和容許式，按斷式和理由式，又憑什么判定容許式和理由式是"主从"复合句，轉折式和按斷式是"等立"复合句呢？原来王先生据以区分轉折式和容許式，按斷式和理由式的是用不用"連詞"：不用"虽然"的是轉折式，用"虽然"的是容許式，不用"旣然"的是按斷式，用"旣然"的是理由式；据以判定"主从"复合句和"等立"复合句的也是用不用"連詞"：用"虽然""旣然"的是"主从"复合句，不用"虽然""旣然"的是"等立"复合句。王先生自己也說，"咱們在形式上也很容易分辨，理由式往往是有'旣'字的，按斷式是沒有'旣'字的"。⑥ 可見，在实踐中，王先生并不認为"連詞"是"可用可不用"的，相反地却把"連詞"看成是構成"主从"复合句的句法手段，有确定并表达"从"句"主"句之間邏輯关系的作用。至于句序，只是汉語"主从"复合句的一种表現形式，單憑句序，是無法構成"主从"复合句，也無法确定并表达出"从"句"主"句之間的邏輯关系来的。

王先生沒有認眞貫徹自己的理論。王先生的理論立足于他的所謂"意合法"。⑦ 中国科学院《語法講話》完全接受了王先生"意合法"理論而且徹底予以貫徹，把"張先生因为病了，沒来"。和"張先生病了，所以沒来"都看成是一偏一正的因果句，把"臉色青黃，但兩頰还是紅的"和"虽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認賬"都看成是一偏一正的讓步句，無視于句式和邏輯关系的不同。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見單憑句序手段就能代替这些虛詞的說法是靠不住的，不能成为这些虛詞"可用

① 这里的連詞指的"因为""虽然"等，在同一書(中国語法理論)中又認为关系副詞。

② 《中国語法理論》上册114頁。

③④ 同上，第125頁。

⑤ 例句均見《中国語法理論》上册118—119頁。

⑥ 王力：《中国現代語法》上册，商务印書館，118頁。

⑦ 参看《中国語法理論》上册115頁。

⑧ 例句均見《中国語文》1953年6月号，28頁。

可不用”的理由。是否还有别的句法手段足以代替这些虛詞的規定偏句的句法功能和表达邏輯关系的作用呢？如果根本沒有，那这些虛詞就是非用不可的。如果有，那这些虛詞就是“可用可不用”的。如果虽然有，但只能代替一部分，那这些虛詞便有些非用不可，(以上所謂非用不可，都是指必須構成偏正复合句同时又必須表达出一定的邏輯关系而言的。)有些“可用可不用”。但还得分析用与不用，情况是否完全相同。因此，要进一步解决这些虛詞是否“可用可不用”的問題，关鍵还在于放弃“意合法”，从語言事实中去分析汉語偏正复合句的句法構成和邏輯关系如何表达的这些問題。而为了把这些問題弄得更清楚，先拿幷列复合句来分析一下以便对照起来看是有好处的。

汉語复合句句法構成問題和邏輯关系如何表达問題是个大問題，这里只簡單談一下，到能够解决这些虛詞是否“可用可不用”这一問題的程度就算了。

一般說来，汉語幷列复合句的構成和邏輯关系的表达，有以下几种句法手段。

(一)憑單純的結構关系，例如：

他們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

四个分句互不依賴，以共一个主語“他們”而構成幷列复合句。句中沒有表达特种邏輯关系的連詞或关系副詞，分句之間存在的只是一般的联合关系。

(二)依靠連詞或关系副詞，例如：

人們都在灯下忽忙，但窗外很寂靜。(魯迅：祝福)

別人家都在地里鋤苗，二諸葛却領着兩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赵树理：小二黑結婚)

兩个例句中的分句主語不同，都可以独立成句，以連詞“但”和关系副詞“却”而構成幷列复合句，分句之間的轉折关系也分別由“但”和“却”表达出来。

(三)依靠以上兩种句法手段的結合，例如：

她当时幷不回答什么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祝福)

我到鎮的东头訪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見她。(同上)

連詞和关系副詞在这类幷列复合句中，主要作用是表达邏輯关系。例句一如果不用“但”，轉折关系便無法看出。例句二如果不用“就”，兩事緊接的关系也不够清楚。

一般說来，汉語偏正复合句的構成和邏輯关系的表达，有以下几种句法手段。

(一)完全依靠这些虛詞。像上文引毛主席那六句話的第四句，去掉“虽然”，第一分句就恢复独立性，变成不同主語的幷列复合句[試同“人們都在灯下忽忙，但窗外很寂靜”比較]，甚至还可以看成兩个句子[試同“誰都知道，朝鮮战場是艰苦些。但他們是怎样想的呢？”(魏巍：誰是最可爱的人)比較]；同时讓步关系完全丧失，由“可是”表达轉折关系。再看下面的句子：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偉大历史經驗，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滿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問題經驗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毛澤东：关于农業合作化問題)

这是兩个主語不同、各自独立的句子，句和句之間也只由“可是”表达轉折关系。如果在第一句前面加上“虽然”，第一句就丧失独立性，必須依附于第二句，再沒有分为兩个句子的可能，而变成了一个偏正复合句，新的邏輯关系——讓步关系也由“虽然”明白确切地表达出来了。

(二)主要依靠这些虛詞，結合結構关系。像上文引毛主席那六句話的第二句，去掉“因为”，第一分句也就恢复了独立性，全句变成了一个同主語的幷列复合句[試同“他們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比較]同时原因关系也不明确了。再看下面的句子：

她不很爱說話，別人問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祝福)

这是一个同主語的幷列复合句，分句之間只看出联合关系。如果在第一分句的主謂之間加上“因为”，这个分句就丧失了独立性，全句变成了一个偏正复合句，而原因关系也由“因为”明白确切地表达出来了。

(三)依靠分句謂語动詞的形态。这种情况只存在于有条件关系的偏正复合句。看下面的句子：

你死了，我做和尚。

碰坏一点，你可仔細你的皮。

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花大姐姐去。

你再这么着，这一个地方可也就难住了。

老太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①

这些都是有明确条件关系的偏正复合句，但却也幷不是“意合法”構成的，条件关系和偏正关系，分別由謂語动詞的綜合形态或分析形态表达出来。第一、二句，“做”和“仔細”的未完成体，襯托出“死”和“碰坏”的完成体的虛拟性質，因而“你死了”和“碰坏一点”，不是事实，只是条件。第三句，“依”和“找”都是未完成体，假設的性質更为明显，也就表达了条件关系。这三句是由謂語动詞的綜合形态構成条件关系和偏正关系的。第四句的“再”，表达了“你这么着”的虛拟性質，第五句的“就”，表达了“老太太那里有信”的虛拟性質，因而“你这么着”和“老太太那里有信”，也都不是事实，是条件。这兩句是由謂語动詞的分析形态構成条件关系和偏正关系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只有“如果”“倘若”“要是”等表达条件关系从而構成偏正复合句的虛詞，在分句謂語动詞形态能構成条件关系和偏正关系的情况

---

① 均引自《中国現代語法》上册，112—115頁。

下，才"可用可不用"；其余的虚詞的規定偏句的句法功能和确定并表达偏句正句之間邏輯关系的作用都沒有別的句法手段可以代替，因而它們都不是"可用可不用"的。

还应該指出的是：由謂語动詞形态構成的有条件关系的偏正复合句都可加上"如果""要是""倘若"等虚詞来使"假設的意思更明显些"。更值得注意的是：像上文分析的那样，"如果""要是""倘若"等虚詞，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够把謂語动詞形态不表达条件关系的兩个各自独立的句子或者是一个并列复合句規定为一个具备条件关系的偏正复合句。这在下面兩組句子中可以看出来。

(一)他天天学游泳还是学不会。你將怎样帮助他呢？
　　如果他天天学游泳还是学不会，你將怎样帮助他呢？

(二)他天天学游泳还是学不会，慢慢会灰心。
　　他如果天天学游泳还是学不会，慢慢会灰心。

可見，尽管謂語动詞形态有时能表达条件关系，構成偏正关系，还是不能把"如果""要是""倘若"等虚詞完全理解成"可用可不用"的。

代詞是一种独立的詞类

曾 聪 明

乃凡先生在《关于"代詞"》一篇短文里面①，对代詞的作为一种独立的詞类表示怀疑。这个問題是帶有一般性的。因为至今还有些語法著作把代詞附屬于名詞或其他詞类項下；有些虽把代詞独立成章，但仍然采取傳統的見解，認为代詞之所以成为独立的詞类，那是由于它的"代替"作用。这样，就自然会引起別人的怀疑。

代詞成为独立的詞类，理由不在于它的代替作用。这在苏联語言学界是早已正确地論証了的。本文主要是介紹苏联在这方面的先进的理論，供我們語言学者参考。

依照傳統的看法，代替靜詞的詞叫做代詞，原来希腊文 antonymia 和拉丁文 pronomen 就是"代替靜詞"的意思。因此，代替作用被看成代詞的本質性的特征。

不錯，代替作用的确是代詞的一种主要特征，正是因为这种作用，說話行文才能避免重复。这种修辞作用是以往許多語言学者再三提到的。罗蒙諾索夫說："概念的繁多和力求迅速簡煉地表現它們的願望，使人們不自覺地去寻求縮減語言和免除語言中的枯燥的重复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那些含有几个不同思想的簡潔的詞类：即代詞，副詞，感嘆詞……。"② 馬建忠也說："凡行文所以用代字者，免重复，求簡潔耳。"③ 但是，代替作用無論如何不能看做代詞之所以成为独立詞类的根据。

第一，不是所有的代詞都能起代替作用。比如疑問代詞，正如王力先生所說，"如果依照严格的說法……并不是一种眞正的代詞，因为它們既不能有先詞，也不會代替什么"。④ 同样的理由，第一人称代詞"我"和第二人称代詞"你"一般沒有这种代替作用，"我是中国人"、"你是好学生"里的"我"和"你"是不需要先詞的。"老五是个勤勉的学生，他經常讀書到深夜"，第三人称代詞"他"在这里起的明显的代替作用，是"我"和"你"所不能具有的。上面用了"一般"兩个字，那就是說还有例外的情形。比如在直接引語里，"我"和"你"也可看成是代替某一先詞，这一点是过去不为人注意的。但是即使如此，它們的代替作用跟"他"的代替作用也有不同。比如在"老五对老張說'我明天上北京'"、"老五对老張說'你应該好好学習'"里面，"我"和"你"也可看成分別代替"老五"和"老張"，但是却不能因此將"我"和"你"分別还原为"老五"和"老張"⑤，而前举"……他經常讀書到深夜"的"他"，就完全可以还原为"老五"。

第二，代替作用是一种修辞手段，它不能当作語法特征至少不能当作主要的語法特征来了解，因为能起这种作用的不仅是代詞。比如同义詞的相互代替就是常見的修辞手段，"爱人"、"老婆"、"妻子"、"孩子他媽"等常常可以互代。非同义詞有时也能代替，例如"学生前科看广东榜，知道賢契高發"(儒林外史)、"侄子如今

① 見《中国語文》1955年4月号。

② 見«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языке» 1954年版 19—20頁；«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54年) 83—86頁。

③ 《馬氏文通》二之二。

④ 《中国現代語法》下册59頁。

⑤ 但古汉語有这种習慣，如"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这是种謙称的方式。見呂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中卷54頁。

也有几个字兒，請姐姐看看”(兒女英雄傳)里面，“学生”、“妹子”实际上代替“我”，“姐姐”代替“你”。反之，能起代替作用的代詞(如“他”)也不見得任何时候都起代替作用。比如“去他的”、“滾他的”、“今夜里彈他几操，博箇相逢”(蒼西廂)，“他”字实無所指。①又如“他，中国人民的好兒子黃繼光同志，为了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已宝貴的青春”，显然并非用“他”来代替黃繼光同志，反而是用后者来闡明“他”的含意；它的作用跟“黃繼光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兒子，他为了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貴的青春”的“他”判然不同。

第三，代詞的这种代替作用受着語法特征的限制，这可从汉語俄語对譯中看出来。“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это жизнь. Она даётся ему только один раз”，譯成中文是“人生最宝貴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可見由于汉語代詞沒有性的形态标志，она 和 ему 就不能都譯成汉語的代詞，也就是說，代詞的“代替”作用受到了語法特征的限制。但是与之相反，不起代替作用的代詞(如疑問代詞)，甚至能起而沒有起代替作用的“他”(如“夜里彈他几操”)，都仍保有代詞原有的語法特点。这个“他”，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說，“从形式上看，也許可以或应該解作‘副宾語’；可是要从它的作用方面看，这个‘他’字旣然無所称代，实在是前面的动詞的一个附屬詞”。②

第四正如乃凡先生所說，旣然代詞是按这种作用独立成为一类的，那么，一切代詞就都应該有代替名詞、形容詞、动詞的三种作用，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比如“这样的”就只能代替形容詞。根据什么理由把代替作用不同的詞放在一起呢？發生这样的疑問是很自然的。

由于这样的原因，許多語言学家对代詞的独立存在产生了怀疑。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К. С. 阿克薩可夫就說过“代詞無論如何不能成为独立的詞类”。③这就是从代詞这一术語的詞源意义出發得出来的不正确的結論，而乃凡先生今天又重复这个論点。

这里有必要提到另一种反对代詞是个詞类的意見，尽管这种意見远不如前一种流行。那就是狹隘的形态学观点。比如俄国語言学家别什可夫斯基說过：俄語的代詞不具有任何物質意义，总的說来，它不屬于任何語法范疇，因为語法范疇是由詞及詞組的形式構成的，而代詞由詞根構成的，因而不合乎詞的形式范疇的概念。所以别什可夫斯基認为俄語代詞不能算作独立的詞类。④ 同样性質的錯誤論点出現在陈承澤的著作里面，他說：“代字本为名字之一种，外国文所以独立为一类而研究之者，以其有‘格’之变化，又有关系代詞等須加特别說明者耳。今吾国旣無关系代詞，而如‘格’之变化等形式上之特征，又为我国文之所無，似不如存其名目，而作为名字中之一細类，眉目較为清朗。”⑤誠然，俄語代詞在詞法方面沒有使它独立成为一类的理由，代詞項下可以按詞法的特点分成所謂名代詞、形代詞、数代詞、副代詞，也就是說代詞的这些細类分别地跟名詞、形容詞、数詞、副詞相当，其中只有名代詞(я, он, кто, кто-нибудь 等)具有不同于名詞的詞法特点。但是正如叶菲莫夫教授所說，代詞在意义、句法、修辞作用上的特征使它和其他詞类截然不同。关于代詞的語法特征(特别是句法特征)和修辞作用的特征，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和 А. Н. Гвоздев 有了詳尽的描述。⑥更重要的，代詞的意义上的特征被公認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代詞之自成一类的基础。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說道：“現代俄語中的代詞性(местоименность)的概念是詞彙和語义学的概念”。⑦由此可見意义对划分代詞的重要性。我們这里較多地說到这点，为的是提請大家注意一个問題：对于富于形态变化的俄語，在划分詞类时都还要照顧到意义(特别是代詞，有意义的特征被提到首要地位)，那末对于沒有形态变化的汉語来說，如果撇开意义不管而孤立地去找語法特征，那也会像全憑意义因而忽略語法特征(在汉語主要是句法特征)一样走不通的。道理很清楚，詞类本来就是詞彙—語法范疇，怎么能够撇开意义呢？苏联学者这种对具体問題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值得我們学習的。

代詞倒底是些什么詞呢？划分代詞的依据是什么呢？苏联科学院的《俄語語法》給代詞下了一个定义：“代詞是这样一些詞，它們指出(указывать на)事物和事物的性質，但并未称呼(называть)事物和事物的性質。代詞只有在上下文里才有具体的意义”。⑧这定义对汉語来說也是适用的。

这个定义揭示了代詞的兩个本質的特征：(1)代詞只指出事物和事物的性質，但不称呼它們。比如“我买了一本書”，“書”是名詞，它称呼了事物；又如“我买了一本有趣的書”，“有趣的”是形容詞，它称呼了事物

---

①② 詳見吕叔湘《汉語語法論文集》183頁。

③ 在这以前，俄國語言学者 Г. 巴斯金首先提出这种見解，而后达陀夫隨和之。見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47年版，319—320頁。

④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1938年版，139—141頁。

⑤ 見《国文法草創》16頁。

⑥ 分别見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326—329 頁和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12—124頁。

⑦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326頁。

⑧ 該書1953年莫斯科版第一册387頁。

的性質。如果这兩句話說成“我买了它”、“我买了一本这样的書”，那末“它”就只是指出事物，“这样的”也只是指出事物的性質。可見代詞的本質的特征之一是在“指出”，而不在它的“代替”。(2)代詞具有極大的概括性和不定性，这跟上一特征是密切相关的。本来語言中的任何东西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和不定性。列宁說过：“語言中只有一般性的东西”。①这里不必細說，以抽象性为特点的語法范疇，就是一个具体的詞，如果它不是專有名詞的話，也总要概括某种东西，甚至專有名詞有时也可用做普通名詞，从而获得概括的意义。但是代詞的詞义有着最大的概括性或抽象性，比如“牛”概括所有的“牛”，但絕不能是“馬”或其他，可是“他”（“它”）就可以概括万事万物，其中包括所有的“牛”和“馬”（除了說話者和听話者不在概括范圍以內）。絕大多数詞，由于多义性的原故，其确切意义只能从上下文看出来，这就是詞义的“不定性”。比如“飯桶”这个詞，是指的盛飯的桶，还是毫無能耐的人物呢？这要由具体的上下文来决定，可是“飯桶”畢竟只能有这兩种意义，也就是說，詞义的不定性的程度决定于这个詞有几个意义。代詞則不然，它的詞义的不定性眞到了無以复加的地步，而这又是由它的最大的概括性或抽象性决定的。列宁說过：“这是誰？是我。所有的人都可以称我”。② K.C.阿克薩可夫也說过：“疑問代詞不可避免地是‘不定’的相等物”。③ 因为“誰来了？”这句的“誰”，可能是百家姓上的任何一个人，也就是“不定”意义的别名。所以苏联学者通常把代詞这种抽象性和不定性形容成为一种“最大限度”的东西。懂得代詞的这兩个本質的特征，我們就不会怀疑代詞的存在，也不至于將任何起代替作用的詞都当作代詞，也就不会如許多語法書把前举的“妹子如今也有几个字兒，請姐姐看看”的“妹子”、“姐姐”跟代詞“我”、“你”相提并論，而忽視它們之間的本質的差別。这里的“妹子”和“姐姐”的确是用来代替“我”和“你”，但絕不能因此被称为代詞；因为代詞不称呼事物，而“妹子”、“姐姐”却已經称呼了事物。根据这个道理，龙果夫認为“你不会写这个字，讓我来”的“来”是代詞④，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动詞“来”在这里完全不是“他来了”的“来”那种意义了，它只指出动作，可是并不称呼动作，具体的动作意义須由上下文来决定。

由此看来，代詞之所以成为独立的詞类，不是由于它的代替作用，而是由于上述的兩个特征。而且正是因为这兩个特征，代詞才具有被人当作重要特征的代替作用。問題非常明显：抽象性或概括性較大的东西能够代替抽象性或概括性較小的东西，反之就不可能代替。比如，我們可以說“我有許多堂兄弟，表姊妹，这些亲戚都常到我家来”，“亲戚”是种概念，“堂兄弟”、“表姊妹”是类概念。“亲戚”在这里起了某种意义的代替作用，我們可以把“亲戚”換成“堂兄弟、表姊妹”。但是我們不能說这样的話：“我有許多亲戚，这些堂兄弟、表姊妹都常到我家里来”。正因为代詞的抽象性或概括性最大，因此它才具有比別的詞大得多的代替作用。

这里附帶提几句，我們說代詞的詞义具有極大的抽象性概括性，但絕不是說它“沒有物質意义”，像別什可夫斯基所說的那样。因为“抽象”或“概括”是以具体的事物为起点的，我們上面說“代詞指出事物”，这就是它的物質意义。我們知道，固然并非一切詞都表示概念（譬如代詞就不表示邏輯意义上的概念），但一切詞都有自己的意义，这是肯定的。如果以为代詞沒有物質意义，就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險。

① 列宁的《哲学笔記》，見《列宁選集》12卷，223頁。

② 列宁的《哲学笔記》，見《列宁選集》12卷，223頁。

③ 《俄語》，329頁。

④ 《现代汉語語法研究》，227頁。

啓事

(1) 本刊从7月号起增設綜合的“書刊評介”以后，很受讀者欢迎。現在我們要求各地出版社和作者在出版有关語文方面的書籍和資料时，能够随时寄贈本刊，以便及时向讀者介紹。

(2) 本刊从10月1日起取消郵資总付的办法，以后来信来稿务請貼足郵票，請讀者注意。

本刊編輯部



談"連"字

黃 誠 一

"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难"(魯迅：社戏)里的"連"字，在語法上是比較不容易处理的一个字。首先是它的詞性不好确定，"除名詞、代詞、形容詞它決不是之外，其余的都有点拉得上。"①呂叔湘先生估計到它有屬于动詞、介詞、連詞、副詞这几种可能。

現在先就馬烽《一架彈花机》中的八个"連"字来分析。

（一）"連"字后是主語的例句：

連秧歌队的演員們，也都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来了。

后来外村的人也来找宋师父彈花；連公家的被服厂都把宋师父請去彈了几个月。

初开始的时候，連我也不信服种棉花能得利。

（二）"連"字后是宾語的例句：

見了人不要說开玩笑，輕易連話也不說了。

这天宋师父整整一天連門也沒出。

連合作社也不讓我來。

要不，如今連一苗棉花也沒有。

（三）"連"字后是謂語中心詞的例句：

怪不得我去了你家几次，你爹連理也不理我。

只有他連看都不看。（叶聖陶：蚕和螞蟻）

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难。（魯迅：社戏）

由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連"字的用法有下列三个特征：

一、"連"字后面可以是主語，是宾語，是謂語中心詞；它們可以是名詞，是代詞，是动詞。这一点跟介詞不一样。

二、"連"字一般都跟"也"或"都"字相应。

三、"連"字句的上文往往含有"不但"的意思，但是不一定明白說出，如（一）的第三例可以添上"不但別人"；有时也难以确指。

旣然"連"字的后面有主語，也有謂語，而且有的名詞很难說它是主語还是宾語，如"姑姑病了，你怎么連影兒也不見？"（冰心：姑姑）因此不能說"連"字的作用是"特介提宾"。②

更有一点足以說明"連"字不是介詞：因为介詞跟它所介的詞一般結合的都很緊密，合成一个意义單位，不能隨便抽掉；而用"連"字的地方，不用也是可以的，例如：

他老婆过去識字不多，信都不会写（康濯：最高兴的时候）

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魏巍：誰是最可爱的人）

慢說拉手，他的东西，我們略动一动也不敢。（紅樓夢，56）

在这一点上它倒有点像連詞，因为"連詞抽掉之后，那句話还是可以說"。③

"連"字后面的語意和上文的語意之間有由淺到深、由輕到重的分別，这类句子的結構一般上文都带"不但"或"別說"之类；例如：

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爷也不必管他。（儒林外史，25）

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紅樓夢，118）

別說尸首，連一点血也沒看見。（管桦：雨来沒有死）

別說是日本鬼子，連村里的老百姓也摸不清；那两个帶道的倒知道，可是他們笑而不說。（周而复：燕宿崖）

相反的句子是由深到淺，由重到輕。这类句子的結構一般下文都带"何况"或"別說"之类；例如：

連王人尙另眼相待，何况別人。（紅樓夢，74）

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紅樓夢，21）

从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連"字的联結作用，不过它跟"与类連詞"不一样，所联結的并不是等立的兩項。要决定"連"字的詞性，还得看看經常和"別說"、"不但"之类相应的另外有哪些詞：

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水滸，8）

休道是兩个丫环，就是說話的見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水滸，31）

休道連叫三声，便叫三万声，亦有何难？（三国演义，105）

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凈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凈。（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从上列例句中看出同它們相应的是"便"和"就是"。它們不是动詞，也不是介詞；此外只剩下連詞和副詞了。現代汉語中有些不能單独使用而須前后呼应的副詞叫做关联副詞，如"越…越…""一…就……"。"別說…連…"和"連…何况…"的性質同它們非常接近，因此归做一类似乎比較妥当。

---

① 呂叔湘：《汉語語法論文集》，123頁。

② 黎錦熙：《新著国語文法》，38頁；又黎錦熙、刘世儒：《中国語法教材》第6册，885—887頁。

③ 呂叔湘、孙德宣：《助詞說略》，見《中国語文》1956年6月号，35頁。

上古汉語里的双音詞問題

亞努士·赫迈莱夫斯基

在六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想着重地指出我認为是汉語結構的發展的最基本的一些特点，后来我又在旁的文章里，特别是在新近用漢文發表的一篇文章里(«中国語文»1954年12月号)談到同样的題目。在这些文章里提出的关于汉語結構的演进的理論，主要地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观点：在上古汉語（周代的汉語)里我們所要討論的是詞的單音节性，而在現代汉語里我們所要討論的只是詞素(“义素”和“形素”)的單音节性。我覺得語言学家要想研究汉語結構的历史發展，主要任务就在于發揮上述观点里所包括的一切涵义。有些汉語学者，对上古汉語和現代汉語不加任何明确的区别：或者是假定古汉語和現代汉語都是严格的單音节的，不然就是說双音詞在汉語里是一向存在的，結果都是古汉語和現代汉語在这方面幷無区别。不消說，后一种見解比起前一种来要科学得多，进步得多；可是必須着重地指出，这兩种見解都把上古汉語的結構体系和現代汉語的結構体系二者間的基本差别抹掉了。这个問題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我打算在这兒作比較詳細的討論。当然，我完全知道一个無可否認的事实，就是上古汉語里也存在着双音詞，但是我覺得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不应該加以夸大，这个事实并不能取消上古汉語里詞的單音节性的原則；因此，分歧点不在事实本身——这是無可否認的，我已經說过——而在按照上古汉語的語言体系的框架怎样来解釋这个事实。

按照高名凱教授的办法(«汉語語法論»，34頁起)，汉語双音詞或复音詞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純粹的复音詞，就是由一些單音节組成的詞，这些單音节自身沒有任何意义，(例如“娃娃，措大，不倢…”之类)；(二)組合的复音詞，由几个各有独立意义的單音詞所組成的詞；(三)借自外国語言的多音詞(音譯詞)。事实上，上面的分类主要地是对待現代汉語的，但是因为高名凱教授在这方面对上古汉語和現代汉語沒有作明确的区别，而且引用了屬于汉語的不同时期的例子，这表示他認为他的分类同样地也适用于上古汉語；的确，在該書的第38頁上明白地說道，“古代的語言中也有同样的情形”。

在討論高名凱教授提出的三类复音詞之前，我想先談一談跟古汉語里双音詞問題密切关联的一个問題，那就是單个兒的汉字代表着双音节的語言單位(詞)这个問題。高名凱教授似乎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清初的著名学者顧炎武的过于夸張的观点。他援引顧炎武的話：“在語为双声叠韵，在字切为一字者，实恒見之事”。还引用了顧炎武的几个例子：丁宁>鉦，僻倪>陴…等等(見上引書38頁)。在另一处(32頁)也談到这个問題，說是“有的时候一个字却有兩个音綴的音”，并引証了«淮南子»里的兩个字的詞語，按照高誘的注应該念作三个音节。另外还提到殷代甲骨文里有些显然是双音节的数字却是用單个兒的字写的：𦉭(三百)，𠦃(二千)。

在我看来，甲骨文里常見的十进位数字書写的原始方法，决不能用来支持顧炎武根据少数不可靠的例子而得出的牽强附会的理論“單字代表双音詞”。讓我們以“丁宁>鉦”为例，按照顧炎武的意見，“鉦”这个字等于口头的双音詞“丁宁”，用一个字代表了口語里的双音。这个公式的主要根据是：«左傳»宣公四年有“著于丁宁”一語，而第三世紀的注疏者杜預的注是“丁宁，鉦也”。首先必須指出：跟顧炎武的假設相反，杜預的注的最自然的解釋是：“丁宁，鉦也”，只是說这兩个詞是同义語，——这当然不一定指二者在語源上有任何关联。时代在杜預之前的偉大的詞典学者許愼在他的«說文解字»里对“鉦”的解釋不是“丁宁”，而是一个同样單音节的詞“鐃”。更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單音的“鉦”見于比«左傳»和杜預的注要早得多的时期，它出現在«詩經»里面第178首，“鉦人伐鼓”，整首詩是四字句，这样一来，“鉦”作为一个詞是單音节的音值，也就無可怀疑了。高名凱教授所引的«淮南子»里兩个字的詞，按高誘注是一个三音节的詞的例子，这兒也沒有討論的必要，因为关于这个問題的主要文献屬于上古汉語以后的时期(前汉的中叶)，对于周代的汉語来說是沒有直接意义的。却不妨順便說一句：这个例子多半是用一个新的三音节的詞重新来替代从前的双音节的詞，而不是兩个字的書写形式代表着一个三音节的口語形式。的确，除了前面所說的甲骨文里的一些复合数字是唯一的例外，我就不知道古汉語的文献里有一个字代表一个双音詞的任何例証。

現在讓我們回到高名凱教授的复音詞的三分法。我願意对他的第三类(外国語借詞)先說几句話，在这上面我完全贊同他的意見。大家都会同意，外国語借詞在汉語里的双音(多音)的轉写，畢竟只能說是外来的借詞，而不是汉語，所以在討論古汉語的語言結構应

該将它們除外，——尤其是因为在古代文献里絕少这样的双音节例子。如一般所知道的，汉語里双音（多音）借詞只出現在較晚的时期，尤其跟佛教的傳布有密切联系，它們在中古和現代汉語里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高名凱教授的第二类，"組合的复音詞"，照我的意見，討論上古汉語——不是中古和現代汉語——的双音詞問題的时候应該把它除外，因为在上古汉語里这些組合照例不是双音詞，而是詞組，就是兩个單音詞所構成的詞語組合，甚至于还沒有定形，虽然有些个早已收在詞典里了。必須再一次强調地指出，区別古汉語和現代汉語的結構体系是極端重要的。"复合詞"这个术語，平常籠統地用来指称上古汉語里由單音詞構成的双音的句法組合，而另一方面又用来指称現代汉語里兩个單音的詞素（形素或义素）所構成的形态組合，这样就很容易引起誤会。这个含糊的术語对于討論汉語双音詞問題常常發生的混乱現象也要負很大的責任。为了这个理由，还是把这个术語放弃了的好。就我而論，关于所謂"复合詞"的問題，这些年来我总是采用兩个不同的术語：在談到古汉語的組合时用"句法上的詞組"，談到現代汉語的組合时用"双詞素的詞"。

現在来談高名凱教授的第一类，"純粹的复音詞"。我覺得我們的問題实际上就集中在这一类型的上古汉語的詞上面，虽然高名凱教授自己認为这一类型是不值得着重討論的。这一大类的內部应該再分为几个小类，我覺得至少可以区分为三小类：一，广义地所謂拟声組合，重叠、双声、叠韵，——这一小类数量最大；二，原来的單音节經过分裂或分化而产生的双音組合；三，不屬于上述兩小类的双音組合，底下分別討論。

談到第一小类的时候，必須注意，这里所謂"拟声詞"（onomatopœic formations）的涵义比較特殊，也比較寬泛。不仅包括严格意义的拟声詞，也包括中国注疏家和字典学家用"某某貌"来解釋的那些双音詞。純粹的拟声詞許多語言里都有。在印欧語里，語言学家一般都認为拟声詞跟語言的結構沒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拟声詞的形式跟它所表示的事物或現象之間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而語言結構却只牽涉一个詞的声韵、形态和句法各方面，它跟这些詞所表示的意义并沒有自然的联系。那么，像拟声詞这样的語言材料旣然跟分析語言的結構体系的主要方面無关，我們就可以不去管它。这种观点也适用于汉語。我們在这篇报告里就不去討論这类詞。我們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这类詞对于汉語今后的發展中是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的（印度尼西亚各种語言的情形就不一样，"拟声詞"一直到現在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語言学（無論是描写語言学、历史語言学或比較語言学）的观点来看，最有趣的是第二小类。这一小类双音詞是从带复輔音声母的單音詞經过一种很奇怪的"音节分化"的过程構成的。早在十一世紀中叶，宋朝的学者宋祁曾經解釋过"窟籠"这个双音詞的来源（异体：窟䆍，窟窿。后者是現代通行体）——这个詞在当时無疑是通用的，在現代汉語里也是一个常用詞。宋祁認为"窟籠"是"孔"字的反切，他說"孔曰窟籠，語本反切。"說到汉語里"音节分化構詞法"以及这种構詞法跟反切的極端相似，宋祁关于"窟籠"的解釋恐怕是最早的直接材料了。大家都知道，反切方法是中国語言学家在公元一世紀發明的，从那个时候起，各种字彙和字典里就普遍采用这种方法。如果用反切通常所指的意义来理解宋祁的話，那么 k'u-lung 只能解釋成 k'[u+l]ung＝k'ung。这就是說，"窟籠"这个双音詞可能是"孔"字的反切的讀法。不过由于一种奇怪的变化，"窟籠"把"孔"从語言里排斥掉了。从理論上說，这种解釋有可能是对的。不过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釋，这种解釋将要引导我們到一个重要的問題上去，这就是大家叫做"音节分化"的这个現象。大家都知道，上古汉語里的單音詞，有許多是帶复輔音声母的。其中最普通的是"塞音＋边音"这个类型（当然还有別种类型的）。关于这一点，我們有足够的証据，內証和旁証都有。所謂內証是指諧声字系統，旁証則指跟別种語言的比較研究。已經有人指出，上古的复輔音一直到东汉的最后几十年还保存着。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所有的复輔音在所謂中古汉語（隋代約公元600年）之前已經失去了。这就是說，复輔音声母簡化为單輔音声母的过程是在公元200年到公元600年这一段时間之內完成的。最大的可能是在东汉灭亡不久之后完成的。这个过程的开始可能要上推到上古汉語的末期。有許多理由使我們相信，單音詞的音节分化在某些場合之下是由复輔音声母的簡化所引起的。單音詞的音节分化是通过下面这样一个过程进行的。先在复輔音的兩个成分之間插入一个中間成分——这个中間成分一定是以元音开头的，可是不一定只限于一个元音，分化过程結束的时候，原来的那个音节就分离成兩个音节。我們同样有理由相信，复輔音声母的开始簡化跟音节的分化（二者是緊密地关联着的）具有方言的性質。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証明：最早的一些音节分化的例子（这是复輔音声母簡化过程已經开始的最明确的标識），古代的学者都把它們当作方言現象。例如"不律"見于紀元前三世紀《尔雅》的"釋器"，又見于許愼的《說文》。許愼認为这个詞是吳方言里的詞。但是《尔雅》注的作者郭璞（276—324）認为是蜀方言的，他說，"笔，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語之变轉。"許愼和郭璞把"不律"归到地理上距离極远的兩个方言里去，这种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詞的方言性質，在这

一点上，兩种說法是一致的。如果我們利用高本汉構拟的上古音，同时把問題簡化一下，那么"笔"和"不律"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說明：汉朝以前有一个單音詞"笔"*pliət，里头有一个复輔音pl，稍后，这个复輔音在某些方言里有簡化的傾向，最后到底分化成一个双音的形式——不律 pwət-(b)li̯wət。当一个音节里不允許有复輔音存在的时候，音节分化是把这个复輔音的兩个輔音都保存下来的唯一方法。不过音节分化只是有时候才采用的，有的时候，在口語里只是把复輔音簡化成为一个單輔音。上引《說文》提到，在燕方言里跟"不律"相当的是"弗"pi̯wət，这里根本沒有复輔音。

音节分化的現象是非常有趣味的，可惜我不能在这里提出許多細节来討論。無論如何，根据以上所說，我們有理由把宋祁的"孔曰窟籠，語本反切"兩句話这样来理解，就是它証实了"窟籠"是"孔"的分化。如果眞是这样，那末"孔"字原来应該有一个复輔音声母。虽然我們必須指出，这个說法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我們所根据的材料太晚了，对于上古汉語来說，沒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們还可以举出一些無疑屬于上古汉語里的材料。譬如"痀僂"这个双音詞，是"駝背"的意思，見于《庄子》（十九章），又見于《列子》（二章），"痀僂"*ki̯u-(g)li̯u 这个双音詞是由單音詞"僂"*gli̯u 分化出来的双音节形式。"僂"也見于《庄子》（三十二章），又見于《左傳》昭公七年。有趣的是这个字在兩本書里都出現于关于正考父的一首詩里（兩首詩的文字略有差异），《左傳》上特別說明这是鼎上的銘文。因此，这就証明了單音詞"僂"是比較古的，而《庄子》和《列子》上的"痀僂"則是派生的、音节分化的形式。应該說明，虽然音节分化的現象，从語言学的观点看来是很有趣味的，但是在研究上古汉語的时候，这一类例子在数量上显然是太少一点。因此，只能当作例外的現象来处理，并不足以动搖上古汉語是單音节的这一原則。此外，正如上文所說的，音节分化是跟复輔音的簡化分不开的，而复輔音的簡化过程的开始只能是在上古汉語的末期，它的完成則在东汉灭亡之后，因此音节分化現象之大量出現必然是在上古汉語时期之后發生的。这里我們順便談一談另外一件事。由于音节分化現象跟反切方法極端相似，那么反切方法很可能是受到語言里由于音节分化而出現的双音詞的影响而产生的。关于这点，我們只举出一件事就够了。《汉書，地理志》里应劭的兩条反切（这是公認为最早的反切），还有汉代以后反切方法的發展之快，这兩件事都發生在复輔音剧烈簡化、音节分化現象大量出現的时期。当然，这和本文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的关系是不大的。

最后，簡單談一下我所謂"純粹双音詞"的第三类，这就是不能直接归屬到以上兩类的那些双音詞。当然，这样的詞在上古汉語里是有的，它們大部分是兽类、昆虫和植物的名称。我覺得这样的双音詞往往是原始的詞組（由兩个單音詞構成的）。不过在上古汉語时期，它們已經單詞化了，或者說形态化了，以至于我們看不出它們是詞組。讓我从王力教授的《中国語法理論》上册里举一个例子来說明我的意思。我在这本書第十三頁上找到一个屬于第三类的双音詞"蝴蝶"。据我所知，上古的文献里沒有把"蝶"字当做独立的詞用的。"蝴蝶"这个双音形式則見于《庄子》。用不着說，这在上古汉語里是一个双音詞，而且我們沒有法子証明这个双音詞是由詞組形态化以后形成的。但是，是不是我們連維持这个假設的間接的理由也找不到呢？我想是有的。首先，在許多語言里，不仅是汉語，草木虫魚的名称是用拐彎法(periphrastical method)来表現的，这就是說，这种名称往往是由兩个詞組成，这兩个詞都是用某种方式来描述这事物的。上古汉語特別是如此，第一，上古汉語是單音节語，其次，上古汉語里的形态（構詞法）是很有限的，因此为了滿足創造动植物名詞的需要，主要的方法就是用拐彎法来創造一些詞組，这些詞組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單詞化或形态化的傾向。拿"蝴蝶"来說，"蝴"与"胡"同，"虫"是后加的。用不着說，"胡"这个單音詞完全可以用来描写我們所要說的东西。單音詞"蝶"虽然不見于上古文献，但是它一定也曾經独立过。那么"蝴蝶"这个詞，从語源学的观点来看，可以用"野(蝴)蝶"一类的意思来解釋。如果我們把距离上古汉語时期不远的著作里的一些类似的名称拿来比較一下的話，对于动植物的名称的創造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知識。譬如在崔豹的《古今注》（公元四世紀）里，有"野蛾"这样一个双音形式。这个詞的来源之为詞組是無疑的，因为它的成分在上古汉語里都是單詞。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几十个来。我們沒有什么坚强的理由来反对下面这个假設：即上古汉語里有許多双音形式都是由單音詞組成的。虽然对于某个具体的格式来說，我們可能还找不到直接的証据。

正如我想在这篇論文里所要指出的那样，在研究上古汉語的双音詞的时候主要的問題是一些音节分化的構詞法和一些語源不明的双音詞。前者数量很少，后一类很多。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我們將承認这种詞是由詞組变来的。这兩类詞的存在都不能推翻上古汉語体系里的詞是單音节的这一个理論。因此，我以为这是正确地解答汉語結構的主要發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詞类的区分和辨認(續)

傅 子 东

四 “結構”的汉語詞类区別标准的批判

文煉和胡附主張以詞的結構来区分詞类，說“詞类是結構中的詞类，离开結構，自然就难找到妥当的分类标准了。”(《汉語的詞类問題》,77 頁)他們的論据和例証，依次地来分析。

他們說：“英語：glory, glorious, gloriously 这三个詞代表的是同一概念“光荣”，可是有三种不同的样子，区別在詞尾上：第一个是名詞，第二个是形容詞，第三个是副詞。”同一的概念光荣的說法是不够正确的，我們說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一指抽象的事物，是名詞，二指事物的性态，是形容詞，三指动作的狀态，是副詞，語尾变化“ously”只是对事物的性質、动作的狀态这兩个含义的标志。在汉語沒有語尾变化来标明詞的性質，但詞的性質是存在于表示客观实在的詞本身之內。“中国的光荣，光荣的队員，光荣地生，中国之光荣，光荣之队員，光荣而生”，在口語有的作形容詞詞尾，但文言沒有，“之”和“中国的光荣”的“的”都是接續助詞。光荣这个形体上就文言說附着三个不同的概念、意义或性質的詞，名詞、形容詞、副詞，他們各別地表示不同的客观实在。光荣作为一种抽象的事物反映在人們头腦中时，人們才会說出中国的光荣或中国之光荣，作为事物的一种性質反映在人們头腦中时，人們才会說出光荣之队員，作为动作的一种狀态反映在人們头腦中时，人們才会說出光荣地生或光荣而生。的和地在我們的字典上还沒有和光荣結合在一起，或光荣为詞根，的和地为詞尾；在語言的实际現象中并非附加了的和地光荣才成为形容詞和副詞，这从“光荣之队員”和“光荣而生”可以得到証明的。光荣在进入詞群以前具备了三种不同的性質，的和地只有对光荣的形容詞和副詞的性質加以确認的作用，光荣不因附加的和地才是各具有一定性質的客观的实在。汉語的光荣是附著在同一形体上的三个不同性質的詞，实际等于英語的 glory, glorious, gloriously；它們都表示三个不同的概念或意义。

他們說：“同是一个‘人’字，‘人其人’的第二个人叫做名詞，第一个人叫做动詞，‘豕人立而啼’的人叫做副詞。……同是一个云字，‘江东日暮云’的云叫做名詞，‘香霧云鬟湿’的云叫做形容詞，‘天下云集响应’的云叫做副詞。这样不是要走上詞無定类的結論嗎？”但人或云都是名詞，如果認为人除名詞外还有动詞和副詞的性質，云除名詞外还有形容詞和副詞的性質，这是常識所否定的。“人其人”的第一个人的述位这个位次形态給予(儒家之)人以“使……变成的意义”，即使那些(佛家之)人变成(儒家之)人，“豕人立而啼”的人的这个位次形态給予人以介詞如的意义，即豕如人立而啼，兩个人的原来的名詞的意义仍保留着(參看《中国語文》37期,24頁;《語法理論》,37,121頁)。“香霧云鬟湿”的云指朵云.云的偏位这个位次形态給予云以介詞如的意义，即香霧使如云之鬟湿，“天下云集响应”的云指烏云，云的从位这个位次形态給予云以介詞如的意义，即天下[之起义灭秦者]其集如云，其应如响。兩个云的原来的名詞意义仍然保留着(參看同上書)。詞有它的独立存在，它的意义是从它的独立存在产生出来的，絕对不能把句子里它的位次形态給予它的意义認作是詞本身的意义，并从这个意义判定它的詞性；如文煉和胡附的解釋，人是动詞、副詞，云是形容詞、副詞，那么人和云的独立的存在就被取消了。

他們引述加尔基那·非多盧克的話：“人类的思惟把人类所認識的現象加以抽象化，加以綜合，加以归类。同是一个事物，从实体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东西.从其动作的角度来看，就是动作，从其具有的性質来看，就是一种特性。再把各不同現象的实体綜合起来，就有实体的概念，也就有了名詞；把各不同現象的动作綜合起来，就有动作的概念，也就有了动詞；把各不同現象的特性綜合起来.就有性質的概念，也就有了形容詞。”然后說道：“从这段話里我們可以理解：同一事物，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也就有不同的結論。动作完成便成狀态，一种动作沒有实际出現只有一种可能实現的事情，那么也就成为一种性質，动作和狀态不是漠不相关的兩回事。这就說明了不在形态上着眼，尽管在意义上兜圈子，問題是难以解决的。”

作为独立于我們意識外的客观的实在，詞是具有独立的性質的，它的独立的性質是从它表示一定的客观現象来的，不是从語言学家所具有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来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是主观的，一定的客观現象是独立于主观的看法之外而存在的。如果主观的看法要把各不同現象的实体綜合起来，把这些表示实体概念的詞叫做名詞，这个名詞的性質便不是独立于主观的看法之外的客观的实在所产生的，而是主观的看法所

給予的；如果主观的看法要把各不同現象的动作綜合起来，把这些表示动作概念的詞叫做动詞，这个动詞的性質便不是独立于主观的看法之外的客观的实在所产生的，而是主观的看法所給予的；如果主观的看法要把各不同現象的特性綜合起来，把这些表示特性概念的詞叫做形容詞，这个形容詞的性質便不是独立于主观的看法之外的客观的实在所产生的，而是主观的看法所給予的。劳动創造世界，大家劳动，劳动的人民要支配全世界的，这三个劳动形体同，而性質不同，各反映一个不同的客观实在；它們是三个不同的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而可以从語法学家的不同角度的观察成为名詞、动詞、形容詞的，它們的不同的性質存在于語法学家用不同的角度观察之前，正如地球存在于人类誕生之前似的。它具有实体的性質，是能执行創造这个动作的，語法学家才能把它归类为名詞，它具有动作的性質，是能表示实体的一种特定的活动如劳动的，語法学家才能把它归类为动詞，它具有狀态的性質，是能修飾或限制实体如人民的，語法学家才能把它归类为形容詞。不同角度的看法所以能出現的基础是語法学家主观的意識或看法之外存在着的各个不同性質的客观的实在，各个不同性質的客观的实在引起了語法学家不同角度的看法，語法学家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是各个不同性質的客观的实在所決定的。实体的概念，动作的概念，性質的概念，是表現为实体的客观实在的反映，表現为动作的客观实在的反映，表現为性質的客观实在的反映，語法学家对它們的归类、綜合或抽象化不过是客观实在的系統的复写。我們可以理解：不同的結論，即名詞、动詞、形容詞是根据語法学家用不同的角度所观察的同一的事物而出現的，是主观唯心論的；名詞、动詞、形容詞是客观地存在的語言現象，是語法学家主观的意識所不能支配的。

"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中"于陈涉"和"于刘氏"省去，只剩下"兵破，地夺"就成了一种表态句，破是兵的狀态，夺是地的狀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卷，92頁）；这就是"动作完成便变成狀态"說所依据理由。士可杀，不可辱，这匹馬騎得，这种鞋穿得，（同上書）这就是"一种动作沒有实际出現只是一种可能实現的事情，那末也就成为一种性質"說所依据的理由。破、夺、杀、辱、騎、穿作为独立的存在，在句子外是有他們的性質的，它們都是指事物的动作，不是指事物的狀态；这是常識所肯定的。以为动作和狀态不是渺不相关，事实上是"息息相通"，而以兵破、地夺的破和夺，可杀和不可辱，騎得和穿得来說明，是把独立于詞群外的詞和进入于詞群中詞，兩种不同的語言現象混淆一起；作为独立的存在，指事物动作的詞和指事物狀态的詞，不但是"渺不相关"而且是"息息不通"的。"士，君可杀，不可辱"，"这匹馬，我騎得，这种鞋我穿得"，杀和辱，騎和穿都是沒有实际出現而只是可能实現的动作，可是它們都是扮演述詞的指事物动作的詞，都沒有成为一种表事物性質的形容詞。假使上述的句子中破和夺，杀和辱，騎和穿已成为表狀态或性質的形容詞，它們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在一間着火的烟霧騰騰的屋子中，屋外的人喊屋里的人"跑出"（如同說快快地出）；在操場上打球的，因缺一个球員喊靠近操場的一間屋里坐着的人"跑出"，第一个跑是以述性副詞的性質出現的，第二个跑是以扮演述詞的动詞的性質出現的（第一个出是述詞，第二个出是空間副詞）。（《中国語文》37期，24—25頁）凡可以在述位的詞（如动詞等）都能在詞群或句子中憑借一定的位次形态轉变为述性詞，即述性名詞、述性形容詞、述性副詞，这一定的詞序或位次形态像印欧語系語言的散动詞語尾或屈折形式一样对于述性詞給予他們以存在的基础（参看《語法理論》，127頁）。破和夺，杀和辱，騎和穿，它們本来都是动詞，它們的形容詞（假定的）性質是句子（在一定的对話环境中說出的一个句子）中一定的位次形态所給予的。作为独立的存在，即在詞典里出現的存在它們都是动詞，作为句子里一定位次形态給予的存在，它們才是形容詞；它們不是兼有叙事和表态的兩种作用的（参看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96頁），它們的叙事作用从它們的动詞性質产生的，它們的表态作用从它們的形容詞性質产生的。从不同的性質它們才表現出不同的作用的。它們在詞典里是一个客观的实在，在句子里是另一个客观的实在，不过句子里的客观实在是从詞典里的客观实在轉变成的。"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現），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声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庄子，讓王》），从縕袍至踵決可以認为等于表态的形容詞，穷困（正冠，捉衿，納履是附加詞），从曳縰至得友可以認为等于表态的形容詞，高傲（曳縰和若出金石是附加詞）；它們都是所謂形述短語或形述子句或句子形式作謂語的，主語曾子承前省略。但是人物的形象絕对地可以用它所表示的动作刻画出来的，所謂形述短語中的动詞如举火、制衣，歌商頌，自然恢复述詞的身份，不是表态的形容詞扮演了所謂描写句中的謂語；兵破地夺的破和夺已轉成了表态的形容詞，是可以商権的（杜甫詩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破是动詞孳生的形容詞，修飾衣），騎得和穿得不一定是表态的短語，士可杀，不可辱显然如举火、制衣、歌商頌一样不是形容語扮演的所謂描写句中的謂語，而是动詞附加助动詞"可"和否定副詞"不"扮演的述詞。

从这兩段話看来，文煉和胡附，揭露据意义区别詞

类的困难要以形态来解决詞的分类問題，这个主張，是不易成立的。他們进一步的論据是："單詞形态变化不多的汉語，却必須从結構上来区分，从詞和詞的相互关系，詞和詞的結合上来区分，即是說从形态学上来区分。……不以孤立的詞作分类对象，而以結構为对象，不从意义上着眼而从形态上着眼，这样分出来的詞类，才可以說明語言的組織，暗示詞的用法，因为研究詞的分类就是为了研究語言的組織，为了把文法体系化，为了找出語言組織跟詞类的經常而确切的联系来。"（«汉語的詞类問題»，67—68頁）

从構詞法說来，在古代汉語，副詞大都重叠；但是"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庄子，田子方»），[文王之德]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詩經，大明»），第一个赫赫是形容詞，第二个是名詞，第三个是副詞，詞的重叠显然不能作为标記副詞的形态。在現代汉語，他們举的例子活——活兒，胖——胖子，看——看头（同上書，68頁），都是不可否認的名詞标記或名詞的形态变化，可是如他們所指明，这类單詞的形态太少，对汉語詞类的区分是不能有多大幫助的：这是事实。他們因而斷言道：辨别詞性須求助于广义的形态，即詞与詞的結合，詞类是結構中的类，离开了結構，自然难找到妥当的分类标准（同上書，69、77頁）。这是不够正确的。現在先分析他們的广义形态。

"一个人，兩塊墨，这个人，那塊墨，这种道德，那种思想，一次战爭……"这些詞和一个……一次相結合，当然可以列入同一語法范疇，确定它們屬于同一詞类。假定說，叫这个詞类做名詞，前面加的一个、这种等等便是名詞的形态。这就是从詞和詞的相互关系，詞和詞的結合上去区分詞类（同上書，69 頁）。前面可以和不、会、能、敢、該等等相結合，后面可以和了、着、过、起来、下去等等相結合，及其他，例如：不笑、会跳、能跑、敢說、該唱、笑了、說着、跑过来、跳下去。假定說，叫这个詞类做动詞，前面加的不、能等等，后面加的了、着等等，便是动詞的形态；憑着这种形态，就可以認淸笑、跑、跳等等都是动詞（同上書，70頁）。前面可以和眞、十分、非常、很結合，后面可以和極了、得很結合，及其他，例如：眞快、十分快、非常快、很快、快極了、快得很、快快的；眞光荣、十分光荣、非常光荣、很光荣、光荣極了、光荣得很。假定說，叫这个詞类做形容詞，前面加的眞、十分、等等后面加的極了、得很等等，便是形容詞的形态；憑着这种形态，就可以認淸楚，光荣及其他都是形容詞。試問：为什么墨前不能加上会或很，墨后也不能加上过或得很，笑前不能加上兩塊，笑后不能加上極了（可笑極了，是一个形容詞，不能拆开），光荣前不能加上那塊，光荣后不能加上过来？以前加什么，后加什么来区别詞类的只能看見詞的性質所表現出的作用，对这个質問自然是答不出来的。墨指一种塊形的事物，事物可以数数計的；兩塊自能加在它的前面。墨所指的是一种塊形的事物，这是墨这个詞的本質：这个本質决定了它之前不能加会或很，例子中的会表事物动作的势态，指事物动作的势态的詞是不能同指事物本身的詞結合的，例子中的很表事物性質的程度，指事物性質的程度的詞是不能同指事物本身的詞結合的；这个本質决定了它之后不能加过或得很，例子中的过表事物动作的某种过程，指事物动作的某种过程的詞是不能同指事物本身的詞結合的，例子中的"得很"的很同前，得是接續助詞，联接表性态（或动作）的詞和对这个詞加以数量或程度的限制的詞，它們是不能同指事物本身的詞結合的。笑指事物的一种动作，动作本身含有动作的势态或过程，指动作势态的助动詞会自能加在它之前，指动作过程的助动詞过自能加在它之后，笑所指的是事物的一种动作，这是笑这个詞的本質：这个本質决定了它之前不能加兩塊，例子中的兩塊表事物的数量和形狀，指事物数量的形狀的詞是不能同指事物动作的詞結合的；这个本質决定了它之后不能加極了，例子中的極了（極了是一个詞，了是詞尾）表事物性态的程度，指事物性态的程度的詞是不能同指事物的某种动作的詞如笑結合的（很可以同若干別的动詞結合）。光荣指事物的一种性态，性态本身含有性态的程度，指性态程度的詞如非常自能加在它之前，指性态程度的詞如極了只能加在它之后。光荣所指的是事物的一种性态，这是光荣这个詞的本質：这个本質决定了它之前不能加那塊，例子中的"那塊"的那是对事物加以指示的，塊指事物的形狀，对事物加以指示的和指事物形狀的詞都是不能同指事物性态的詞結合的；这个本質决定了它之后不能加过来，例子中的"过来"表事物动作的某某种过程，指事物动作的某某种过程的詞是不能同指事物性态的詞結合的。

無产阶級不是在进入資本主义中制造出剩余价值，才可以辯别它是無产阶級的，作为独立的存在，無产阶級本身具有特殊的不同于資产阶級的性質，即具有一定的必須出售的劳动力，然后才能在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和資产阶級結合，資产阶級表現为剝削者，它表現为被剝削者。同样地，作为独立的存在，詞的本身各具有特殊的性質，然后才能同別的詞結合一起：如"兩塊墨"，兩塊表現为限制特定事物墨的数量者，墨表現为被限制者，如"会笑"，会表現为以特定的动作势态附屬于动作笑者，笑表現为被附屬者，如"非常光荣"，非常表現为說明特定性态的程度者，光荣表現为被說明者。毫無疑义，詞与詞的結合是詞本身的功用的表現，以詞的功用来区別詞类是否定詞的独立的存在。这个分类法和以进入句子中的功用即句子成分来区别

詞性的方法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它是唯心論的或屬于語法領域的功用論（参看《語法理論》，119頁）。

但是文煉和胡附說：“黎錦熙先生不承認孤立的詞有分类的可能’，这是很对的。但是說：‘凡詞，依句辨品，离句無品’，就不妥当了。……‘一个人’，‘三个苹果’，‘好得很’，‘笑着’，这些都不是句子，但我們卻可以从詞和詞的結合上来区分它們的詞性。再說，如果真是‘离句無品’的話，談詞类也只好举整个句子了，可是《新著国語文法》（黎錦熙）在形容詞的类目下是举‘一座長桥，那个溫和的太陽’作为例子的。既是离句無品，又何从知道桥、太陽是名詞，一座、長、那个、溫和的是形容詞呢？”（《汉語的詞类問題》，74頁）这段話証明句子中的詞同“詞和詞結合”中的詞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我們不否認是存在的，但不是本質的，而是現象的，詞在不同的詞群中显示出不同的現象，如“一个人”“笑着”“一个人笑着”，“三个苹果”“好得很”“三个苹果[都]好得很”，詞群的范圍显然大小不同，人和苹果所表現的功用也不同。人作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或具体的东西，是可数計的，也是能执行动作的，这是人这个詞的本質，由于这样的本質或性質“一个”和“笑着”（着是附屬于笑的）才能同它結合一道；苹果作为具体的东西，是可以数計的，也是有种种性質的，由于这样的本質或性質，“三个”和“好得很”（很是附加到好的，得是附屬于它們兩者的）才能同它結合一道，及其他等等。詞从它的本質在不同的詞群中表現出不同的功用，人能同“一个”結合，又能同“笑着”結合，苹果能同“三个”結合，又能同“好得很”結合，就是明証。詞群，不問是句子或詞与詞的組合，其中的詞虽显示出不同的功用或現象，它的本質是一致的，沒有区別的。主張从詞的結構来区分詞类的，与主張詞类的区别仅存于句子中的完全一致，都是否定詞的独立存在，从詞的功用来区分詞类，無疑地同是用唯心論的思想方法去理解詞的性質的（参看《語法理論》，23頁）。

从詞的結構来区分詞类是把詞的功用認为是第一性的，把詞的功用所以表現出的詞的性質認为是第二性的，是沒有透过詞的現象去發現詞的本質的。固然研究詞类，是为了研究詞的用法，或語言的組織，是为了找出語言組織跟詞类經常而确切的联系，但是显然不是說从詞的結構来分类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正相反，詞的結構实質上既然就是詞的用法或語言的組織，从詞的結構来分类既然就是从詞的用法或語言（即詞）的組織来分类，根据这样划分出的詞类，要找出語言組織跟詞类經常而确切的关系，当然不可能的。詞的性質才显示我們語言組織跟詞类經常而确切的关系。事物一般是名詞的性質，每个事物是能执行动作的，指事物的名詞所以扮演主詞，动作一般是动詞的性質，每个动作是事物所执行的，指事物动作的动詞所以扮演述詞，及其他等等；通过詞类这样的性質或本質的研究或从詞的意义来分类，我們才能找出語言組織跟詞类經常而确切的关系。

他們用具体的例子进一步論証結構分类說。他們引呂叔湘朱德熙提出的四个詞腐爛、亲热、清醒、麻木，以为后者对这四个詞是形容詞或不及物动詞难以决定的說法是不正确的，这四个詞从形态或結構是能認識出它們的詞类的（《汉語的詞类問題》72頁）。“那塊肉在腐爛着”，“那塊肉腐爛了”，腐爛能和着或了結合，是动詞；不能和很、眞、十分、極了等等結合，就不是形容詞，同腐化和腐敗不是同一詞性的。但腐爛（除开名詞的性質，如一种腐爛外）是兼性詞，即形容詞和动詞；“腐爛的肉，腐敗的肉，腐敗的东西”，这証明腐爛像腐敗或腐化一样都是形容詞。亲热和清醒，他們用形态或結構証明是动詞和形容詞；但这个詞的形体上各附着兩个不同的詞类，它們本来是兼性詞，这个形态只是对它們的各个不同性質的确認，把它們的各个不同性質更清楚地显現出来。“兩隻脚麻起来了，他是一个非常麻木的人”，他們說第一个麻木是动詞，第二个是形容詞，这个說法是可以商榷的。麻木都是形容詞，第一个麻木是变成或成为麻木，这个麻木实質上是以主詞的补詞[或表語]的面目出現于句子中，变成或成为这个动作的意义是麻木的述位这个位次形态所給予的（参看《語法理論》，38—39頁；122頁，《中国語文》1955年37期，24頁）。

“地主怕斗爭，我們不怕艰难困苦”，呂叔湘認为前者为动詞作宾語，后者为形容詞作宾語，黎錦熙認为由动詞或形容詞轉成名詞；他們在形态上可以証明是名詞，因为前句中的斗爭不能加着或了等，能加这种群众的等，后句中的艰难困苦不能加很、十分等，能加这种、那些等（《汉語的詞类問題》74—75頁）。但斗爭和艰难困苦都是兼性詞，前者是动詞兼名詞，后者是形容詞兼名詞；斗爭在前一个句子中以名詞的性質出現，艰难困苦也在后一个句子中以名詞的性質出現。它們旣不是动詞和形容詞，也沒有憑借句子中的职位轉成名詞；它們本是名詞或具有名詞的性質，因此能充当宾語。在这兩个句子中它們出現了名詞的性質，不是出現了动詞或形容詞的性質，在前者之后自然不能加着或了，只能在其前加这种或群众的，在后者之前自然不能加很或十分，只能加这种或那些。在別的句子中它們可以动詞或形容詞的面目出現，如农民斗爭地主，生活艰难困苦，能加的和不能加的就完全相反了。这足以說明詞的性質决定詞与詞的結合，詞与詞的結合只能把詞的性質表示得更清楚，絕对不能决定詞的性質。

从王力的話:"我們不能認数目字……为形容詞之一种，因为形容詞能單独用为詞（表邏輯的判断的述詞),而数目字不能(桃花紅,成話;桃花三,不成話);数目字能帶單位名詞,而形容詞不能(三朵桃花,成話;紅朵桃花,不成話,……)",又从吕叔湘的話:"大多数动詞和形容詞能用作某些动詞的宾語，如不怕打击和貪圖方便……不必說打击和方便已經变成名詞。但是給他一个重大的打击和給他种种方便……打击前面有一个，方便后面有种种……就应該承認它們已經变成名詞"，他們証明离开了形态这一标准,区分詞类是会碰到困难,或者竟是不可能的(同上書,76—77頁)。这个証明是沒有效力的；因为王力和吕叔湘的說法不是正确的。事物包含性态和数量，性态和数量都依存于事物,指性态和数量的詞当然都是形容詞。在古代汉語,数詞后面不須跟單位名詞,如"人一,犬二,桃花三",王力的数詞不能作謂詞的說法显然不能成立。單位名詞的性質决定它只能同数詞結合（这个即这一个的省略），不能同性态詞結合(吃一个痛快，一个是接續助詞,單位名詞只一般不跟性态詞結合)，以單位名詞的結合判断表事物性态的詞和表事物数量的詞不应同屬一类;那么內动詞和外动詞也不应同屬于动詞一类,因为前者扮演述詞时不帶宾詞，后者扮演述詞时必帶宾詞。王力据單位名詞的附著与否把表事物狀态和数目的詞分为不同性質的兩类自不能是正确的。打击和方便兩个詞所表示的語言現象是客观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动作和性态,說話者的头腦中所反映的,是这个客观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动作和狀态，因此他們才說出"不怕打击,貪圖方便,給他一个重大的打击，給他种种方便"。打击和方便在进入句子前都是名詞,吕叔湘的据詞与詞的結合判定它們的性質自不能是正确的。

他們說:"詞类是語言中客观存在的类,是語言自身表現出来的类。語言自身怎样表現出类来呢？就是从形态上表現出来。所謂某一类詞的形态上的特征,也就是从形态上表現出来的它們的共同之点。"(同上書,78頁)第一句話中的"語言自身"理解为詞的自身,全句的意思是明白而正确的。說、吃、笑、走四个詞前各別地加上我,結合起来，就是它們的形态上的特征,也就表現出它們的共同之点，它們就应該屬于同一的类。这个說法，是把詞的現象当作詞的本質看待的。这四个詞的共同之点,是它們都指事物的一种动作,这是它們的本質;与我結合起来成为所謂形态上的特征,只是这个本質显示出的現象。它們的本質是在跟我結合以前就存在的，因为它們是独立于这个結合之外的客观的实在；它們应屬于同一的类是它們的同一的本質,即个別的和具体性的动作,普遍的和一般的动作所从抽象出的,决定的，它們的本質所显示出的現象,即詞的結合或形态上的特征是不能决定它們的类，只更明白地把这个类显示出来,也就是說,通过这个結合或形态,它們的动作本質更容易地辨認出来。

以詞的結構关系区分詞类和用鑒定字划分詞类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吕叔湘所指出,鑒定字的缺点是很多的(參看《汉語的詞类問題》,144—148頁),結構关系的缺点自然也是很多的。啊、唉、喂、嗯等等沒有和其他的詞結合的能力,就沒有形态可言,但是文煉和胡附認为它們仍然有形态,这种形态叫做"無形态的形态",这应該說是区分詞类的形态說登峰造極了!

（本节完,本篇未完）

編者的話

本刊8月号起增辟"語文短評"一欄以后,承广大讀者支持,紛紛投稿。但因篇幅限制,只能酌量选用。选稿标准——要的:1)錯誤比較突出,而且有流傳可能,要及时糾正的(如16、17条);2)錯誤比較隐晦,值得推敲的(如18条)。不要的:1)錯誤比較幼稚,或只是由于一时疏忽的(如"改进缺点","看見歌声");2)即使欠妥,但是相沿已久,虽名家也不以为嫌的(如"考取中学","沒有……以前");3)原文不出于公开發行的書刊的(8月号第7条發表后,有讀者提出这个意見,我們認为是对的)。

短評来稿所引出处务請詳細注明。如不采用,一律不退。其他不滿5000字的稿子也不退还，退稿也不一定提意見,一并声明。

又来信来稿务請写明詳細通信处和眞实姓名,以便联系。

PEOPLE'S CHINA





SUBSCRIPTION FORM FOR PEOPLE'S CHINA

Enter name and address through which you wish to subscribe. Make your cheque or money order payable to dealer through whom you subscribe.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renewal to PEOPLE'S CHINA for ____________

year(s), beginning with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5____

☐ *Payment enclosed* ☐ *Please bill me*

Name ____

Address ____

116-56-5

魯迅与文字改革

杜 松 寿

魯迅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周年了。回想1936年先生在上海逝世后的情况，历历如在眼前：川流不息的群众每天向殯仪館涌进，向先生致哀，瞻仰先生的仪容。昨天先生还过着地下的被迫害的日子，發表的文章也在不断地掉换笔名，跟檢査官在那里鬧戏法，今天——在先生剛一逝世的日子里却擋不住被压抑的人們的洪流，自發地团結成一起，把追悼魯迅先生跟救亡运动溶合起来，振动了整个上海市。我看見小学教师領上他們的小学生一队一队去向先生的灵前致哀，看見郵局的投遞員同志中途停下車来，到殯仪館去向先生深深地鞠了躬又繼續去傳送信件，看見無数的工人同志列队前去追悼。送殯的时侯輓歌队的歌声响澈了云宵，沿途万人空巷密集的队伍向万国公墓移动。

这个时期正是新文字运动在全国蓬勃發展的时期，魯迅先生当时以無限的热情在理論上为新文字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了新文字运动的旗手。在悼念先生逝世的日子里，上海的一些新文字工作同志痛切失掉了忠誠的导师，几乎是每天都去到他的灵前，依依不舍。

今天文字改革已經成了政府的旣定方針，全国人民也为党和政府的这一英明措施而欢呼。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回忆一下先生当年对新文字問題所作的宝貴的指示，对我們的工作將会有不少的教益。

1935年以后的文字改革运动同时也是救亡运动的一个組成部分。正如魯迅先生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訪員”里說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負起来的任务。”①

魯迅先生是毅然决然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字运动的进行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旗手站在新文字运动的最前列的。他前后为新文字的推行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闡明了新文字推行中所遇到的几个主要問題。

魯迅先生明确地揭示了新文字的立場問題。在《門外文談》里，他打比方說，“老爷”以为旱灾是由于老百姓的懶惰，而乡下六十岁的老人却因自己的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杀了”。站在不同立場上的人，原来是說不到一起兒的。那些阶級异己的人，“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魯迅先生每次談到拼音文字总是把它跟人民的使用也就是人民的利益結合起来想。他同情于人民的热情溢于言表。他关心的对象是那些“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头回家”，把門外当“天堂”（屋子热又有蚊子）“做得筋疲力尽，嘆着苦”的店員、校对員、制圖工人……。所以他說：“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众語，大众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一句話，把文字交給一切人”。

魯迅先生以他淵博的学識看清了問題的実質。他在对中国文字的發生和發展作了概括的科学的叙述以后得出結論說：“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分重大的遺产，应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声的諧声字的現在，这感謝卻只好躊躇一下了。”

这样，他旣不是非历史观点地看待汉字，也不是唯心主义地把汉字看成永远不変的东西。所以进一步他豫言道：“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学者，‘灯紅’会对‘酒綠’的文人，并無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碍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給旧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旧文字。”

魯迅先生把文字改革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把它看做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發展前途的大事，而不是少数热心家的个人兴趣，或者一般的个别的群众运动，所以他接着說：“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魯迅先生对于拼音文字的这种看法是很重要的，他指示我們应該大家伙来关心来推动这項工作。可惜直到現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了解，倒是有一些人把它看做“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的。

正是由于魯迅先生有这样的历史观点和科学的透辟的認識，所以他才自信地作出这样的豫言：“要得実証（按：指拼音文字的推行），我看也不必等候多久。”我們很高兴，先生的豫言应驗了。在他逝世后二十年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下文字改革工作已經有領导地，在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情况之下，开始踏步前进了。这里，先生对文字改革工作所作的理論上的指示，几十年来在群众中間的傳播，不能不是今天工作所以順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

① 魯迅先生作品是大家都熟悉的，为节省篇幅，本文所引魯迅先生的話都免去注明出处。

魯迅先生在肯定文字必須改革并且走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之路以后，进一步研究了拼音文字的兩个重要的具体問題，一个是写什么語言的問題，一个是怎样拼写語音的問題。

关于写什么語言的問題，魯迅先生主張"啓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語文的大众化"。为什么他要这样說呢？他認为："写普通話，人們不会；倘写土話，別处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在啓蒙时期，各写牠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知識了。"这兒魯迅先生既从大处着想，要全国人民用統一的語言写，又念念不忘人民当前的可行的利益，主張先用方言写。当然，我們今天也不能反对人民拼写他們的方言，但是新中国已經給文字改革加了一項人为的新的推动的因素，这就是展开学習普通話的运动。由于普通話的推广，由于二十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民族共同語的急速成長，基本上全国一直用統一的普通話書写就成了可能。这种情况，魯迅先生如在，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普通話是怎样产生的呢？魯迅先生这样說："現在在碼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話模样的东西，大家說話，既非"国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乡音，乡調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說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牠發达，也是大众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来还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里'加进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众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关于这种普通話的基础，魯迅先生說："中国究竟还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来如果眞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語，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話吧。"对于这种普通話，魯迅先生也不是把它看成純然自發的，人們無能無力的。相反，人应該帮助它形成，帮助它精密起来。他說："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現在我們所办得到的是：……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欧化'語文，仍应支持。"

从字面上看，这跟我們今天所說的普通話的定义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們的定义是明确肯定的，那就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为語法規范的普通話——汉民族共同語"。这个定义是1955年兩个全国性的会議（文字改革和汉語規范化会議）所确定了的。但是这个定义并不是临时憑空定下来的，而是有它的發展的历史根源。

魯迅先生的远見告訴我們，我們有了全民族共同的正在發展着的普通話，它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他告訴我們全国人民的交际必然要使用这种普通話，他还告訴我們这种普通話也还是需要"加以整理，帮牠發达"，并且明确指出必須吸收外来語中的有益的成分。我想这也就是我們今天确定了定义的"普通話"的精神实質。关于我們的普通話的形成，不同方言区的人們的交际不能不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对于我們的普通話也不能不作一些規范化的工作。我們的普通話必然也要吸收外来語里有益的成分。

但是我們更其应該了解的，我們不可能要求魯迅先生把普通話的具体內容講得剛剛和今天会議上所确定的完全一样。历史是向前發展的，科学是一步一步更加接近眞理的。必須通过几十年来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实踐才能使問題更加明确起来。这兒不能不联系到普通話本身的發展。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的急劇的發展，革命所發动的群众范圍的空前广泛，革命性質的一步一步的深入，这一切都使普通話由雛形到成熟，而这在魯迅的时代还不是完全現实的。所以魯迅只能猜測性地說"也許"，"我想"，"恐怕…"。这正是魯迅先生愼重的地方。他指示給我們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不可能要求他把二十年后的一切都安排好，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以科学的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来指出地平綫上閃出来的光芒，并且为扶持这个注定会發育壯大的东西而努力。

我們的普通話的語法規范是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这种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正因为魯迅先生把"大家都能看懂"和"語法精密"看做是"实行"的目标，把这种精神体現在他的作品中，所以他的著作才成了今天的普通話的典范。魯迅先生不仅为我們的普通話理論奠了基，而且也为它写出了样品，使我們有所遵循。不过，我也同意呂叔湘先生在語法座談会上所作的报告的說法，我們从典范的現代白話文作品中所吸取的应該是其中的"一般用例"，而不是兼收并蓄結果反招来了分歧和不規范。我想，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怎样拼写語音的問題，魯迅先生提出的口号是"簡而不陋"。他說："用世界通用的罗馬字拼起来……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汉来說，好像那拼法（按指国語罗馬字的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簡而不陋的东西。"在《論新文字》一文里，他說："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未必精密的。繁难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

但要精密，总不免比較的繁难。罗馬字拼音能显四声，拉丁化不能显，所以沒有'东''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显'东''蝀'之分，罗馬字拼音却也不能显。單拿能否細别一兩个字，来定新文字的优劣，是并不确当的。况且文字一用于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魯迅先生进一步还拿汉字做例子，說“日”就有三种解釋，“果然”也有三种解釋。接着他說：“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个字，說它含糊，并不是正当的指摘。”

魯迅先生从群众学習并使用拼音文字的难易，也就是从人民的利益出發来考虑問題，这是处理人民事業的唯一正确的态度。而从文字（語言）內部規律来看文字的是否眞正精密，更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的表現。几十年来的新文字实踐，完全証实了魯迅先生的看法。最近《拼音月刊》的附册《实驗》上的拼音文字讀物，凡是讀过的都会証明魯迅先生的說法是对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魯迅先生也有說明：“罗馬字拼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为主，翻成罗馬字，使大家都照規矩写。拉丁化者却以方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規矩。”我想，这确实是問題的关鍵所在。一方面我們感于汉字的困难，要改用拼音文字，但另一方面我們却以汉字做底子要显出它的字調，从一定的角度上看，我們心目中仍然是一个个的汉字，每个詞的各个音节都要記出它的源头，这对于学習使用文字（語言）确实增加了人为的困难。我們区分了一千多个音节，但是我們的区分对象却是五千个汉字（一般的数目），这区分一方面对于大部分詞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而是徒增困难的。另一方面，眞正需要区分詞义的时候，它的手段又有时而穷（同音同調）。

但是，魯迅先生旣然提出“簡而不陋”，那么对于一定的需要区分的場合，他自然也是同意加以区分的。他說：“何况后来还可以憑着經驗，逐漸补正呢！”这兒魯迅先生把实踐看做唯一的衡量的标准，認为在实踐中的补正才是眞正的合理的精密，而那些“几个讀書人在書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則“大抵行不通。”

魯迅先生提出的这項方針，也就是今天大家所同意所遵行的方針。我們可以告慰魯迅先生的英灵，以前的爭执不下的所謂国語罗馬字者和拉丁化新文字者的意見，今天已經統一起来了。一方面，大家不仅不再主張采用先生覚得“太繁”的国語罗馬字的表示声調的方法，不强調全部标注声調，另一方面，也不主張像拉丁化新文字过去完全不标声調（少数定型詞例外）的办法，而是遇必要时以簡單的方法标注声調符号。所謂遇必要时也就是先生說的“憑着經驗逐步补正”的意思。我是这样了解的。

魯迅先生的豫見証实了，他說：“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今天大众自掌教育实現了，拉丁化果然要普及了。而大众自掌教育也必然以大众掌握政权、自己当家作主为前提。这种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已經成了現实。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周总理在大会的报告里提到了文字改革問題，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吳玉章主任也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問題的發言。作为文字改革工作者来說，我們在紀念中国文字改革理論的奠基者之一的魯迅先生的时候，大家感到無限的兴奋，我們借此祝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成功，也以此告慰魯迅先生。

1956,9,25.

“百家爭鳴”杂感

海 風

“百家爭鳴”要鳴得好，这是追求的目的，不是限制的条件。我們不能解釋为“鳴得好的才能鳴”。怎样才算鳴得好，事先是很难說出一个标准来的，只有通过反复的“爭”，才能淘沙取金，去伪存眞。因此，乱鳴是一个必須經过的阶段。但乱鳴不等于胡說八道。比如，音乐家可以各唱各的調子，不必听指揮棒的指揮，也不必管跟別人唱的是否和諧，但他自己唱的总得要成調。

* * *

“爭鳴”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大帽子吓人。批評別人不从具体出發，而是用“馬伯乐的信奉者”、“和叶士丕愿一鼻子孔出气”、“陷入了高本汉的唯心論的泥淖”这些字眼来压人，这是很难使人折服的。何况資产阶級語言学者的学說中也还有可取处。

* * *

“爭鳴”要用自己的腦筋說話，不要当录音机。有些人習慣于旁征博引，十句話中倒有八句是“某某說”，剩下兩句也只是給別人作注脚，这种作風需要改变。学生只知道說老师的話，中国人只知道說外国人的話，我們的語言科学如何能进步，我們如何建立得起中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語言学說！我們要学習苏联的先进的語言学説，这是肯定的，但研究中国語言，就得从中国語言的实际出發。

* * *

“爭鳴”和“固执”是不相容的：“爭鳴”是为了追求眞理，我們要“爭”眞理，堅持自己的眞理，也要服从別人的眞理；“固执”是不顧眞理，明知別人对、自己錯，也要强詞夺理。在語言学上的强詞夺理，往往就是拿特殊的語言現象来反对一般規律，这样，汉語中許多悬而不决的問題，將要永远“悬”下去（但这并不等于反对对特殊的語言現象的研究）。我們要有堅持眞理的勇气，也要有向眞理低头的勇气，其实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魯迅的語言艺术

——以《阿Q正傳》为例——

徐中玉

一

文学是語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形象必須依靠語言来描繪。高尔基这样指出："像鏇床工人必須熟悉金屬及木材一样，文学家必須熟悉他的材料——語言文字；否則，他便不能表达自己的經驗、情感和思想，便不能制造圖画和个性。"①眞正偉大的文学家必然同时是一个語言大师。魯迅先生就正是这样的一位語言大师。他是使用我国現代語言的模范，他所写下的"每一句都有千錘百煉、一字不易的特点"，在他的著作中，"表現了我国現代語的最熟練和最精确的用法。"②

《阿Q正傳》不但是魯迅創作中描繪得最眞实最深刻的一篇小說，同时它也是中国現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杰作，世界現实主义文学宝庫中的一个新收获。小說通过对于典型人物阿Q的描写，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中的阶級对立，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他們的反抗要求以及存在他們身上的严重弱点。小說强烈地表明：像辛亥革命这样一种革命是还不能摆脫阿Q們的奴隶命运的，中国劳动人民如果眞要摆脫他們的奴隶命运，就必須进行新的战斗，更徹底更不妥协更注重实力的战斗。

《阿Q正傳》的巨大成功在于它的深刻的思想性是通过一幅眞实的生活圖画和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現出来的。而魯迅的卓越的語言才能，則总是他的作品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魯迅指出《儒林外史》在艺术表現上的一个重大成就，便是它能够"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又說吳敬梓对于"家本寒微，以乡試中式暴發，旋丁母憂，翼翼尽礼"的范进的那段描写，是"無一貶詞，而情伪畢露，誠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③可見魯迅是十分贊賞《儒林外史》的語言艺术的，而《儒林外史》語言艺术的最大特点，即在于能使所写到的各色人物"皆現身紙上，声态并作"，縱令"無一貶詞"，仍得"情伪畢露"，換句話說，即在于能使所写到的各色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鮮明，情感畢露，从而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活动"如在目前"地表現出当时一般的"世相"。

我以为，魯迅語言艺术的最大特点正也就表現在《阿Q正傳》里。小說里的对話并不多，但魯迅却能在几句話里甚至只在一句話里就能突出地、独特地、具体地把所写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繪出来。

当我們听到阿Q在和別人口角时，瞪着眼睛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和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下碰响头，或被赵太爷打了嘴巴而無力反抗时心里想着"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的时候，我們就立刻感覚到了阿Q性格中的这一个特征：精神胜利法。

当我們听到阿Q伸手去摩小尼姑新剃的头皮而獃笑着說："禿兒！快回去，和尙等着你……"，和扭住伊的面頰兴高采烈地說："和尙动得，我动不得？"的时候，以及当我們听到他在靜修庵里偷蘿卜吃而向老尼姑要無賴所說的"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園里来偷蘿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的时候，我們也就立刻感覚到了阿Q性格中的另一特征：流氓气。

但阿Q性格中也有虽然模糊却非常强烈地要求反抗的一面，这一面同样也在下面兩节說話中充分地表現出来了："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媽媽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狀，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滿門抄斬，——嚓！嚓！"

应当說，阿Q的这些說話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同时也富于鮮明的个性。說它們具有典型意义，是指包含在这些說話里的意思都是生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一般貧苦农民都可能具有的，这里面有着他們的痛苦和酸辛、仇恨和弱点、反抗的要求和对于被压迫人民历史道路的無知与探索，魯迅決沒有使阿Q說过一句像他这样的人決不可能說的話。但阿Q的这些說話却都有其特有的用語和語法，表現出来了他的特殊的生活經驗、教养和心理，因此这些說話同时也是非常独特的，即使仍是这些意思，如果出在別一个人的嘴里，語言方式就会不同，至少不会完全相同。在阿Q的这些說話里，多的是"你算是什么东西？""和尙动得我动不得？"

---

① 轉引自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217頁。

②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論：《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

③ 《中国小說史略》第23篇。

"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之类的語式，各句的含义虽有不同，但都和在生活上飽受着压迫，內心里充滿着憤怒和对于这样的世道抱着怀疑与不平的阿Q这个人的性格特征相适应；而所謂"兒子打老子"也好，"和尙等着你"也好，"造反是杀头的罪名"也好，則也都是阿Q这个人才有的語言，因为他的生活經驗和教养不可能使他說出更高雅更深刻的話来。阿Q的这些說話正是他的全部生活的反映，而从他的这些說話——包括說話的內容和他特有的用語和語法——便能使我們清楚地看出像他这样一类人和他这一个人的性格。

高尔基很佩服巴尔札克小說里写对話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讀者看了对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魯迅曾經研究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地方的方法，他終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結論："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談話里推見每个說話的人物。"①魯迅的这个結論是非常精确的。他所說的"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事实上就是指可以充分表現出各人性格特征的說話。他主張"摘出"，就是說在描写对話时必须要从这个人所說的全部話語中去挑选最能表現出他性格特征的說話来描写，而不是随便什么說話的一古腦兒的堆积。

阿Q的說話固然是有特色的，像赵太爷的下面兩句話难道不是同样富有特色的么?"阿Q，你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这眞是一种多么巧妙的語言艺术，仅仅的兩句話，就把一个素日作威作福慣了，根本不把阿Q这样的人当作人看待的一付凶恶的地主嘴臉完全显露出来了。在赵太爷們的君臨統治之下，阿Q們連姓什么的自由都沒有，別的自由当然更談不到。赵太爷一开口就大声喝罵阿Q"你这渾小子!"，眞是声态并作，現身紙上，即使不写出他当时是如何的"滿臉濺朱"，我們从他的如此这般的喝罵里也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値得注意的是赵太爷的說話里虽然也充滿了設問的形式，但都意味却和阿Q的完全不同。阿Q有的是怀疑，出于憤怒和不平，这怀疑是眞实的，而赵太爷的却仅仅是責問，虽然好像在問，其实完全是在責罵，因为在設問之先，他早已断定了阿Q是不会也不配姓赵，做他的本家的。所以，即使是类似的語言形式，但由于用語不同，語調不同，意味也就大不相同，而归根結底則是由于赵太爷和阿Q的生活地位是不大相同的，因此他們的性格特征也就不能一律。

《阿Q正傳》里的对話，不但主要人物的都能鮮明地表現出各自的性格特征，就是次要人物的对話也各具特色，显得非常生动。在阿Q的恋爱悲剧中，地保对阿Q說了这一节話："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赵家的用人都調戏起来，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觉睡，你的媽媽的!……"地保的确是在晚上被叫醒了来教訓阿Q并奉命跟他开談判的，由于沒有觉睡，当然会埋怨阿Q的惹事生非，所以一再罵他"你的媽媽的"；地保是地主老爷們的走狗，誰伤犯了地主老爷們的面子、規矩、或利益誰就"簡直是造反"，这本是他們的邏輯，不在話下；但像地保这样的人，对調戏妇女未必不感兴趣，其实并不能發什么議論，所以他的教訓便只重在不能"連赵家的用人都調戏起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最后，他所以一再罵阿Q"你的媽媽的"，原来为的强調了自己的劳累，就可理直气壯地向他索取四百文的加倍酒錢。作为一个普通的地保，他的地位、邏輯、口吻在这一节話里都被恰如其分地刻划出来了。

即使只有一句話，甚至只有一兩个字的說話，仔細体会起来也十分傳神。小尼姑的帶哭的声音："这断子絕孙的阿Q!"凡是熟悉江南一帶乡間年青女子口語的讀者当能知道这是一句多么气憤的話，而这句話出現在当时这个小尼姑的口里簡直是必然的，几乎非說出这样一句話来就不能使我們感觉到她在那种形势下是多么着急，多么委屈。阿Q和小D互相拔着辮子打架，三进三退，不分胜敗，最后彼此都已筋疲力尽，只好同时松手走开。可是兩个人嘴里都不肯示弱，还想占点上風，所以阿Q說："記着吧，媽媽的……"，小D也說："媽媽的，記着吧……"。是一样的兩句話，不过調了个头，表明兩人其实都已外强中干，無話可說，这句話不过是講給周圍的看客們听，聊以解嘲的。至于看客們在他們三进三退相持不下时所說的"好了，好了!"或"好，好!"这里面虽然多少有着一点解劝的意思，但主要的成分还是煽动，即所謂"看好看"，觉得看他們兩人这样扭打很有趣味，不希望这出戏过快收場。旧社会里的确有这么样的許多閑汉，而閑汉們的心理的确也正是这样。

魯迅笔下各色人物的說話为何能够这样活龙活現?这道理其实也簡單，即他所描写的这些人物是"多据自所聞見"的。②他自己曾这样說："作者用对話表現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③的确，作者如果不熟悉这个人的灵魂，如果胸無成竹"，他就刻划不出这个人物形象来，对話就無法恰到好处。归根結底，任何有本領的作者都不能無中生有或鑿空强作。魯迅的信条是："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④，"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⑤，就为

① 《花边文学》："讀書瑣記(一)"。
② 《中国小說史略》中論儒林外史語。
③ 《讀書瑣記(一)》。
④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問"。
⑤ 《南腔北調集》："我怎样做起小說来"。

的硬写硬做出来的决不能是好东西。那些"阿Q正傳"的对話为什么能这样成功？原来在写出这篇小說之前，阿Q这个人的影像存在魯迅心目中"已有了好几年①"，而对于中国农村中"地主老爷"等等的熟悉，則还是更早以前的事情了。

二

《阿Q正傳》里采用了不少古語。

关于文学作品的用語，魯迅的一貫主張是"要說現在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来"②；是"將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气。"③ 但是为了丰富人民的語言，魯迅也主張可以适当地采用文言，甚至于外国話。他說："我也贊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語文可以采用文言……"④，"也須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⑤，"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总有人会懂"⑥。应当注意的是魯迅只在"必不得已"、"沒有相宜的白話"可以代替的条件下才主張采用古語，而不是主張無条件的大量采用；并且这种采用乃是"供使役"的，不能喧宾夺主，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唯其是"供使役"的，所以無論如何，采用的資料必須使人能懂，至少要"总有人会懂"。因此，他虽然主張可以采用文言古語，但对于有些青年作者"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裝璜自己的作品"的錯誤作者却非常反对。⑦ 他还举"峻峭"和"巉巖"为例，問这样的山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如果作者采用了这种連自己都沒有弄明白的形容詞来写文章，当然就不能使讀者懂得自己的意思⑧。而写文章的目的，在他看来，却是应当在于"將意思傳給別人的。"⑨

可以說，《阿Q正傳》里采用的不少古語，一般都是符合上述的原則，而起了补足和丰富人民語言的作用的。

分析一下魯迅在这篇小說里采用的古語，其所以是"必不得已"，大概有下面一些情况：

一种是用来表示嘲諷的。例如"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須傳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終于归結到傳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里前面几句文言显然屬于称引性質，过去某些文人搖头摆尾自命不凡，把所謂不朽之笔和不朽之人互相标榜，結果还是不免于同朽；魯迅如此庄諧杂出，实际就在揶揄过去那些妄誕無知的文人。例如"夫文童者，將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这里是故意裝出郑重其事的口吻，这种口吻本是赵太爷錢太爷他們的，也是深受着赵太爷們思想的影响而認为秀才之类乃是了不起人物的其他人等的，虽然如此，阿Q却偏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足見阿Q的确"很自尊"，但更重要的則是显出这种看法的着实可笑。例如所謂"深閨"和"淺閨"，未庄只有錢赵兩姓是大屋，勉强算得有"深閨"的存在，此外十之八九都是小屋，本来也說不上有什么"閨"，但小家妇女不免多少傳染到一点"深閨"的風尙，其实可笑，所以諷刺地称之为"淺閨"；而像赵太爷家那所謂"深閨"，一听見阿Q处有便宜的賊贓可买，便立刻大轉念头，又"深"在那里？总之都太可笑。例如"庭訓"好像是一件極庄重的事，可是赵太爷"庭訓"秀才的內容却不过說不要結怨于小偷；"共患难"原是一种很难得的情誼，可是城里举人和赵太爷的所謂"共患难"，却不过是互相利用，圖个狡兎三窟；可見在这些人口里"庭訓""共患难"等等冠冕堂皇名义的后面，就不过是这样一些卑鄙丑惡的貨色。又如說得好听的口号"咸与維新"，那里眞是这样，当时其实只有知县大老爷、举人、老把总、赵秀才、錢洋鬼子等这批人在"咸与維新"吧了。如上所說，魯迅采用这些古語的目的，原来都在于嘲笑、諷刺、揭露那些地主、官僚、封建文人、"深閨"妇女等等的妄誕無知，虛伪無耻和卑鄙可笑的面貌。

还有一种則是本身言簡意賅，許多讀者都能懂得，可以用来丰富和加强人民語言的表現力的。例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無师自通"之类。

总之，魯迅作品中的古語，虽不能說凡所采用的詞屬完全必要，無一可以移易，一般却都是各具特殊的作用，决非为了裝璜而設。毛主席曾这样指示："我們还要学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們沒有努力学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們就沒有充分的合理的利用。当然我們坚决反对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該繼承。"⑩魯迅作品正是实現了毛主席这些原則的典范。

三

在文学作品里，叙述人的語言处在作品的領导地位。它可以把作品中写到的各色人物的紛歧的对話凝結成为一个整体，它可以通过各种暗示、比喻、形容詞，語調等等来对所描繪的事物进行評价，它可以具体

---

① 《华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
② 《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
③ 《墳》："后記"。
④ 《花边文学》："大雪紛飞"。
⑤ 《墳》："后記"。
⑥ 《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来"。
⑦ 《墳》："后記"。
⑧ 参《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識字糊塗始"。
⑨ "我怎么做起小說来"。
⑩ 《反对党八股》。

述各色人物在活动当时的感觉和想法，它可以为着适应描繪的需要而在同一节段里迅速改变叙述的形式，而表現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構造。总之，叙述人的語言一方面固然是描繪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的一种方法，同时它也是構成叙述人的形象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阿Q正傳»里，叙述人的語言在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主人公們的性格特征固然可以在他們各自富有特色的对話里表現出来，但他們的內心世界如果得到了叙述人的語言的补足，那就能显得更加完整和深刻。例如下面这兩节叙述人的語言：

> 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头魚，未庄都加上半寸長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細的葱絲，他想：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們沒有見过城里的煎魚！
>
> 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講話，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声說几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擲一塊小石头。

在这兩节叙述語里，虽然是在叙述，但几个"可笑"和几个"一定"，却分明使我們具体地感觉到阿Q当时的"自負"和那种所謂排斥异端的"正气"。經过这样的补足，阿Q的性格特征确是更加突出了。

作者对于阿Q这种人的命运是非常同情的，也就是所說"哀其不幸"，但他的这种同情并未明白說出来，却是在叙述的語言——字里行間流露出来的。阿Q因为自称是赵太爷的本家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之后，作者这样叙述："他大約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該如此胡說的。"阿Q不独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为什么会这样渺茫？作者叙述："因为未庄的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为什么有赵太爷在这里阿Q便不配姓赵？为什么未庄的人們可以如此漠視阿Q这个"人"？在这兩节話里作者实际已提出了这兩个問題，而这显然是帶着極大的同情的。

作者对于阿Q这样的人并不是只有同情，也有惋惜，也有嘲諷和鞭撻。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不見了，在用力的打了自己兩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別个一般之后，阿Q便"心滿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睡着了"。在临死前教他画花押的时候，阿Q还是沒有想到別的，却認为圈而不圓，是他"行狀"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釋然，因为他想到孙子才画得很圓的圓圈，"于是他睡着了"。这里兩句"睡着了"，表面看来好像只是很冷靜很客观的叙述，骨子里却体現出来了作者"你怎么竟能睡着了"的着急和惋嘆的感情。阿Q胜利地欺侮了比他更为弱小的尼姑之后，"飄飄然的似乎要飞去了"，不但沒有覚得只能战胜这样的敌人之"無聊"和"悲哀"，反而还十分得意，所以作者这样說："然而我們的阿Q却沒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里兩句話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諷刺，鞭斥阿Q的欺侮小尼姑乃是最沒出息的行为。

作者对于赵太爷之流是極端痛惡的，他虽然并沒有正面地把这一点告訴我們，但通过某些具有特色的叙述却能够使我們充分得到这样的感染。赵家借口調戏吳媽向阿Q勒索到了一斤重的紅燭一对，香一封，原說是要他到赵府上去賠罪用的，又他的破布衫留在赵家，本無扣下的必要和理由，但終竟列入条件不准再去索取了，作者叙述后来香燭和破布衫的下落，如此說："但赵家也并不燒香点燭，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来的孩子的襯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这里真是"無一貶詞，而情伪畢露"，赵家全眷的凶惡貪鄙，使人灼然如見。赵秀才和錢洋鬼子历来也不相能，現在要"咸与維新"了，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相約到靜修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将伊当作滿政府，在头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而且从此庵里还不見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爐。这段叙述好像并未指出这兩个人的行徑是多么下流齷齪，可是仔細体会一下，作者实在已把这兩个人罵得連小偷都不如。作者对于那些起勁地跟着看杀头而喝采的人們也有着很大的反感，这种反感从他描写这些人的喝采声是如"豺狼的嗥叫一般"便能覚察出来。

作者的叙述語言不但能够簡潔地告訴我們什么时候某些人發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能运用一些适当的語式和調子具体的傳达出事情發生当时人們的感覚或情境。例如他写人們故意打架来搶走阿Q贏到的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他不知道誰和誰为什么打起架来了。罵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腦的一大陣，他才爬起来，賭攤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詫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这真是一节多么巧妙的描写，有声有色，就像我們亲眼目覩了似的。罵声、打声、脚步声，突起而起，拳足交加，乱成一团，把阿Q弄得莫名其妙，等到爬起来想弄个明白，搶到了他的洋錢的人早已一鬨而走，可是这时阿Q却仍昏头昏腦，挨了打也不大覚痛，丢了錢也还不知道，还在茫然四望，手足無措，無怪旁观者清的人会詫异的对他看，这些人一定会掩口葫蘆，覚得阿Q这个人真正是一个可憐的大傻瓜。这节

話的前半节，語式簡短，調子緊張急促，动作迅速异常，活現出当时那幕活剧的情景，后半节逐漸迂緩，表現出阿Q正在从昏头昏腦中慢慢清醒过来，終于才知道是洋錢已經不見了。又如作者写阿Q和小D打架："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約半点鐘，他們的头髮里便都冒烟，額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間，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叢去。"这兩个人都是又瘦又乏，誰的气力也不比对手大些，并且本非不共戴天的寃家，既已相持不下近一点鐘之久，都想松手算了，但碍于周圍看客的欣賞，却又不甘心先自松手，还要硬撑，可是实在誰也支持不下去，所以最后还是兩人一道松手挤出人叢走掉了。这节話不但写出了这种尷尬的情境，并且語言的特別緩慢沉重的調子也巧妙地体現出来了这个相持不下，終于筋疲力尽，只好同时松手走开的有趣局面。

在文学作品里，如前所說，叙述人的語言是具有巨大作用的。在分析作品的时候，如果我們不能把多样地表白在叙述人語言里的作者的評价和描繪技巧掌握到，那么我們就無法眞正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个作品的丰富意义。

四

对于文学作品的語言，魯迅另有一个重大的要求，便是簡潔。在他看来，冗長乃是一个不小的缺点。所以他自己就"力避行文的嘮叨"①，"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②，他也經常这样劝告別人："將無之亦毫無損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③ 魯迅認为，文字語言虽应將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但文章和口語却不能完全相同，因为在講話时"可以夾許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無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間、紙張的經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删去的。所以文章应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④ 魯迅这些意見都非常正确。

《阿Q正傳》虽然是一个中篇小說，篇幅不能算短，但比起它的非常复杂丰富的社会內容来，应当說它确实是达到了一般作品極难达到那样的簡練程度的。

例如这一节："一犯諱，不問有心与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訥的他便罵，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漸漸地变换了方針，大抵改为怒目而視了。"在这里，可見阿Q并不是全無心計的，他也估量，也罵人打人，然而总还是常吃亏，所以才改为怒目而視了。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当然知道，但他故意不直接說出来，要我們自己去思索。他在这里暗示我們，阿Q所以要改为怒目而視，并非他特別爱好如此，乃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在。他是只得如此，才成为如此的。阿Q之所以成为这样的阿Q，实是被侮辱被損害的結果。这層意思当然并不只是包含在这一节叙述里，但这一节显然着重地在表明这層意思，說話虽少，意思却非常丰富。

又如这一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錢，忿忿的躺下了，后来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覚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这里描写了阿Q的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很簡潔，但又很耐人尋味。为什么最后他又会覚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呢？原来在他的心目中，赵太爷这时已經是他的兒子，这兒子本有威風，固使他很得意，而由于这是頗有威風的兒子，便覚得他高人一等，甚至还覚得他应該高人一等，所以如此，因为兒子如能"高人一等"，那么作为老子的阿Q自己的地位也就更可显得崇高了。請看單是这一句話，就含蓄着这么許多的意思！

要做到語言簡潔，意味無穷，先須作者自己具有丰富深刻的知識和閱历，而又能从中选擇最主要最本質的东西来加以集中的刻划，同时他的那枝笔也要能适切地把这种主要的、本質的东西通过具体事物的描述表現出来。簡潔好像只是一种技术，其实决不能仅仅依靠推敲文字去学会它。魯迅語言的簡潔，精煉，甚至鋒利，果决，都是和他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認識分不开的。

① 《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来"。
②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問"。
③ 《給張天翼》。
④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

(接45頁)lized［仍然是顎化的了］等等中独立出来。相反在k is frequently palatalized［k 經常被顎化］这个句子中詞組is palatalized就有从形容詞詞組中独立出来的趋势，并和簡單的詞形式 palatalize 有着特殊的接近，例如和 they frequently palatalized k and g［他們經常把 k和g顎化］中的 palatalized接近。副詞frequently［經常］促成了这一点，由于有副詞frequently就使 is palatalized 被了解为过程，而不是事物的特征。这类情况再一次地表明了第二形动詞的形容性（адъективность）并不会使它成为形容詞，因而形动性与动詞性（глагольность）的結合并不会产生新的質。詞彙成份并未使第二形动詞的語法性質复杂化，而語态区別只是語法上的区別，是同一个詞不同形式的区別。（郑蜀平譯自1956年第2期《語言学問題》）

魯迅用語的生动簡鍊

——讀書札記——

刘　坚

《估“学衡”》是魯迅先生1922年为駁斥反对白話的“学衡”派而写的一篇杂文。他說：

> 夫所謂“学衡”者，據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門”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我覚得这一段很可以說明魯迅先生在运用祖国語言上所持的謹严态度。他絕不放松一字一句，总是选擇最确切的字眼来說明問題，来同敌人进行斗爭。我們只要看看这篇文章里所举的“学衡”派的言論，就可以明白“估”字用在这里是多么恰当了。魯迅在这里抓住“衡”字，用“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釘好”来諷刺“学衡”派自己文章写不通却还要“衡”别人，这是十分有力的，可以說抓住了敌人致命的弱点。有人說魯迅的杂文像短劍和匕首，能准确地插入敌人的心臟。这主要是指这些杂文的战斗的思想內容来說的，但我們用这来形容魯迅的語言也是很合适的。魯迅的作品的深刻的思想內容正是通过正确的語言来表达的，魯迅这些杂文的語言眞正达到了千錘百煉、一字不易的地步。

*　　*　　*

魯迅說他自己“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这是魯迅的語言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魯迅在战斗中常常用这种“反語”来揭露对方：

> 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値識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識字的人，單会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歎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鏡花緣》里說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發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値一哂”，眞是可憐煞人。（《現在的屠杀者》）

魯迅用了不到二百字就把所謂“国学家”揭露得这样徹底。只有最精煉的語言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30年国民党指揮了一些特务出版“文艺”刊物，企圖用这些刊物向左联进攻。魯迅說：

> 然而統治阶級对于文艺，也并非沒有积極的建設。…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偵緝队長，他們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杀戮法”或“偵探术”，大約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詩。（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現狀）

“杀戮法”和“偵探术”同画画、吟詩本来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国民党特务却一定要把它們拉在一起，他們在文艺上的“积極的建設”是怎么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

魯迅先生就是这样运用“反語”“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的。

*　　*　　*

《为了忘却的記念》是魯迅在1933年为記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五个革命青年而写的。他在回忆这五个青年遇害时說：“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載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这件事，只在《文艺新聞》上有一点隐約其辞的文章。”这里的“不敢、不願、不屑”很具体地說明了反动政府白色恐怖籠罩下上海报紙的态度。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并沒有用許多笔墨去正面描写当时的社会环境，然而我們通过他所写的报紙的各种态度，通过这六个字就很可以想見当时的白色恐怖窒息着輿論已經到了怎样的地步！“不敢、不願、不屑”这六个字在这里說明了不少問題，而且我們很难用別的字来改換。眞正的艺术語言应該是最能啓發人們的想像的，因为它有含蓄，它能在最簡潔凝煉的話里包含最丰富的內容。

*　　*　　*

《肥皂》是魯迅1924年写的短篇小說，主要刻划了封建家庭的主人、假道学的四銘。我們一开头就看見四銘“聳肩曲背的很命掏着布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然后看見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匯出手来”。这是四銘最初給我們的形象，多么生动的形象！魯迅写四銘的口袋，用了一長串修飾語，用得实在好，这样写，四銘的費勁兒的模样仿佛就出現在我們面前了。魯迅就是这样“極省儉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的。我們想想看，假如作者只用“很命掏着口袋”或别的什么說法，那讀起来还有什么味兒呢？下句的“匯”字也实在下得好。“匯”本来是形容水流的，在这里用来描写手的曲曲折折的动作，实在是再恰当也沒有了。口袋在袍子大襟后面，袍子大襟又在布馬褂底下，好容易把手伸进去，再要讓手出来，这个动作，除了“匯”字是很难有更好的字眼来表达的。魯迅常常給他的人物以富于特征性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又用最恰当的語言来表現，这样，他的人物就躍然紙上了。文学作品中語言的美不在于詞藻的堆砌，而在于它能形象地表現出人物的特征和風貌，魯迅的語言是完全具备了这种美的。

（轉13頁）

分 析 形 式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

在語言学著作中广泛地使用着"分析"、"分析的"以及在意义上跟它們对立的"綜合"、"綜合的"这几个詞。但是还不能說，我們对于这几个詞的理解已經是清楚而明确的了。

一般說来，常常把不止用一个詞来表示其意义的結構了解为語言的分析結構（而綜合結構則相应地了解为一个詞的結構）。所以，英語的 old man[老人]就可以称为分析結構(而俄語的 старик［老人］和拉丁語的 senex［老人］則是綜合結構了)。

如果这样来理解問題的实質，那么不如簡單地說，分析結構就是詞組（而綜合結構就是詞）。这样一来，就应当承認，任何語言，凡是由言語中相互結合的詞組成的，基本上都是分析的語言，因为言語中的大部分意义都是用詞組来表示的：不論这种語言的詞彙多么丰富，也不論在这种語言中創造新詞多么容易，在言語中，不但是可能使用的詞組，就是实际上使用的詞組，在数量上也总是比單詞多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說，語言的分析性对于語言作用（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和語言發展来說是重要的本質上的普遍特征之一。由于語言具有这种分析性，数量有限的一些單位——詞，在一定的語法規則支配之下，就能表示無数的思想，就能自由地表示完全新的思想，并把它傳达給別人。

有时，分析性这一概念放得还要寬些：凡是容易明确地加以分解的結構都了解为分析結構（而綜合結構則了解为結合較紧密的結構。①按照这种了解，分析性就成了数量上可变的、并且具有相对性的特征了：可以有比較分析的結構和比較不分析的結構；可以有对另一种結構說来才是分析的結構；也可以有对另一种更加分析的結構說来是綜合的結構(当然，綜合性也可以与此相应地来了解)。同时，按照这种对分析性(和綜合性)的了解，詞和詞組之間就沒有什么原則性的区別了。一个詞的結構（однослов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特別是明显的粘着性結構（如爱沙尼亚語的詞 kasu-de-le［有益处，有利于］）和另一种構造更复杂的、具有明显的屈折性質的結構（例如英語的 has［有］或 is［是］）比較起来，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分析結構了。

除了上述兩种比較一般的对分析性(和綜合性)的了解以外，还有一种較局部的、狭义的、專門的了解。即使这种了解还未十分肯定，但它的目的却是要把分析結構作为一种处于完全特殊地位的結構予以区分出来。

按照狭义的、專門的对分析性的理解，分析結構一般說来是指这样一种結構，它一方面显然具有与詞組的構造相同的構造，而另一方面又和詞組有本質上的不同，而和完整的詞相似。这种具有內部矛盾的特殊結構既有詞組的特征，又有詞的特征，它似乎居于詞組和詞之間的地位。很可能正由于这种結構的存在，才在專門語言学的意义上广泛使用"分析"、"分析的"等这些詞。

不难看出，这个意义上的分析結構和熟語單位（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единица）的定义很接近，甚至完全相同。因为熟語單位的特点正是具有詞組的構造，同时又和一个詞相等，起着一个完整的詞的作用。这样一来，分析結構与熟語單位的区别究竟在哪兒呢，实际上分析結構究竟是否存在呢？

要回答这个問題，就得注意典型的熟語單位在哪一方面和詞相似或相等。②

典型的"古典的"熟語單位如：дом отдыха［休养所］，бить баклуши［游手好閒］，спустя рукава［馬馬虎虎］等与复合詞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熟語單位可以分解为多少相等而具有完整語义的組成部分，与复合詞中作为組成部分的詞幹相似。这种熟語單位与复合詞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們的組成部分是作为單詞而結合起来的，即是通过它們的語法形式結合起来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詞的各个部分結合起来的，即是說不是用詞彙方式結合起来的。

但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熟語單位，它們跟复合詞不相似，而跟派生詞相似。派生詞就是由一个主要的詞根部分結合一个或几个在語义上从屬的輔助部分

---

① 例如請参看 V. Tauli 的《Morphological analysis and synthesis》，《Acta linguistica》vol. V, fasc.2. 哥本哈根，1945—1949。

② 关于詞和熟語單位的相互关系，請参看阿·依·斯米尔尼茨基和奥·斯·阿赫曼諾娃（О. С. Ахманова）的《英語中 stone wall, speech sound 这种类型的結構》，《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报告和通訊》，II，莫斯科，1952，101—102頁。

(詞綴)而成的詞。例如英語中的"be tired"[累了],"be surprised"[惊訝]就屬于这一类熟語單位。一方面,这类熟語單位無疑是一种現成的結合物,它与动詞-系詞be[是]在下列情况下構成的自由詞組有often本質的区别,如be old[是老的],be small[是小的]等。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动詞 tire [累、疲倦] surprise [惊訝]所構成的"被动式"(試比較:He was surprised at the news [他对这消息表示惊訝]和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news [这消息使他惊訝]不同)。① 而詞組 be aware [覺察到] 的各个部分之間的結合性又更加特別。

熟語單位和自由詞組都可能与派生詞相似:主要的是它們都只能有一个完整語义的部分。而这类与派生詞相似的熟語單位和自由詞組之間的区別是,熟語單位和"成語式"的現成的派生詞相近(如:столовая [食堂],керосинка [煤油爐],сказка [童話、故事],градусник [寒暑表]),而同一类型的自由詞組則和"非成語式"的、在言語中自由構成的派生詞相近(如зеленоватость [淡綠色],пумёнок [小野猫],по-тагалогски [講塔卡洛克話])。

这种一般說来与派生詞多少相似的、在一定条件下与輔助詞結合而成的詞組,对于詞組中的主要詞說来,可能并不是特別的詞(派生詞),而只是主要詞的一种特別的語法形式。因此就有必要特別把这种特殊的詞組作为一种分析結構(狹义的分析結構)区分出来,也就是作为分析形式特別区分出来。例如俄語的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將要工作]这个詞組中 будет 是輔助部分,работать 是主要部分。这个詞組对于詞組中主要詞 работать 說来并不是特別的詞(派生詞),而是它的特別的語法形式——將来时形式。可以說работать-работал-работает-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共同組成一类,它們彼此之間只有語法上的关系。

显而易見,对分析結構(狹义的分析結構),也就是对分析形式的这种理解是相当通行的。但是这种理解通常仍然是一种近似的理解,缺乏严密确定的概念。这是因为这种現象本身就沒有与其它近似的現象明显地区分开来,沒有对它的各个本質特征加以深入而全面地研究的緣故。那么作为詞的分析形式的这种分析結構的本質和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必需肯定以下的事实。

分析形式是一种最特殊的分析結構,它單独看来是詞組,更确切地說,是某个主要詞(以它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輔助詞(或輔助詞詞組,这一点暫不涉及)結合而成的詞組。并且分析形式还是自由詞組,而不是熟語單位,例如: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和(молодость)возьмёт своё [(青春)占上風] 有完全不同的分析法。因为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屬于数量不定的一大类,如:будет делать [將要作],будет знать[將知道],будет помнить[將記住],будет любить[將要爱]等等,等等,而 возьмёт своё (在上述意义中)在詞彙上是單一的、孤立的、固定的(它只能有語法上的变化,如:взяла своё, взяло своё 等)。我們在任何需要的場合都可以構成某种分析形式。要在語言中使用这种分析形式,完全不必要事先知道包括这一具体主要詞的这一个分析形式。例如:即使从来沒有听見 будет палатализовать [將要顎化],也能說和 он будет палатализовать все гласные [他將把所有輔音都加以顎化];熟語單位則不能如此。因此,如果把分析形式从一般包含輔助詞的詞組中区分出来,那是根据它完全特殊的特征区分出来的,而与区分熟語單位的特征不同。

根据上面所說就可以明白,分析形式与其它自由詞組的区别实質上在于它不是与詞相似(相类似),而是与詞的个别語法形式相似。虽然它們是作为特殊的完整單位和詞的等价物(但并不是指該詞的的全部形式体系,而只指詞的某些形式)的詞組,并且还是自由詞組,但是分析形式的特征却在于它与完整詞的諸形式的这种相似。这样就产生一个問題:什么条件使某种詞組作为該詞組中主要詞的語法形式的相似物而从其它的詞組中区分出来?(例如:什么条件使詞組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作为主要詞 работать 的語法形式 работает, работал 的相似物而区分出来?)

要回答这个問題,必須注意到这一情况,詞的任何語法形式都屬于某一种語法范疇,或者說都是表示某一种語法范疇的。例如單純的、也就是撇开其他語法范疇的"第一人称"或"現在时"等因素,就是在某种語法形式中的个別語法范疇,因而也就是在一定的具体的詞形式(словоформа)② 中的个別語法范疇。它們可以称为范疇形式。

此外还必須补充以下几点:

1. 任何一种語法范疇至少必須有兩种范疇形式,否則它就不能存在。因为語法范疇是存在于个別中的一般的东西。譬如說,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語言,其中只有一种語法人称或只有一种格,諸如此类。

2. 任何一个范疇形式都不能包括一个詞的全部形式,也就是說,不可能是該詞的全部詞形式。或者換句話說,任何一个范疇形式都不能在这个詞的一切

---

① 关于第二形动詞与动詞-系詞 be 的組合,請参看阿·依·斯米尔尼茨基的《完成式与时間关系范疇》一文,《外語教学》杂志,1955年,第1期,第6頁。

② 关于"詞形式"这个术語,請看阿·依·斯米尔尼茨基的《論詞》一文,《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論文集》,第四卷,莫斯科,1954 第18頁;以及《詞的詞彙方面和語法方面》,《語法構造問題》,莫斯科,1955。

語法形式中出現。如果有某种这样的語法特点，它为一个詞的全部形式所具有，表現在这个詞的全部語法形式之中，那么这就不是詞的某种范疇形式，而是詞的某种范疇类别，这种范疇类别不是語法范疇，而是詞彙-語法范疇。

3. 不同的語法范疇可以結合在同样的一个詞形式中(例如：人称和数，等等)，并且各种范疇形式的这种結合往往恰好構成了詞的某种語法形式。

4. 每一个詞的語法形式至少是一种范疇形式，当然，也就必定屬于某一种語法范疇：不屬于語法范疇的詞的語法形式是不存在的。

現在可以回到分析形式的問題上来了。如果作为分析形式的詞組，其特征是作为詞組中主要詞的語法形式出現，那末这就意味着这个詞組必定屬于主要詞的某种語法范疇之一。換句話說，它与这个詞的任何另外范疇形式共同屬于某种語法范疇，并且都是这一語法范疇的一定的范疇形式。例如：分析形式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是將来时的(范疇)形式，它和現在时形式，过去时形式一起屬于时的范疇。

分析形式既然屬于詞的某一語法范疇，那么它的作用也就和該詞的其它形式相似。由于詞的每个語法形式都表示同样的一个詞，所以相应的分析形式也就是一个詞，是一个完整詞的代表者，而不是詞組，虽然在結構上它是詞組，并且还是自由詞組。

这里有一个矛盾：詞組却代表一个詞。这个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和我們在熟語單位中發現的矛盾相似。熟語單位同样是詞組，但由于它具有成語性，在語义的完整性上和詞相似，它也就起一个詞的作用。分析形式不是这样，因为作为分析形式的詞組，它的一般的特点是自由詞組。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使得詞組能和一个詞的作用相同，是什么使这种矛盾能具有生命力和相对的稳定呢?

最本質的問題显然是，在該分析形式所从屬的語法范疇中具有簡單的、綜合的、非合成的形式。例如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虽然这是一个明显的詞組，但它之所以和一个詞(以一定語法形式)的作用相同，只是由于在它所从屬的語法范疇中，其余的形式，即現在时形式(работоет 等)和过去时形式(работал 等)是簡單的、綜合的形式。德語 wird arbeiten [將工作]，英語 will work [將工作]也具备同样的条件，在它們所从屬的語法范疇中相应地有簡單形式arbeitet[工作—現在时]，arbeitete [工作—过去时]和 works[工作—現在时]，worked[工作—过去时]，由于这些簡單形式的存在，我們才有理由認为这些詞組(wird arbeiten, will work)是分析形式，而不是簡單的詞組。

假如詞組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所屬的某种一般的語法范疇(时的范疇)之中沒有 работает-работал 这样的形式，而假設是 есть работать-был работать，那么無論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或 есть работать，был работать 就不能从一般包含輔助詞的詞組中区別出来，尤其是不能从包含动詞быть的各种形式中区別出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認为动詞性謂語中不同时間的表現法是和名詞性謂語一样的：即是說主要动詞沒有时間的形式(即沒有时的范疇)，时間的区別用輔助詞的形式表示，正如名詞性謂語中的名詞和形容詞一样。因为(погода)была хорошая, будет хорошая [(天气)曾經是很好，將要很好]并不是 хороший, -ая, -ее [好]这个的时間形式。

因此，自由詞組起分析形式的作用的条件是它屬于詞的某一語法范疇，而这一語法范疇的各个范疇形式中又至少有一个是簡單的、綜合的形式：正是由于与簡單的、綜合的形式平行存在，詞組才能代表一个詞，成为同一个詞的語法形式。

但还不能仅仅限于肯定上述的这一个条件。还要說明什么决定某个詞組屬于某种語法范疇，相反地，什么阻碍另外的某个詞組屬于詞的某个語法范疇。

应当把以下兩种情况区別开来：

1. 至少有兩个范疇形式是綜合的詞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不論有無表示此范疇的分析形式存在，这一范疇本身总是存在的。例如俄語、德語、英語中动詞的时的范疇就是如此，不論詞組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wird arbeiten, will work 是不是时的范疇的分析形式，但时的范疇总是存在的。因为动詞的时的范疇中已存在兩个綜合的范疇形式，即現在时 (работает, arbeitet, works)和过去时(работал, arbeitete, worked)。

2. 只有一組綜合的詞形式存在，这一綜合的詞形式成为范疇形式的条件就是存在着以分析形式出現的詞組，它是同一語法范疇的另一范疇形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該語法范疇本身的存在与否就取决于某个包含輔助詞的詞組是不是該詞組中主要詞的分析形式。例如英語动詞的体的范疇就是如此。在英語动詞的各个綜合形式中沒有兩个在体的方面，并且仅仅在体的方面有区別的形式。这大約就是曾長期認为英語动詞沒有体的范疇的原因。英語中体的范疇成立的条件是动詞 be 的形式和另一主要动詞以-ing 結尾的形式結合而成的詞組不是普通的詞組，而是主要动詞的分析形式。如果 is working 是动詞 work 的分析形式，那么它必定和綜合形式 works 發生一定的关系并相互作用，它們只在某一方面相互不同(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則是相符合的，如人称，数，时，式……)。它們不同的地方显然就是体的区別(虽然与我們在俄語中看到的体并不完全相同)，is working 作为另一种語

法上的体与 works 不同，而与 works 相对立，它們的区别也仅在于此。这样，詞形式 works 和 is working（由于后者看作是分析形式）就是兩个不同的范疇形式，它們共同組成了英語动詞体系中体的范疇。如果 is working 等不是相应动詞的分析形式，那么它和 works 这类形式之間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动詞体系內部的相互关系，而是詞和某个包含这个詞的詞組之間的关系。这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原則上不同的了解，因为詞与詞組（自由詞組）有本質的区别。

如果承認 is working 这种詞組是动詞的分析形式，那么也就是承認 is working 和 works 一起構成为一对特殊的形式，虽然它和 works 構造不同，但却有着和 works 类似的語义結構，同时它与其它詞組也就有本質上的区别。

反之，如果 is working 并不是动詞 work 的分析形式，那么它一般地与詞組的性質基本上相同，is working 与其他各种詞組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它的各个組成部份与其它詞組的組成部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例如 is working 和 is a worker［是一个工人］的区别就仅在于形动詞 working［工作着］和帶冠詞的名詞 a worker［一个工人］是不同的詞。而 is working 和詞組 stands working［站着工作］的区别也仅在于 stands［站着］和 is 是不同的詞。

自然，上面所說的兩种情况，如英語的 works—worked——will work 和 works—is working，它們成为分析形式的可能性有着本質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說只要把詞組加入到已有的現成的語法范疇中去就行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相应的語法范疇形成的基础則是該詞組和詞的某个綜合形式有了特殊的接近，而在接近的过程中，这一詞的綜合形式又必須获得新的范疇形式的意义（例如 works 估計原来是沒有体的意义的，而必須在与詞組 is working 相接近的过程中获得体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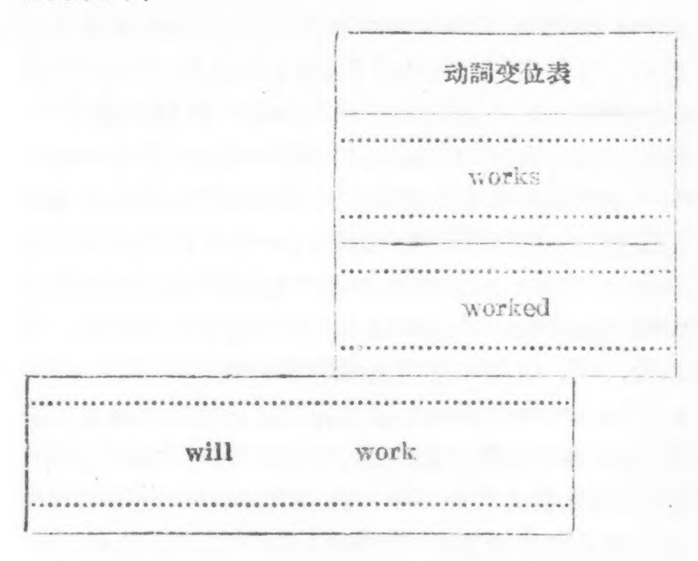
在以上兩种情况中，第一种分析形式的形成（卽詞組取得一个詞的語法形式的性質）較第二种情况要容易得多。对第一种情况来說，实質上只要詞組和語法范疇中已有的任何一个（綜合）形式在意义上的差别与它們之中任何兩个綜合形式之間（意义上的）差别相类似就行了。換句話說，只要詞組在語义上与已有的一个（綜合）形式之間的关系和各个綜合形式之間的关系相似就行。可以列式表示如下：

«f»:«z_1»:«z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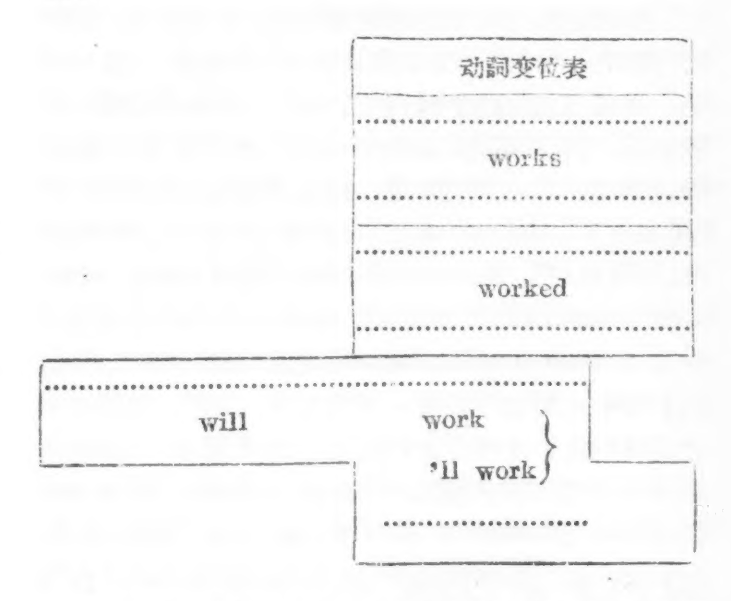
（f 代表分析形式，z 代表綜合形式，«　» 引号在这里所指的是意义）。例如：«will work»:«works»:«worked»。这也就是說，由于詞組 will work 有將来时的意义，并且失去其他意义，卽 works, worked 所沒有的那些意义（例如失去"想要"、"欲"的意义），所以 will work 就变成了动詞 work 的分析形式，并进入动詞的变位表中。

至于在某一具体的語言中，这类現象在各个情况下發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就是另一个問題了。必須研究相应的材料，然后才能确定我們遇到的是不是已經完全固定了的分析形式，或者是处于过渡狀况的、不固定的、动搖不定的結構。但是在第一类情况下（如英語的 will work，德語的 wird arbeiten 等），区分分析形式的原則本身不会产生什么困难。

一般說来，我們显然可以說英語中的詞組 will work 还沒有最終成为分析形式。这一情况大致可以表示如下：



換句話說，will work 尙未全部进入动詞变位表中。但是它的另一种省略形式 'll work 显然已經全部进入动詞变位表中了，因此更全面的情况可以这样表示：



德語的 wird arbeiten 全部进入变位表中，并和綜合形式 arbeiten, arbeitete 相等（在功能方面）。

在这問題上，还必須指出，詞組的各种特殊意义虽然可能使詞組排除在这个范疇之外，但也可能把这些特殊意义自然地理解为一种基于范疇意义的派生意义或轉义，所以幷沒有使詞組排除在变位表之外。这些特殊意义幷沒有改变詞組作为分析形式的性質。因为个别的范疇形式在等同的主要意义的基础上总是可以具有某些与它們的特性相适应的特殊用法和附加意义。例如大家都知道，在各种不同的語言中現在时的形式可以用来表示过去和將来的事情，然而一般說来这种情况幷不会使各个不同的范疇形式之間的界限消失，也不会使它們失去現在时的意义，而現在时意义只是使它們所表示的过去或將来的現象具有特殊的色彩。① 又如在 This rock will weigh several tons (Этот камень весит(пожалуй) несколько тонн)[这塊石头称起来(会)有几吨重]这个句子中，will weigh 的这种用法幷不会使詞組 will weigh 从时的范疇中，特别是从將来时的范疇形式中排除出去，因为在这个句子中詞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可以理解为將来时意义所派生的(例如可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句子"Если этот камень будет взвышен, то он *потянет* несколько тонн [如果称一下这塊石头，它將会有几吨重])。可以說，will weigh 使得上面所举的句子与 This rock weighs several tons [这塊石头有几吨重)]这个句子有差别；这种差别虽然与將来时和現在时之間通常的、本义的、簡單的差别不相一致，但仍然是依据將来时和現在时之間的这些差别来解釋的。

第二种情况如 is working--works 这种类型就复杂多了，在这里不能断定这种詞組应当进入哪一个范疇或附属于哪一个范疇，因为还沒有相应的、已形成了的范疇。

显然这里应从以下的情况出發。一般說来，表示某个詞的各个詞形式，不但彼此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幷且与包含这个詞的各个詞組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例如詞形式 работает 不仅和詞形式 работал 等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幷且和詞組 не работает [不工作]，работает ли [在工作嗎]，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ет [工作得很好]，может работать [可以工作]，начинает работать [开始工作]，хочет работать [想要工作]，считается работающим [被認为是正在工作着的] 等等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显然，这些关系之間可能是具体內容上的区别，也可能是一般的性質上和类型上的区别。例如在 работает 和 может работать 与 работает 和 хочет работат 之間的关系，在具体內容上是不相同的（因为 может 和 хочет 这兩个不同）但是二者在一般的性質上是十分一样的，然而它們与 работает 和 не работает 之間的关系則又有本質的不同，后者却与 работает 和 работает ли 之間的关系相近，二者屬于同一类型。其次，也很显然，某个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的类型也可能与一个詞的各个詞形式之間的关系和关系的类型相近，或不相近。例如 работает 和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ет(以及所有这种类型的詞組，如：усердно работает [努力地工作]，легко работает [不費力地工作] 等等)之間的关系在其內容的一般性質方面(从質的方面来看)与我們一般所看到的俄語动詞各个語法形式之間的关系是相距很远的。反之，上面提到的兩种关系的类型却与俄語动詞各个語法形式之間的关系比較接近：因为很容易理解，否定（用 не 来表示）和疑問(用 ли 来表示)的表現法是屬于动詞形式的体系之中的。尤其是因为 не 和动詞分写很像一种習慣性的写法，因此阿·阿·波鉄布尼亞 (А. А. Потебня) 經常把 не 和动詞連写；而在 ли 和动詞之間用連詞符連結起来 (знает-ли)的这种趋势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很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語义上来判断是不行的，还应当注意相应結構的構造，幷且还应当研究这一結構与其它的結構——詞組和詞形式的結構——之間的关系。

要把兩种結構之間的某种相互关系理解为語法上的关系，就必須是：兩者在含义上的差异是当作一种不主要的、补充的和只是附帶的差异表示出来，这也就是說这种差异不是用不同的詞来表示，而只是用詞的变化或詞相互結合、組合的关系来表示。因此，работаем [我們工作] 和 мы работали [我們工作了] 中实質上相同的內容由于表現的方式不同，就有了語法意义或詞彙意义的区别。具体地說：在 работаем 这个詞中复数第一人称的意义是語法意义（从語法上来解釋），因为这个意义仅仅是用詞形式的詞綴来表示的，而在 мы работали 中复数第一人称的意义是詞彙意义(从詞彙上来解釋)，因为它是用个别的詞来表示的。

凡是仅仅用詞的变化和詞的結合本身，即是从具体的詞抽象出来的結合来表示概括性的关系的，屬于語法范疇；凡是用詞本身，即是用詞彙的組成部分来表示的，則屬于詞彙范疇。

要使某种詞組与一些个别詞形式相接近，幷且由于詞組在作用和含义上与这些詞形式相似，使它們構成某一个范疇，它們之間相应的表現法就必須有特别紧密的联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詞組畢竟幷未变成为完整的綜合形式(幷不像拉丁語 finire habet>法語的

① 但是不言而喻，某种形式的特殊用法也可以使这一形式所具有的共同意义改变，或使一个范疇形式轉变为另一形式，甚至轉移到另一范疇中去。

&nira 那样),所以它的表現法是非常微妙的，具有相对性的。通常它唯一的表現手段就是把它从其它类似詞組中独立出来，使这一結構相对地孤立起来。但是这种孤立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

1,最明显的孤立情况就是：和某个輔助詞結合成詞組的詞形式，完全不能与其它輔助詞相結合或极少与其他的輔助詞相結合，甚至在这一詞組之外就完全不用。俄語中显然是沒有这类情况。法語的 été [曾經],德語的 gewesen [曾經],英語的 been [曾經] 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例子。它們只在和法語中的輔助动詞 avoir [有]、德語的輔助动詞 sein [是]、英語的輔助动詞 have [有]結合时才用,因此如法語的 a été[曾經],德語的 ist gewesen [曾經], 英語的 has been [曾經] 等这类詞組就特殊地孤立出来了。

2,詞形式的語法意义在与某个輔助詞結合成詞組时同其它情况下的意义(或几个意义)有很本的不同。例如: он поехал бы туда завтра [但願他明天到那里去] 这个句子中如果沒有語气詞 бы, 則詞形式 поехал [去了]所具有的意义(具体地說，就是过去时的意义)就会使它不能和 завтра [明天] 这个詞結合。① 所以 поехал бы 的結合較 поехать бы 的結合更为紧密，在 поехал (沒有 бы)和 поехал бы 之間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在 поехать (例如,在 поехать туда бавтра! [明天到那里去吧!]这个句子中)和 поехат ьбы(在同样的句子中)之間就沒有这种根本的区别。

法語、德語、英語以及其它一些語言中称作第二形动詞(即"过去时"形动詞,"完成式"形动詞)的形式在和法語的 avoir、德語的 haben[有]、英語的 have 等輔助动詞結合而成的詞組中，沒有它們在其它場合所具有的語法意义，例如法語的詞組 a donné [給过了]，德語的詞組 hat gegeben [給过了]，英語的詞組 has given [給过了]中,形动詞沒有被动态 (пассив) 的意义，而在其它的場合这些形动詞則有被动态的意义。(例如,法語: le livre donné á l' élève, 德語: das ihm gegebene Buch, 英語: the book given to him, [給了他的这本書])等。

大家知道，在各种語言的历史上这种在語义上的孤立使得形动詞在相应情况中失掉了一致关系的变化 (例如法語 a écrit la lettre[写完了这封信]中écrit [写]和 lettre [信]沒有一致关系,而 a écrit la lettre 按其各个成份和一般結構来說是来自拉丁語的: habet illam litteram scriptam, 这里形动詞 scriptus, -a -um 等 [写过了], 与詞形式 litteram [信]有一致关系)。

3.往往也有这种情况，即詞組中主要詞的形式和詞組中輔助詞的某种形式不能結合。而这种情况根据詞組結合的一般規則是無法解釋的。因此这种詞組就成为特殊的一类,甚至有时是为数甚多的一类。例如:英語中动詞be和第一形动詞結合而成的詞組be working, is working, was working 等。从这里我們可以發現这为数很多的一类結構,它們構成方法是: "在所有这种結構中都必須出現的动詞 be 的形式加上表示詞彙成份的某一个动詞的第一形动詞"。乍一看来,这一公式似乎是無限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按照这个公式,我們应当能構成 being working 这种結構,但实际上却沒有这种結構。事实上我們却会看到这样的平行現象:

如: be, work-be working; is,works-is working; was, worked-was working。

保持着这一关系，接下去的应該出現 being, working-being working。

試比較: be worked,is worked,was wosked,being worked, 再比較: stand, stands, stood working; standing working; we saw the commander standing there on the bridge watching the unloading② [我們看見了那指揮官站在那边桥上看着卸貨]。

这样，詞形式 warking, watching 等似乎替換了实际上并不运用而照理却应当在相应的一类复合結構(如 be working 等) 中出現的詞組 being working, being watching 等,結果这类詞組(即 be working 等)就与相应詞的某种簡單的綜合形式發生特别緊密的联系而从其它的結構中孤立出来。

4.有时詞組中主要詞的形式可能与它在其它詞組中所具有的意义一般是相同的，或者差不多相同。然而由于整个詞組在句法上的特点，使它与主要的某个簡單形式特殊地接近,結果該詞組就孤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外表上完全相同的詞組就可能具有二重性，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孤立出来，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則屬于一般的一类。这种二重性本身就加强了詞組在一个范疇中对于另一范疇的孤立性。例如各种不同情况的被动結構就是如此。在英語的 k in keep is palatalized [k 在 keep 这个詞中是顎化了的] 中詞組 is palatalized 按其結構来說并未从詞組 is voiceless, palatal, short [是清音，顎化音，短音] 等以及詞組 becomes palatalized [变成顎化了], remains palata-

(轉38頁)

---

① 語气詞 бы 可以和連詞(чтобы, если бы 等),代詞以及相应的副詞(кто бы, какой бы, как бы等)紧密結合这一情况只使問題更复杂化,但并不改变問題的实質。

② 例子取自莫·阿·甘新娜和納·莫·娃西列夫斯卡娅的著作 (請参看 M. Ganshina 和 N. Vasilevs kaya, «English grammar», 第七版,莫斯科,1951,第286頁)

语文短评

32　**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則可以經过教师在实际过程中的努力，边教学、边改进、边学習、边提高。**（光明日报1956年7月23日第1版）

（一）“困难”后面沒有着落，因为它不可能是“改进”和“提高”的对象。改法：在“努力”后添上“来解决”。（二）第二个顿号应該改逗号，其余兩个可以去掉。（茜蒡）

33　**天津作协分会正在积極的对他們的創作上給予輔导和帮助。**（新港第2期第7頁）

（一）“对”和“上”不能合起来成为一个格式，要就用“对”，要就用“在……上”。这里“在……上”不如“对”。（二）“积極”修飾动詞“給予”，最好挨它近点兒：“……对他們的創作正在积極的（或“地”）給予輔导和帮助”。（滿鶴年）

34　**当松花江水沿着加高加固后的江堤順流而下，洪水已經解除对哈尔濱的威胁的时候……**（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7日第2版）

“洪水”不能做“解除”的主語。应改成“……洪水对哈尔濱的威胁已經解除的时候”。（王年一）

35　**原来是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的生动逗得他們發笑。**（文艺学習1956年7月号第50頁）

“原来是作品中那些生动的人物和故事逗得他們發笑”，很現成，很生动，把“生动”倒过来裝在“人物”和“故事”的后头，反而别别扭扭，不生动了。（張一才）

36　**調动各界青年的积極性为社会主义服务**（保定日报1956年8月14日社論标題，又正文中三見）

积極性可以“發揮”，不能“調动”。（蔡穎敏）

37　**防御侵略叙利亞和約旦成立联合軍事司令部**（吉林日报1956年8月24日第4版副标題）

这个句子讀不斷。意思自然是“防御侵略，叙利亞……”，但是也可以讀成“防御侵略叙利亞和約旦，成立……”，还可以讀成“防御侵略叙利亞，和約旦……”。应該写成“为了防御侵略，叙利亞和約旦成立联合軍司令部”。（法今）

38　**汉代舞蹈，鼓是伴奏的最主要的乐器。**（新建設1955年第11期第61頁）

（一）“汉代舞蹈”在形式上近乎“游离成分”，但是用得不恰当。（二）“伴奏的”和“最主要的”兩个定語的次序也可以斟酌。应該改做“汉代舞蹈中，鼓是最主要的伴奏乐器”。（徐樞）

39　**保守主义是必須反对，一定要反对的。**（文艺月报1656年8月号第67頁）

“必須”就是“一定要”，只用一个就够了。（徐樞）

40　**当时的牛虻在里面根本起不了什么左右作用。**（大众电影1956年第15期第14頁）

“左右作用”是杜撰的，应該删去“左右”。“当时”后面的“的”字也是不用較好。（徐樞）

41　**羿射日的故事，在《山海經》里又改变了故事的本質，說是上帝派他下来为民除暴的一个有名的弓射手。**（商务印書館《中国文学史綱》第10頁）

（一）“故事……改变了故事的本質”，第二个“故事”应改为“它”。（二）“說是上帝派他下来……的弓射手”应該改做“說羿是上帝派下来……的弓手（或“射手”）”，或者“說羿是一个有名的弓手，上帝派他下来为民除暴的”。（張少庭）

42　**因汉注虽然它由于时間接近周代，錯誤較少，但也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光明日报1956年9月23日第8版）

这里不能用“它”来复指“汉注”，应該删去“它”。（徐采芹）

43　**現在与1913年比較，〔苏联〕人口死亡率減少了三倍半。**（人民日报1956年9月10日第5版本报莫斯科电）

汉語中表示数量的減少，習慣上不用"倍"字。俄文所謂"В три раза меньше"，"В семь раз меньше"……意思是"从三变为一"，"从七变为一"，应譯为"減少了三分之二"，"減少了七分之六"。"減少了三倍半"的原文大致是"В 3.5 раза меньше"，意思就是"从3.5变为1"，可譯为"減少了七分之五"或"減少了71%"。（徐采芹）

44　**凡是艺术团所到达的城市，都毫無例外地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新湖南报1956年2月8日）

受到欢迎的是"艺术团"，不是"城市"。应改做"艺术团到达任何一个城市……"或者"艺术团每到一个城市……"。（毛西旁）

45　**在江西反对白軍一、二、三、四次"圍剿"时，她（按指康克清）差不多沒有一次不參加。她現在任紅軍总司令部直屬部队的政治委員，在各个战綫上都出入槍林彈雨。**（中国青年报1954年6月17日）

作者原意是說在反对四次"圍剿"时她担任这个职务，因此"現在"应改成"当时担任"。（毛西旁）

46　**地球上的25亿人类中，每4个人里面有一个中国人。**（中国青年报1956年2月18日）

"25亿人类"不通，应改成"25亿人"或"全部居民"。（毛西旁）

47　**特别是第十一回大放其反对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反对义和拳的厥詞。**（光明日报1955年12月11日）

"大放厥詞"是个成語，不能折开；而且"厥"就是"其"的意思。改法："特别是第十一回大放厥詞，反对……义和拳"。（刘凱鳴）

48　**利用百部草灭虱，大蒜治痢，是我国人民習用經济特效藥物……**（生物学通报1956年1月号第42頁）

"利用百部草灭虱，大蒜治痢"是方法，不是"藥物"。应改成"……是我国人民習用的經济而有效的方法"（刘凱鳴）

49　**这些动物大都是因为新的环境，不能适[应]它的要求，遂促使死亡。**（生物学通报1956年3月号第45頁）

"这些动物……促使死亡"，不通。应改成"这些动物大部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死亡"。（刘凱鳴）

50　**这个良好的开端將鼓舞我們青年中將出現更多的爬山运动員，向在祖国境內的世界聞名的前人沒有到过的高峰挺进。**（中国青年报1956年8月1日社論）

"鼓舞"只能同表示行为的动詞配合，不能同"出現"配合。应改成"……將鼓舞我們未来的更多的青年爬山运动員，向……"（竹蓀）

51　**在少年的时候培养起来的体育兴趣，往往我們在青年、成年甚至老年时代都喜欢它。**（中国青年报8月12日社論）

"它"复指"体育兴趣"；"喜欢体育兴趣"，說不过去。应改成"……往往到我們青年、成年（应用"壯年"）甚至老年时代还保持着"或者"往往保持到青年、壯年甚至老年时代"。（竹蓀）

52　**……組織更多的青年訂閱适合青年所需要、喜爱的报刊。**（中国青年报8月14日社論）

可以"适合青年的需要"，但是不能"适合青年所需要"；至于"适合"和"喜爱"中間，無論用"的"用"所"都不成。应改成"……适合他們的需要，为他們所喜爱的报刊"。（竹蓀）

53　**在交流工作經驗方面，有各單位半年多来的十二篇研究工作报告和四个有关新抗生菌篩选方法的專題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討論。**（解放日报1956年8月28日）

"展开"前面缺乏主語。改法：把"有各單位"改成"各單位提出了"。"半年多来的"也可以刪去。（蔣權聞）

54　**不但新品种沒有上市，即使旧品种的供应也成問題。**（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

"不但"同"即使"搭配不攏，"即使"应改成"連"或"甚至"。（蔣權聞）

55　**他們曾經动員楊克、楊洪、馮惠荣等七个孩子的媽媽退职。**（中国妇女1956年9月号第1頁）

（一）"动員"同"退职"不相应，应改成"劝說"。（二）劝說的对象是楊克、楊洪、馮惠荣等七个人，不是楊克她們的媽媽。应改成"……楊克、楊洪、馮惠荣等七个有孩子的女职工退职"。（蔣權聞）

书刊評介

《語法理論基本知識》，岑麒祥著。时代出版社，1956年8月。32开，34頁，定价0.14元。

这本小册子簡明扼要地介紹了語法理論的基本知識。著者从德語、英語、俄語等語法說到汉語語法，这对初学語法的人在了解語法的一般問題上有不少帮助。

本書共分“語法、語法种类”、“形态学單位及其表現方式”“形态学与構詞法”“語法范畴”“詞类”“句法”等六节，在各节中，著者分别对語法上的一些术語概念作了概括的闡明，特别是对汉語語法的形态学、詞法、語法范畴論述得更透澈。語法术語的概念确实需要弄明白，往往有因为术語的概念搞不清楚，結果就把語法上的根本問題也搞錯了。著者还通过外国語和汉語的比較，很概括地指出汉語形态和構詞法具有本身的傳統和特点，認为在研究汉語語法的时候，要从汉語語法本身的傳統和特点出發，这样才能正确地說明汉語語法上的現象。但是，本書有些不足的地方是著者对汉語形态表現的方式和詞类区分的标准缺乏足够的說明，尤其是詞类的区分标准問題談得不够透澈。

在过去，我国語法学界專門来做語法理論通俗化工作的人并不多。本書的出版是值得欢迎的。（直）

《怎样学習普通話》，朱星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32开，110頁，定价0.30元。

著者在这本比較通俗的書里，很精練地叙述了普通話声母、韵母、声調等各方面的情况，指出学習普通話的方法窍門，并簡單地談到找方言字音的对应規律的方法。这在推广普通話的热潮中对学習者是有帮助的。

本書里附有大量的練習表（从41頁到102頁），包括附表共有十三个表，每个表都針对某些方言区的人学習普通話的难点，把分不清的字全部用表列举出来。这是本書較突出的优点。

但是，这本書的內容和書名頗不相称，它仅仅叙述了普通話語音的各个方面，語法、詞彙根本没有提到。即使在語音方面，也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例如：

（1）“汉語的每一个字音除了廿二个声母十六个韵母外，还有四种声調…”（20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这話說得太籠統，汉語中每个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調的多少是很不一样的，这要由具体的方言来决定（在第七頁上，著者認为注音字母有廿二个声母，其中包括舌根鼻音ㄫ，所以这兒所說的汉語有廿二个声母恐怕是指普通話而言。其实舌根鼻音ㄫ在普通話也不作声母用，仅仅是輔音韵尾）。著者在講到“对应規律的原理原則”这一节里，自己也承認“方言的音和普通話的标准音是兩套不同的系統（但都是屬于汉語的語音系統，…这兩套不同的語音系統并不是完全不同，里面有相同的，有相异的。究竟相异多少，各方音情况不一样）……北京語音中有ㄓㄔㄕ和ㄢㄣ等声母韵母，但上海語音中就没有（上海語音把ㄓㄔㄕ讀成ㄗㄘㄙ，把ㄢ讀成ㄚ或近似ㄝ，把ㄣ讀成ㄥ）…”（32頁）。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著者的說法是前后矛盾的。我們必須明确一个概念——“普通話”是汉語，但是“汉語”不等于普通話。

（2）尖音字（“音”字原写作“团”字，看上下文恐怕是“音”字之誤）是古音里屬于‘精母’……团音字是古音里屬于‘見母’的字，……”（36頁）。这話說得也不完全，如“樵”是尖音字，却是从古“从母”来的，“乔”是团音字，却是从古“群母”来的。所以說“母”只能代表一个古声母根本包括不住。应該說尖音字是古音里屬于“精組”（精清从心邪）的字，团音字是古音里屬于“見組、曉組”（見溪群曉匣）的字。現代所謂的不分尖团是指古“精組”和古“見組、曉組”的字在今細音前無分别而言。

（3）本書說“天津、靜海、景县……都是ㄓㄔㄕ跟ㄗㄘㄙ不分……”（38頁）。这里單拿天津話来說，ㄓㄔㄕ跟ㄗㄘㄙ实际并不是没有分别的。

（4）本書附表三“本方音跟标准音声調差异对应規律調查表”（102頁）中，标准音陽平調举的例字（其实称呼普通話最好）有九个，其中有四个（拔、敌、直、昨）是不适合的。因为这四个是由古入声变来的陽平字，并不是地道的古平声濁音母（包括次濁）的字，而入声字在方言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有的方言保存入声（保存的情形也不一样，有收-p-t-k尾的，有收喉塞-ʔ的，有無收声仅仅紧一下的，有完全和舒声一样自成一調类的），有的方言入声归并到其他調里去了（这在各方言归并的情况也不一样，通常是看古声母的清濁而分别归入其他調子）。所以不举“眞正的”陽平字来作例字是不恰当的，应該改換。

此外，附帶应該指出的是：把“猥瑣鄖鄘”（61頁）放入陰平調是不对的，应改为陽平調。（緒一）

《普通話問題解說》，杜松寿著。陝西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32开，54頁，定价0.14元。

在全国大力推行普通話的高潮中，各地出版社为了滿足需要，陸續出版了学習普通話的小册子，这是好的現象。这本小書是著者已写好的《西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的緒論部分，用解說的形式从理論上把推行普通話过程中必会碰到的問題都談得很透，对西北以外地区推广普通話的准备工作，也可以适用。同时由于著者解說的問題比較全面，叙述的內容很有系統，說明的詞句相当通俗，这就可以在普通話的推广和普及的意义上起一定作用。

著者在談到“怎样就算是学会了普通話”一节里（21頁）主張先学声母韵母，后学声調，認为“要求声韵調全象北京音的求全的动机是好的，但結果往往是不現实的”。在这里，著者虽然并未輕視学好声調的重要性，可是从这一节的叙述中不大容易看出声調在学話上的作用有多么大。好在著者只是談怎样能学会“最低要求”的普通話，要是要求高一些，那么，要不把声調提到应有的地位，恐怕就很难談到标准音了。

著者所写的《西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的其余兩部分將以

"普通話入門"(西北适用)和"西北音北京音对应練習"为名分别出版。(劳宁)

《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話》,張周編写。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32开,28頁,定价0.11元。

这本仅仅28面的小書,据編写者說是"根据一些有关的文件来編写,主要是帮助讀者初步了解推广普通話的一般道理。"这显然不是一个学習参考書,只能作为一种推广宣傳的小册子。在南方地区这种小册子虽然有它的客观需要,不过所叙述的也未免过于簡略。如果要兼顾到怎样学習普通話,就应該把"学習普通話"这一节(18面)写得充实一些,可是这里只輕描淡写地介紹了一些現象,这对讀者不会有多么大帮助。(寄予)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苏联嘉治耶夫等著。彭楚南、李佩娟、耿世民譯。民族出版社,1956年6月。23开,64頁,定价0.11元。

这是从苏联《布尔什維克》、《語言学問題》兩杂志中选譯出来的几篇有关苏联少数民族語文問題的情况介紹和論文。其中主要討論苏联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文学語言的建立等問題,这对我国的民族語文工作者有参考价值。(Ε)

《語言学概論》,苏联布达可夫著,吕同崙、高晶齋、周黎揚譯,时代出版社,1956年8月。32开,321頁,定价1.54元。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布达可夫(Р. А. Будагов)著《語言学概論》(Очерки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一書,各方面早就都觉得有介紹过来的必要,現在在原著出版后三年才在我国翻譯出版,这在需要上說,还不失为及时。

原著者在"前言"里說:"严格說来,本書并不是一种教学参考書。它只是以广大讀者群众为对象而論述語言的一本書。"可是在我国各專業学校語言專業的科系里正感覚教学参考書缺乏的今日,这本書的譯本还是很可以作为語言專業的参考書的。不过,"作者只是打算引起讀者們的兴趣,想使讀者們也接触到語言学家們所从事研究的某些科学問題。"所以本書对于業余的語言学学習者或是一般讀者可以作为一本語言学入門書。因此,"本書的結構,以及在闡述語言科学个別問題方面相当的不均匀,也是由于本書的这种特点所决定的。"(寄予)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民族語言文字科学討論会从1956年8月13日到8月22日在烏魯木齐市举行。会議一共进行了九天。参加討論会的有各民族語言文字工作者和各界代表二百五十多人。

在討論会开幕式上,新疆維吾尔自治区語言文字研究委員会主任扎克劳夫致开幕詞,他談到召开这次討論会的重大意义和这次討論会要解决的問題。他說:召开此次会議的环境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設迅速發展以及各民族社会主义覚悟不断提高的今天。在經济建設的同时也要求文化上的發展,而語言文字的問題直接关系到經济建設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因此,这次民族語言文字科学討論会的召开,是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自治区各族人民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將起重要作用。他又說:这次討論会將研究、討論維吾尔、哈薩克、柯尔克孜和錫伯等民族采用新文字的問題;研究关于創造塔吉克族文字的問題和蒙古族人民統一使用新蒙文的問題,以及維吾尔族文学語言及其术語規范化的問題。他预祝大会能胜利結束。

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員会第一書記王恩茂同志到会講話。他代表中国共产党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員会对自治区民族語言文字科学討論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賀,对前来参加会議的苏联專家和北京的同志表示欢迎和感謝。

他說: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業已經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日益向前發展。蘭州—烏魯木齐—阿克斗卡鉄路正在修筑,自治区將为全国的重要工業基地之一,要求文化事業得到新的發展。語文工作必須适应新的形势,适应生产需要。这次自治区語文科学討論会將会促进自治区的各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得到新的發展,这次会議在自治区的語文工作历史上將会写下它光輝的一頁。

他接着指出:民族文字的改革工作是很大的問題,对这样重大的問題必須采取愼重的态度。对于民族文字一方面必須改革;另一方面必須愼重进行工作。要把积極改革的精神和愼重进行改革的态度紧紧地結合起来。

会議进行期間,中央民族事务委員会文教司司長尹育然同志作了报告。他介紹了国内各民族語文工作的情况以及某些兄弟民族在解决自己的語文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时的看法。

接着他說:今后改革文字的工作必須采取較过去

更为积極但仍要慎重进行的方針。一方面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語言調查研究；一方面在工作中要大力培养語文工作幹部。少数民族語文工作是一件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作，它联系和关系到各方面，各个有关部門、各民族的領袖人物和知識分子应該积極参加、大力配合。

在談到划分方言、确定基础方言和关于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問題时，他說：对于各民族的語言在本民族的各个不同地区，实际使用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詞彙、語音、語法的某些差别，我們就是要从这些差别中去找出各方言所具有的特点和規律，从語言科学工作上去促进某个民族的民族共同語形成。

最后尹司長講到关于各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以及我国各民族在創立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中采用的字母形式問題。

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在会上作了重要發言。

在他的發言中談到民族語言中的馬克思主义原則、人文学的問題，中国展开研究民族語文工作，其中包括維吾尔族統一的全民标准語的工作，对柯尔克孜、哈薩克、蒙古、錫伯族設計的新文字的具体分析，对塔塔尔、烏孜别克、塔吉克、达呼尔等民族語文問題也提出了意見。

顧問的發言里分析了阿拉伯字母不适合突厥語及其它一些語言的語音系統，不适合于表达这些語言的語音特点，这些語言的輔音組成、語音規律、語法結構是很难用只考慮閃語族語言而制定的阿拉伯文字体系来表示的。阿拉伯字母不能满足現代教育和印刷出版的要求，同时也已經不能滿足使用这种字母的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發展的要求。

顧問說：創立民族文字以及改革至今还存在的文字，这些都还只是在建立民族文学和普遍提高各民族革命的社会主义內容的文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文化工作"需要一个較長的时期，需要适应这个較長的时期。我們必須依此来預計我們的工作。表現最大的頑强性、坚决性与系統性。"（列宁語）

繼字母問題之后，应該解决的是正字法和詞彙术語問題以及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和修辞規范化的問題。这些工作需要广泛地吸收有关的人士参加討論研究。中央的行政、科学研究和教育机关將会給自治区有关方面最大的帮助。

在大会上代表們听取了艾力坎木·艾合塔木同志的"新疆維吾尔自治区語言文字研究委員会工作报告"，孜牙·色米地同志的"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各民族新文字問題"，伊敏吐尔聪同志的"維吾尔文学語言及其术語規范化的問題"，傅懋勣教授"关于設計字母和拟訂維吾尔文正字法的几点意見"，捷尼謝夫顧問的"1950年到1955年期間的苏联突厥学"，托达叶娃專家的"衛拉特方言和現代蒙古标准語的关系"，李森副教授"新疆突厥語1955年調查研究工作总結和1956年調查計划"等报告。这些报告都就有关民族語言提供了發展的情况和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应邀参加討論会的还有苏联維吾尔語專家舍米叶娃等，他們也在会上發了言。他們給会議提供和介紹了很多宝貴的資料和經驗。

討論会当中，进行了約三天的小組討論，代表們表示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換意見，討論的情况热烈，进行得很細致。

討論会的后期，各民族語文工作的代表及自治区各机关、团体、文化、教育單位、报紙、出版事業的負責人在会上發言，他們反映了各民族語文使用的情形，介紹了有关各部門的語文工作情况，并且对会議討論的問題及看法表示热烈的贊同和支持。

8月22日下午，討論会开了最后一次会。会上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主席賽福鼎同志講話，对这次会議的成就表示祝賀，并向帮助这次討論会的苏联專家、中央派来的同志和全体与会同志表示感謝。

賽福鼎同志在会上对新疆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他着重講到：采用新文字与發展語言文学的重要意义；关于新文字草案的問題；有关文学語言發展的問題和今后語言文字工作的任务。

他說：这次会議以后，我們还必須繼續努力进行語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工作，要积極准备应用会議决定的新文字方案，也要考慮与研究那些尚未解决的民族文字方案問題。

接着大会通过了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民族語言文字科学討論会所作的决議（草案）。根据这次会議討論后提出的决議（草案），新疆維吾尔、哈薩克、柯尔克孜、烏孜别克、塔塔尔、錫伯等民族都將制訂或采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新疆蒙古族也將和內蒙自治区蒙古族一样地采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使用的新蒙文。

至此，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民族語言文字科学討論会已經对新疆各民族文字改革作出初步方案，完成了它的任务。繼續了九天的討論会圓滿結束。

（高尔鏘）

更　正

本刊1956年9月号13面右倒14行"出界"应改"世界"；19面左第三行"盲个"应改"盲人"；35面左第12行"izàb"应改"bàiz"；36面左第18行"地地球"应去一"地"字；同右第14行"位"为"住"之誤；48面左第4行末"通"为"字"之誤。

信箱

对《說天津話的人怎样学習普通話》一文的意見

(一)

《中国語文》1956年4月号刊登了李世瑜同志的《說天津話的人怎样学習普通話》一文，我看了以后，觉得这篇文章对天津人学習普通話是有很大幇助的。不过我对其中談到天津的陽平、上声、去声的实际調值部分，有些相反的意見，現在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李文內說，“天津語音的陽平声……是高而平的‘高平調’，但又不完全等于北京的陰平声，用乐譜来表示大約是$\underline{\overset{\frown}{\dot{1}\,\dot{1}}}$，…”(按即 ˥$_{55}$—引用者)。天津話的陽平实际上是 ˦˥^{45}，它开始时比較低，然后再升起来，这点和北京話的陰平不同，这只要比較一下天津話的“㾺”“移”与北京話的“媽”“衣”就可体会出来。因此，我認为李文把天津話的陽平認为是高平是不恰当的。李文也說天津的陽平不完全等于北京的陰平，这是对的，可是他首先把天津話的陽平肯定为高平調，这样就难免叫讀者納悶了，旣然都是高平調可是兩者又不一样，究竟兩者的区别在哪兒呢？而这种区别李文幷沒有作交代。

其次，李文認为天津陰平之外的“其他三个声調除陽平与北京音少有差异外，其余兩个与北京音沒有区别，…”。这就是說天津話的上声、去声的調值与北京話一样，也就是天津話的上声是 ˨˩˦$_{214}$，去声是 ˥˩$_{51}$。我以为天津話的上声幷沒有北京話上声这么曲折，是一个中升調，它的調值是 ˨˦$_{24}$，而不是降升調。天津話的去声也不如北京話去声那样起得高和降得低，它实际的調值应該是 ˦˨$_{42}$。

1956年7月号《語文学習》上有一篇德玉、炳信合写的“对《北方人要不要学習标准音》的意見”一文，也談到天津話四声的实际調值，这里我就不多說了。

(侯精一)

(二)

我們想根据自己学習普通話的一些体会，对这篇文章提出一些意見和补充：

李文指出京津語音都具有四个声調，在这四个声調中“前兩个調值是不同的，后兩个則沒有差异”。我們認为不仅陰平、陽平有差异，上声、去声也有差异。

陰平調值的差异，我們同意李文的說法，北京語音陰平調值是“高平調”，天津語音是“低平調”。用五度音标明音阶差异：北京語音陰平的調值是55，天津語音陰平的調值是11。

在陽平調值的差异上，李文說北京話是高升調，天津話是高平調；“但又不完全等于北京語音的陰平調”。我們認为更确切地用五度音标明音阶差异，北京語音陽平的調值应該是35，天津語音陽平的調值是45(同北京語音的陽平調值55有一定差异)。

上声、去声的調值，京津語音不完全一样，也有一定差异，用五度音标出是这样的：北京語音上声的調值为214，天津語音的上声調值是24；北京語音去声的調值为51，天津語音去声的調值为42。

天津音和北京音陽平調差异最大，可是天津人学習普通話时，除了要用最大力量糾正陽平的調値外，其他三个調子的調値也应注意糾正。

其次，談到京津語音的声韵对应規律，我們願給李文补充一些：

(1) 北京語音中用ㄖ拼成的一些字，一部分天津人唸成用ㄧ拼成的了。例如：

(ㄧㄜ-ㄖㄜ)惹、热

(ㄧㄠ-ㄖㄠ)饒、繞

(ㄧㄡ-ㄖㄡ)柔、楺、肉

(ㄧㄢ-ㄖㄢ)然、燃、染

(ㄧㄣ-ㄖㄣ)人、仁、任、忍、刃、紉、認、靭、任

(ㄧㄤ-ㄖㄤ)瓤、嚷、壤、讓

(ㄧㄥ-ㄖㄥ)扔、仍

(ㄧㄨ-ㄖㄨ)如

(2) 北京語音的ㄋㄩ、ㄌㄩ，在天津語音里唸成了ㄋㄨㄟ、ㄌㄨㄟ。有下面这些字：

(ㄋㄨㄟ-ㄋㄩ)女

(ㄌㄨㄟ-ㄌㄩ)驢、呂、鋁、旅、屡、屢、嫂、慮、律、率、綠、氯

(3) 一部分天津人在唸用ㄨ起头的一些音时，和北京語音比較，在前面多加了一个唇齿塞擦音ㄪ。应該去掉这个唇齿塞擦音(起碼要减輕)。

如：五、屋、歪、外我等字。

再次，有一些天津人爱讀尖音，也就是把ㄐ、ㄑ、ㄒ这三个音換成了ㄗ、ㄘ、ㄙ，应該去掉尖音的念法。有些人說：一部分北京人也爱讀尖音，可以不糾正，我們覚得这样說不妥当，这些北京人的尖音也是要去掉的，因为在北京音里，ㄗ、ㄘ、ㄙ不能跟ㄧ、ㄩ相拼。

(巴桑、殿福)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6 年 10 月号
总第 52 期
1956 年 10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东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37,670